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生命的记忆



序

黄裳

十多年来，子善先生辛勤致力于新文学史料的发掘、考证、整理，成绩喜人。他搜集、编定了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等人的佚文，为读者提供了可读的文本，给研究者推出了难得的资料，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他开手辑佚的工作时，周作人、梁实秋还是被排除在书林之外的“另册”人物，绝料不到后来居然会“热”起来，在不同意见纷起之时毅然从事，终底于成，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周作人后半生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但作为新文化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研究者还是不能略而不论。要论，就要考查实证。在《周作人集外文》两卷中，就辑存了周作人自己删去的大量佚文，大致恢复了《真谈虎集》的本来面目，在读者和研究家看来，无疑是一种快事。对梁实秋作品的考订整理，也是子善先生用力甚勤的一个方面，有《梁实秋著译年表》为证。

中国过去有悠久的辑佚传统，曾蔚为文苑中的别国，如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是一种名著，为文学史家离不开的文献渊薮。继起者代不乏人。鲁迅先生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也都是人们熟知的。先生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植根于《钩沉》的。基本史料与研究成果之间的紧密联系，灼然可见。鲁迅先生是自己动手收集素材的，因为前人没有留下可以凭依的资料汇编。这就给后人以启示，人们已经重视并着手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成绩是显然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中间就有子善先生的劳绩。

前人进行古文献的辑佚，主要依据的是古典文献类书、总集。偶有细心的学者搜索广及地志、文集——如厉鹗的《宋诗纪事》，就为这一工作扩展了视野，是可以借鉴的方法。新文学辑佚工作所依据的则是报刊、杂志和单行著作，辅之以回忆录、社团史料等，其实还是大有扩展余地的。要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是非把眼界更扩展到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不可的。本书中不少记述前辈与辨析史料的文字，就提示了这种研究扩展方向的可能性。作者所援引的书报杂志甚多，这些报刊的背景、倾向与当时作家的思想变化是息息相关的，都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课题。比如在30年代，梁实秋所用的笔名就有秋郎、陈淑、敬远、子佳等数十个，这就又有一个考定的问题，作者付出的劳动是可以想见的，往往一篇短文之成，作者不知翻遍了多少书报、杂志，而这些在今天又几乎成了“孤本秘籍”，残缺断烂，检索为难。作者埋头于资料的探寻中，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这是读者捧读这本《生命的记忆》时，难免会产生的沉重之感。

作者又是一位新文学书刊的收藏家。他曾记下历访北京琉璃厂、上海文庙书市的访书经历，读了恍如重睹北京厂甸书市风光。但其辛苦搜访的岌岌心情，却与“冷摊负手对残书”者迥异。偶然拾得一二珍异册籍，就亟亟写短文记之，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欣喜之情。他在北京无意中得到宋春舫褐木庐的藏书，就是这种奇遇。宋先生穷毕生之力搜集的7800册戏剧藏书，50年代已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但仍逃不脱狼藉市上的命运，真是言之痛心。不论长篇短制，作者记下的都是值得珍重的史料。子善先生年力正富，未来的收获正无穷尽，这是读者殷切的期待，也是对作者的鞭策。

1997 年 4 月 22 日

生命的记忆

怀人忆事

许寿裳手书鲁迅诗幅

在鲁迅逝世 50 周年纪念前夕，笔者拜访李毓珍先生，高兴地发现了许寿裳先生亲笔所书的一幅鲁迅诗：《七律·为了忘却的纪念》。

许寿裳是鲁迅“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俩从 1902 年秋在东京弘文学院同修日语时结识起，直到鲁迅逝世，交往之密切，友谊之深厚，决非一般人所能比拟。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先后出版了《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书，为介绍鲁迅生平，弘扬鲁迅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致最后招来杀身之祸，至今仍使人深感痛惜。据闻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主编的《许寿裳文集》，以纪念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知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鲁迅的挚友。

许寿裳这条诗幅写于 1939 年 8 月，是应李毓珍先生之请而写的（李毓珍笔名余振，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俄苏文学翻译家）。当时许寿裳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李毓珍为该校法商学院商学系的俄语助教。由于在校长任命许寿裳接任法商学院院长问题上，激进派教授与保守派教授发生意见冲突，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违反自己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越权任命另一位法商学院新院长，从而引起西北联大师生的一场风潮，校长愤而辞职。这位新校长到任后，就无理解聘了拥护许寿裳的沈志远、曹靖华等六名教授。李毓珍不过是青年助教，因在这场风潮中站在沈、曹诸位一边，也难逃被解聘的命运。他们离校前向许寿裳话别，并纷纷请他题字留念。许寿裳就欣然命笔，为李毓珍写下了陆放翁的一首七律和鲁迅这首诗。

鲁迅这首著名的七律作于 1931 年 2 月，系为纪念殉难的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鲁迅曾将其“录呈季市兄教正”（许寿裳字季市——笔者注）。许寿裳对这首诗很欣赏，他在《鲁迅的避难生活》中特地提到它，说：“全诗真切哀痛，为人们所传诵，郭沫若先生在抗战那年归国赋投笔诗，不是纯用这首的原韵吗？”在当时形势下，许寿裳把这首诗书赠涉世未深的李毓珍，恐怕也是有寓意在的。

许寿裳并不以书法名，因此他的字留传不多，手书鲁迅诗作也许更为少见。这幅鲁迅诗写得清劲、洒脱，特别是多用古字这一点，分明表现了许寿裳曾从国学大师章枚叔学习《说文解字》的遗痕，别有一格。

（原载 1986 年 9 月香港《明报月刊》249 期）

叶圣陶先生的一幅未刊题签

叶圣陶先生于2月16日溘然长逝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最后一位发起人离开了人世。这位《倪焕之》和《稻草人》的作者，辛勤笔耕70余年，著作等身。他在新文学创作上的杰出贡献，早已有人在研究评说，近年《叶圣陶评传》（陈辽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和《叶圣陶年谱》（商金林著，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等书相继问世，用不着我再来赘言。我要说的是我欠了叶先生一段情，叶先生虽然已归道山，我仍深感歉疚。

5年前，我与王自立兄合编《回忆郁达夫》一书。书将编竣，我想到应请一二位与达夫先生有过交往的文艺界前辈题签，叶先生是我考虑的主要人选，因为他不但德高望重，而且二三十年代与郁达夫时相过从，在他主编《小说月报》和《中学生》杂志期间，发表过郁达夫好几篇作品，现存郁达夫1934年9月21日致他的信（见香港三联书店版《郁达夫文集》第九卷）就是两人友谊的见证。但当时叶先生已公开登报声明，由于年迈体弱，不再为人题词写字，怎么办呢？

我不敢贸然行事，只能拜托北京大学研究叶先生的专家商金林兄帮忙。金林兄为人热情，他通过叶先生二公子叶至诚先生为我诚恳相求。叶先生听说要为纪念老友郁达夫的书题签，一口答应，他不顾眼花手颤，花了整整一个上午，认真书写了好几条，又剪贴多次，才挑选了这幅较为满意的托金林兄寄给我。

回忆郁达夫

叶 圣 陶 手 迹

叶先生这次破例挥毫，很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为人题写书名，五个字苍劲有力，十分难得。我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即把它寄给出版社，要求他们印在拙编封面，把另一幅刘海粟先生的题签印在扉页，出版社当时并未提出异议。万没料到拿到样书一看，封面和扉页所刊均为刘先生的题字。惊讶之余，火速驰函出版社询问，始知因技术原因，没有使用叶先生的题签。这真是令人遗憾之极。叶先生对拙编一直关心，多次问起何时可以出书，待到书终于印出，他老人家的题签却弃之未用，叫我如何向他交代？想来想去，只能再请金林兄辗转说明原委，恳求谅解。尽管叶先生宽厚，没有责备我，但我总感到对不起他老人家。值此沉痛哀悼叶先生之际，把这幅未刊题签公之于世，作为对叶先生的一个纪念。

（原载1988年4月香港《明报月刊》268期）

刘延陵忆郁达夫

1983年初，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集一本《回忆郁达夫》，广约海内外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各界前辈撰文，意在为郁达夫研究保存若干重要的史料。远在新加坡的五四诗人刘延陵与郁达夫在星洲时期时相过从，自然也在被约之列。刘老不顾年事已高，极表支持，一口允诺。不料没过多久，刘老身体违和，一时难以完稿，万不得已于7月12日致我的信中表示：“前承命写忆郁文，本乐予附骥。奈因俗事太多，屡次执笔愆期，实觉抱歉万分。迁延至六月底，决心拂尽琐务，一意属稿，且已草成数页，继续前进。不料忽患重伤风，寒热交作，卧床十日，今体温虽已如常，而咳嗽余波未尽，并且神疲力倦，无力构思，不知何日才能复原。如再求展期，固然没法启齿，且恐因此拖延尊书出版之日期，更加愧对”，因而提出豁免供稿的要求。我以为以刘老与郁达夫的交谊，拙编缺少他的大作，未免可惜。恰巧当时也在新加坡的郑子瑜先生得知此事，就自告奋勇，于该年12月4日走访刘老，又根据刘老的回忆亲到新加坡虎豹别墅勘查，整理完成了一篇关于郁达夫的谈话纪录。但刘老翻读之后，在感谢郑先生之余，觉得还需再作补充修改，嘱我暂勿收入拙编。为尊重刘老本人的意愿，我只得照办，尽管不无遗憾。

这份纪录稿就这样在我手头一搁就是6年。去年10月18日，刘老在新加坡溘然长逝，噩耗传来，令人深感悲痛。今年11月上旬，郑子瑜先生来上海，我们谈起刘老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卓越贡献，也谈到刘老母校复旦大学的出版社有出版刘老诗文集的打算，我就想起了这份纪录稿。刘老晚年很少动笔，这份纪录稿虽然刘老生前未及修改，不能看作最后定稿，但毕竟是根据刘老口述整理而成，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仍然很值得重视。经与郑先生商量，不敢永藏私篋，决定将其公之于世，供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参考。刘老如果泉下有知，想必也会首肯的吧？

下面就是这份纪录稿的全文：

达夫先生和我同是五四时期的作者，他是创造社的健将，我只是文学研究会的一个小兵。他擅写小说、游记和旧体诗，风靡文坛数十年，我只写了几首新诗，凄凄热闹。也许是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推理法那样吧，那时候的暨南大学负责人，以为我会写作必定会教书和批改习作，于是邀请我在暨大执教，这一教竟教了许多年。不幸我因为用脑过度，脑子出了毛病，不时发痛，医生劝我不可再教书，同时也应该少写作或是停止写作，理由是教书和写作，都要煞费脑力，会加重我的病情。又劝我最好从事于劳力多而劳心少的工作。这虽不至于宣布我的死刑那样可怕，却也是可悲的事。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作者，对劳动该是热爱着的，无如我到底是文弱书生一个，又怎能从事于劳力的工作呢？

然而我终于辞去了大学的教席，想找一份虽劳心又不太劳心的工作来维持生计，我自问对英文的读解能力还过得去，于是立下决心，要在我的有生之年，从事中英文的对译工作。我以为这工作是现成而又有所依据的，不必像写新诗那样须着意构思自立天地，也不必像教书那样须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指批改学生的习作）。可是在那时候的中国，要找个搞翻译的差事也着实不容易，结果我在中日战事爆发之前，便独个儿渡海来到了马来半岛。

当时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华人聚居在这儿可以“夥颐”两个字来形容，要找一份翻译的工作，自然比在国内容易。可是，也可以说是机缘未至吧，我初到北马，却并不当翻译，而去做了几年中小学校长。校长只办行政，比较呆板，可以不必

多费脑力，所以也算是能符合医生的指示，并不违背我的择业的准则。后来我进了星洲日报社编译电讯稿，始与达夫先生共事数年。

新加坡西海岸高地上的虎豹别墅，原是星系报业创办人胡文虎、文豹兄弟的产业，却开放让游客游赏。别墅中有一座名为“挹翠”的拱形石牌坊，两旁共有长短不齐的四支石柱，报社主人要达夫先生撰写两副对联，镌刻于石柱上，达夫先生稍一构思，便写成了。那较短的一副是：

天半朱霞，云中白鹤；
山间明月，海上清风。

那较长的一副是：

爽气自西来，放眼得十三湾烟景；
中原劳北望，从头溯九万里鹏程。

别墅中另有一座不题名的石牌坊，两旁各有一支石柱，达夫为它而题的对联是：

万水汇归，环海银涛收眼底；
金樽共赏，前山翠黛展峨眉。

达夫先生曾将这十三字句的对联拿来和我推敲，大约也是出自“想当然耳”的推理法吧，他以为我会写诗一定懂得做对子，又一定可以替他的对子提意见和加以润色。自虎豹别墅俯瞰，是九曲十三湾的山坡小道，烟雾迷茫，这当是“放眼”的一句所出。下联可以看出达夫先生对祖国的热爱，以及缅怀过去，瞻望前程的情愫。依我的经验，作者拿他的作品来向你请教，有的意在炫耀自己的文笔，有的希望得到你的赞赏，若你真的提出意见，以为某句某字应该如何修改，那他准会愤然失色，拂袖而去。达夫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是真心诚意拿他的对子来和我推敲的，他衷心希望我能提出意见。我以为他这副对联实在写得确到好处，所以只有激赏，未提意见。他似乎感到不满足，这是达夫的虚心和诚实处。

达夫从不恃才傲物。没有和他共事的人，还以为他放浪不羁，凡事随随便便，草草率率。其实，他做事是何等的认真，多么的负责哩！我编电讯，每天下午六时到报社办公，深夜一时停止接收电讯，编辑竣事，已是二时光景了。回到家里（我那时住在俊源街，达夫住在中峇鲁路），往往直到四时才能入睡。达夫编副刊，每天几时到报社，我不大清楚，但我到了报社，他还没有回去。有一个时期，达夫兼任总编辑，须写社论，晚上就和我一样一直工作至深夜二时左右，看了大版，才得归去。他是真的把事情当作事情来办的，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从来不会高自位置，而在这拜金主义挂帅的新加坡，人们看都达夫不像个郁达夫，只有极少数的文化界人士，才会对他有几分敬意，也特别看得起他。

达夫先生的爱国热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他对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原是十分敬佩，可是后来他得知佐藤春夫为文歌颂日本皇军侵华的所谓“圣战”，他对这位日本著名的小说家立刻由敬佩变成鄙视了，他写了一篇《日本的娼妓与文士》对佐藤春夫作了无情的抨击。有一天，我们报社有一位同事悄悄离职，到南京去参加汪逆精卫的伪政府，当了汉奸。达夫敌我分明，对他很是不齿，从此不再提起他的名字。

达夫常常向我打听祖国抗战的消息，如果是前线胜利，他便欣喜若狂，以为从此可以乘胜追击敌军，收回所有的失地，直捣黄龙，好让大家痛欢庆祝一番。若是前线失利，或是敌军奸淫妇女，屠杀同胞的消息让他知道了，他便悲愤不欢，连续几个钟头。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有一天晚上六时许，他听到了他哥哥郁曼陀被日本特务杀害于沪上的消息，国仇与家恨相交织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紧握着拳头说：“此仇必报！”充分表现了他的敌忾之气。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攻陷新加坡，英军不战而降，达夫在这之前的几天坐船到印尼避难。我逃到北马暂避风险，不久又回到新加坡，蛰居后港，日军发布告示限令居民依

时集中检证，在检证中实行大屠杀，杀死十万人众。我没有去集中，也没有被发现（被发现必逃不出鬼门关），后来设法买了一张盖了“已经检证，属于良民”的护身符，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且由于多年来都做那不很费脑力的翻译工作，脑病也差不多好了。达夫却在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前夕，被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的苏岛，屈指一算，至今已三十八个年头了。

（原载 1990 年 6 月 21 日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

人澹似菊，品逸于梅

——追念郑逸梅先生

郑老一再说过：“在我一生中，最值得我记述的，一是写作，二是教书。”诚哉斯言，郑老足以引为自豪。只是郑老虽执教鞭半个世纪，作育英才，蔚然称盛，相比之下，他的写作成就更为辉煌。早年与范烟桥、顾明道等组织苏州星社，复又加盟南社，与柳亚子、胡朴安、高吹万等名家相投契，被聘为上海鼎足而立的三大报刊《申报》、《新闻报》和《时报》的特约撰述，先后主持《消闲月刊》、《金钢钻报》、《华光半月刊》和《永安月刊》副刊笔政，编写电影剧本《三生石》、《万丈魔》、《国色天香》等，在无声电影界大显身手，后又兼任新华影业公司宣传主任，以及近年为香港《明报月刊》、《大成》、《大公报》、《文汇报》等撰写专栏，都是郑老多姿多采的笔墨生涯中可圈可点的得意之笔。而自1926年推出第一本短篇小品集《梅瓣》，至去年煌煌三大卷《郑逸梅文集》问世，郑老已先后出版著作六十余种，凡一千多万言，这还不包括大量散见于海内外报刊未及收集者。古人有著作等身之说，证之郑老，才真正名副其实，信然无虚。

郑老毕生专注于文史掌故的著述，他对此有强烈的责任感，多次表示：“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将近一个世纪，所闻所见，历历如在眼前，有许多东西，青年人还不知道，我应当把它写出来，这是我的责任所在，否则我这辈老人过去了，这许多史实、掌故，跟着我而过去，岂不可惜！”因而，海内外均誉之为“文史掌故作家”。能受此美称而当之无愧者，大陆难找第二人，在香港也只有已故的包天笑、高伯雨等两三位文坛耆宿而已。不管是为师立传，为友纪事，还是为文史补阙，为冤屈者鸣不平，旁及书画典籍、简札柬帖、玩赏集藏、名胜古迹、园林花木、风俗习尚等等，在郑老笔下无不妙趣横生，文采斐然。特别是清末民初文坛艺苑的风云人物、秘闻轶事，郑老或亲身经历，或与之熟稔，或掌握独家资料，写来历历如数家珍。晚年所著《南社丛谈》、《书报话旧》、《清末民初文坛轶事》、《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等书，更是呕心沥血的集大成之作，为近、现代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颇受海内外学人所重视。

早在30年代初，郑老就因喜为报刊撰写补白性的随笔小品，一时“郑补白”、“无白不郑补”之名不胫而走。后来臻于炉火纯青之境，名号也随之升级，海内外均以“补白大王”、“补白大师”尊之。80年代以降，郑老接连出版《艺林散叶》和《艺林散叶续编》两书，总计补白性随笔6600余条之多，令人叹为观止。郑老的补白多则数百言，少则十余字，文字精炼，耐人玩索，吉光片羽，足资启迪。他写人物，只描画其一眉一目，一笑一颦；记事件，只择其涉笔成趣的精采部分加以渲染；抒情怀，也是含蓄浓缩，以格言点缀其间。如最短的一条：“许地山擅弹琵琶”，寥寥七字，就把许地山鲜为人知的特长和盘托出。这种“补白”被论者称之为“郑公体”，既继承了六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和清代张潮《幽梦影》的传统，又有郑老自己的创造和风格，推陈出新。这是郑老在写作上的又一大贡献，连新文学作家楼适夷先生也予以充分肯定：“郑逸梅专写补白的短文，人称他是补白大王。今虽年老，现仍健在，我们老读者是很怀念他的。”

郑逸梅著《花果小品》扉页和他的签名

按照大陆以往对现代作家的分类法，郑老应归入“旧派”文人之列。五四新文学勃兴以后，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壁垒分明，新文学家对“旧派”文人的抨击可谓不遗余力。郑老当时虽未首当其冲，但到了十年浩劫就难逃厄运，被斥为“鸳鸯蝴蝶派”文人，打入另册，吃足苦头。其实，当年对“旧派”文人及其作品的批判颇多偏激过火处。“旧派”也好，“鸳鸯蝴蝶派”也好，毕竟也是现代文坛的一个流派，至今拥有大量读者，在保存某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探索文学的多种表现形式等方面，自有其一定的历史功绩，岂能全盘否定？何况“旧派”文人和作品也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也在吸取新文学的长处，两者并非水火不相容。即以郑老而言，他在长期的写作中就大大提升了文史掌故的文学和学术地位，逐渐赢得了文坛的承认和尊重。至于郑老思想开明，淡于名利，以“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为座右铭，更体现了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绝非当今那些僵化保守、趋炎附势的新文学家所能比拟。“人澹似菊，品逸于梅”，这就是郑老为人为文的真实写照。

笔者与郑老仅一面之缘。80年代初，与上海《文汇报》金晓东兄同访郑老，当时谈些什么，早已不复记忆，但郑老亲切谦和，谈锋甚健，却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去年以来，先是因与复旦大学陈思和兄合编《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请郑老为《张恨水传》作序，接着又代表《明报月刊》约请郑老撰写专栏，均蒙惠允，倾力支持，笔者衷心感铭。郑老谢世，使本世纪有影响力的“旧派”文人全部隐入历史，今后不大可能再产生像郑老这样的文史掌故大家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为此略志数语，藉表缅怀纪念之忱。

（原载 1992 年 9 月香港《明报月刊》321 期）

一个后辈的怀念

记得那是1977年初夏，我在北京政协礼堂休息室首次见到胡愈老，我是因注释《鲁迅全集》书信的需要，特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他的大名我当然早已知道，因此有点忐忑不安。可是见面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胡愈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没有一点架子。他耐心地倾听我就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所提的几个问题，由于耳朵重听，还不时要求我重复一遍，然后一一作了仔细的解答，大概看到我笔记不快（那时还没有录音机），他故意说得很慢，说几句就停顿一下。为了使我能掌握更多的有关史料，他还建议我去拜访生活书店的另一位老前辈徐伯昕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就这样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结束了，临别时，他老人家又叮嘱我，注释《鲁迅全集》意义重大，如有问题，可再去找他。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10年后的今天追忆，胡愈老的音容笑貌仍然宛在眼前。

3年以后，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郁达夫忆鲁迅》一书，自然地想到应请胡愈老题签。正好我那时有北京之行，就再次去拜访他老人家，不巧那天胡愈老外出，我只能在门口值班室留下一张字条失望而归。没想到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复信和他亲笔书写的“郁达夫忆鲁迅”横、竖条各一幅，信中谦虚地说，你们编这本书，很有必要，但我毛笔字写不好，很少为别人题字，勉强写了两条，能不能用，由你决定。这信，这字幅，怎不使我欣喜万分？后来选用了胡愈老竖写的那幅题签，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海内外人士的注意，算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盛意。

最近几年，考虑到胡愈老年事已高，又忙于国事，我尽可能不再去打扰他老人家，不过有时在研究中碰到无法解决的疑难，仍忍不住去信，他总是有求必应，及时作复。现检出两封，照录如下：

陈子善同志：

二月三日来信收到。

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先生很可能邀集一些党内和党外同志开会商谈过出《海上述林》等事。但是我是否参加那一次的会，全不记得了。捐款可能是有的，但我也记不得了。如果是在郑振铎家开会，是有可能的。我生平唯一一次和秋白同志见面，也是在郑振铎家，当时是商量文学研究会事，但那是1923年前后的事了。我只记得《海上述林》出版后，鲁迅先生曾送我一册，这本书（上下册）现在我还保存着，在抗战时，我所有的书籍文件都丢失了，唯有《海上述林》是由我的现已过世的兄弟仲持代我收起来，所以至今保存着。

特复，祝

春节愉快！

胡愈之 二月七日

子善同志：

兹九转来信收到。

承询洪、黄、胡、韩情况，我都不清楚。只有韩槐准我是相识的。他是研究一种药用植物，即红牡丹起家的。在新加坡搜集中国古瓷器，献我国博物馆。约在六十年代回北京定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不久即去世。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勿复，祝

健康！

第一封信写于1980年，当时我正在查考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向胡愈老请教鲁迅编印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经过；第二封信则写于1982年，当时我正在研究郁达夫旅居星洲的活动，向胡愈老了解其星洲友人黄孟圭、胡浪漫、韩槐准诸位的情况。这两封信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今天重读，更使我深深感到胡愈老的诚恳和热情。

为了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我和自立先生又合作编订一本《回忆郁达夫》。征稿期间，我无意中在达夫先生的侄女、画家郁风先生处发现胡愈老于1947年郁达夫被害两周年时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加坡《南侨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郁达夫》一文，不禁大为惊喜。文章虽仅短短千余字，却颇为重要，文中强调：“达夫可算得近代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地位。”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国内一直无人知晓。为慎重计，我立即复印一份寄请胡愈老过目审定。他老人家十分高兴，亲笔在影印件上加了两个说明寄还我，同意收入重新发表。对文中提到的当时星洲的“文化比椰粕和香蕉皮更不值钱”这句话，胡愈老唯恐现在的读者看不懂，还特地加了一句注释：“日占领新加坡时缺粮食，一般食用椰子的糟粕和香蕉皮，在市上出售。”他的认真和细心，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切，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宝贵支持。而今，几经周折，拙编终于问世，胡愈老却不及亲见了。

众所周知，郁达夫在南洋失踪之后，海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惨遭日寇暗害的，有说为印尼游击队所杀的，更有别有用心者，说他死于共产党友人之手，还有说他已遁入空门的，等等。胡愈老的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首次揭开了郁达夫失踪之谜，在郁达夫研究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篇文章也存在不足之处。文中说郁达夫1945年8月29日晚失踪，9月17日被害。根据当时日寇已宣布投降的形势，似乎不大可能把郁达夫关押半个多月再下毒手，因此，我对郁达夫死于1945年9月17日说产生了怀疑。1983年下半年，日本研究郁达夫的著名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到复旦大学访问，我有机会与铃木就这个问题多次交换意见。铃木透露他已找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队头目，并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只是这个头目不敢公开承认。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马上写信向胡愈老和郁达夫的另一位好友楼适夷先生汇报。

翌年夏天，楼先生到上海，打电话约我见面，说是胡愈老要他传话给我。我赶到楼先生住处，看了胡愈老的信，始知他老人家非常关心此事，他把我的信转给楼先生，并要楼先生转告我，他坚信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探讨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他要我与已经回国的铃木保持联系，敦促铃木利用他的有利条件，把郁达夫被害真相搞个水落石出。显而易见，胡愈老并不因为日本学者和我对他文中所说有不同看法而感到不快，而是尊重事实，欢迎争鸣，以实际行动提倡学术自由，这种宽容、豁达的态度尤其使我感动。

于是，我遵照胡愈老的嘱托，在与铃木通信时多次提到此事，希望他能进一步调查。铃木经过再三努力，终于说服那个宪兵队头目正式承认是他下令在1945年8月29日晚或30日凌晨秘密绑架杀害了郁达夫。铃木的调查报告在1985年9月富阳郁达夫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引起海内外轰动，会后我把

协助铃木整理的调查报告中文稿寄给胡愈老，让他老人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在 1985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北京郁达夫纪念会上，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胡愈老。他在会上以清楚响亮的声音对郁达夫其人其文作了崇高的评价，首次提出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会议进行中，胡愈老还不时与坐在一起的李一氓、夏衍等几位前辈谈笑风生。由于人多，我在会上没有趋前向他老人家问候。万万没想到不到五个月，胡愈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原载 1989 年 2 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初版
《胡愈之印象记》)

悼念许钦文先生

许钦文先生以 87 岁的高龄溘然长逝了。凡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许钦文的名字。许老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在文学创作上也长期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和帮助，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乡》就是由鲁迅先生花费了大量心血，亲自编选、校对并出资付印才得以问世的。他的反映石作工人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石岩》也曾得到鲁迅先生的推崇。鲁迅先生还在 1924 年 2 月“拟许钦文”的小说《理想的伴侣》的笔法，写了一篇《幸福的家庭》，更使许钦文声名大震。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许老在 20 年代文坛上占着较为重要的地位，这已为文学史家所公认了。

笔者曾有幸聆听许老的教诲。那是 1977 年的春天，笔者参加《鲁迅全集》书信卷的注释工作，到杭州拜访一些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的文坛前辈，受到许老的热情接待。他那时已经是 80 岁的耄耋老翁了，而且视力大为减退，却仍然精神矍铄，谈锋甚健。在西湖边上他那幢别致的小屋里，许老与我们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深切怀念鲁迅先生和他的挚友、著名美术家陶元庆，对“四人帮”打着鲁迅旗号糟蹋鲁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则颇多勉励之词。他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出示了香港鲁迅研究专家张向天先生的几部新著，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告辞时，许老一直送到小园门口，还一再叮嘱，有什么问题可再去找他，欢迎我们再去。

但是，考虑到许老毕竟年事已高，鲁迅书信中关于他的一些疑难问题又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再去打扰他。只是在三年后的浙江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笔者与许老又见过一面。那天他老人家不辞年迈体弱，亲自到会祝贺，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使全体与会者大受感动。

尤使笔者终生难忘的是，许老在去年应自立兄和笔者之请，为我俩合编的《回忆郁达夫》一书撰文的事。郁达夫先生惨遭日寇毒手已快 40 年了，国内至今没有出版过一本回忆、纪念达夫先生的专集，而在国外，早在 50 年代，新加坡就已经印行过《郁达夫纪念集》，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富有意义的工作。有鉴于此，我俩不自量力，决心合编一本《回忆郁达夫》来填补这个空白。许老在了解了我们的编选意图以后，虽然已在病中，还是高兴地答应我们的请求，很快就写好《悼念郁达夫氏》一文寄来了，并在信中谦虚地说，不知文章是否合用，如有不妥之处，尽管删改就是。

许老在二三十年代与达夫先生时相过从，还发表过一篇《郁达夫丰子恺合论》，针对当时有不少人“一提到郁达夫就要摇头大骂”，提出了“要是郁达夫先生，真在一天到晚的喝酒打牌跟女人，那末，那里还有功夫读书做小说呢？”这样颇有见地的看法。不过，许老这篇大作没有全面回忆与达夫先生交往的始末，而是截取了一个非常时期，即上海“八一三”战事前后，两人患难与共的情景。郁达夫当时如何热心介绍他去福建师范任教，两人如何结伴同赴福州被阻，到福州后郁达夫又如何关心和帮助他，都追述得真切动人。朴实的文字中，流露出作者对达夫先生的衷心感激，对达夫先生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的高尚品德，作者更表示了他的钦敬。文章最后，作者深情地说：“时光已经流逝了半个世纪，郁达夫先生的遗体还埋在南洋。不过，可以告慰达夫的是，他的诗集和文集已经先后出版，他和他大哥的双烈亭也已在他们的故乡富阳鹳山落成。郁达夫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总将永远为人们所赞颂。”这真是道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很少

读到许老的文章了，这篇文情并茂的回忆录，很可能就是他的绝笔。遗憾的是，他老人家未及看到拙编《回忆郁达夫》的出版，就已离开了我们。

许老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新文学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老作家，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令人十分悲痛。为了检阅许老半个多世纪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浙江文艺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收集较为完备的《许钦文小说选集》，《许钦文散文选集》不久也将问世，许老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吧？至于笔者，将永远铭记许老的宝贵支持。

（原载 1984 年 11 月 30 日香港《文汇报·笔汇》）

历历前尘吾倦说

——琐忆俞平伯先生及其他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走完了他91年漫长而又历尽坎坷的人生旅程。两个多月来，几次想写文章纪念他老人家，却不知怎样下笔。论交往，与俞先生仅一面之缘，论治学，更无法窥其堂奥，难以评说，写什么好呢？思来想去，还是从那次有点尴尬的见面说起。

1988年冬，我到北京参加郑振铎先生诞生9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与上海书店出版部负责人刘华庭兄一起去钓鱼台南沙沟公寓专诚拜访俞先生。俞先生年高体弱，深居简出，除了1986年11月那次引人注目的香港之行外，已很少与外界接触。我此次冒昧求见负有一项重大而自知也是艰巨的使命，即请俞先生撰文回忆知堂老人。知堂老人被誉为“‘五四’三巨人”之一，也是现代散文开一代风气的代表人物，但由于他在40年代的“失足”，又成为争议最多的作家。编集一部同代人及其门生故旧回忆老人的文集，无论就保存史料还是促进研究，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俞先生与知堂老人订交近半个世纪，有极其深厚的师生之谊，居知堂“四大弟子”之首（另三位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俞先生自己也有诗为证：“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缙客袂，几日未登堂。”（《京师坊巷诗——八道湾》）当年俞先生是知堂八道湾寓所的座上常客，“几日未登堂”可见关系之密切。因此，在我看来，俞先生虽已很少动笔，但撰文回忆知堂，于情于理似乎都不容推辞，何况还有华庭兄同行。华庭兄主持上海书店出版部多年，影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百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先后出版了俞先生的《燕知草》及乃曾祖俞曲园、乃父俞陛云的著作，俞先生十分高兴。所以我对此次拜访还是抱有信心。

华庭兄告诉我，平时有一位保姆照顾俞先生起居，有客来，必由她先通报。不料那天下午保姆上街购物，以致我俩在俞先生门口站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得以进入那间陈设简单、悬着曾国藩手书“春在堂”横匾的客厅。俞先生尚未起身，等到他颤巍巍扶着椅背桌角走出来与我们握手相见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俞先生的确衰老了，要不要再提约稿的事？我曾有一阵犹豫。但既来之，不提不甘心，寒暄过后，我马上切入正题，恳请他老人家拨冗为拙编《回忆知堂》撰文。没想到俞先生沉吟片刻，只说了三个字：“我不写。”我不禁着了慌，连忙搬出一大堆理由，企图说服俞先生，甚至退而求其次，俞先生不必亲自动笔，只需口述，由家人记录整理，哪怕谈一二件琐事也可以，总之雪泥鸿爪，留点史料给后人就好。华庭兄也帮我说了不少话。但俞先生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很坚决：“我已停笔，不写了，此事不要再提了，请你们谅解。”当时的尴尬情景可想而知。幸亏华庭兄灵活，岔开话题，气氛才逐渐活跃起来，大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出版的《俞平伯论〈红楼梦〉》，谈上海书店将影印俞先生的最后一部散文集《燕郊集》，俞先生的兴致越来越高。我们告辞时，他老人家还正襟危坐，愉快地与我俩每人合影一帧留念。

这次拜访虽未达到目的，但见到心仪已久的俞先生，亲聆俞先生警欬，毕竟令人难忘。只是俞先生为什么坚持不肯撰文回忆知堂，是真的停笔，还是仍然心有余悸，或另有难言的隐衷？我觉得还是个费解的谜。后来读到俞先生80岁后得句：“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不禁有所领悟。

俞先生才华超群，却半生风雨，华年受阻，往事不堪回首，到晚年不但不写自传，也不写任何回忆录，对所有的请求一概回绝，正如他的外孙韦柰先生在《俞平伯的晚年生活》（载1990年11月《新文学史料》第4期）中所说的：“他倦了，不想说，也懒得说了。”这可以看作痛定思痛，愤极无言，又何尝不可看作对人生沉浮已经豁达超脱？其实，俞先生对知堂老人一直遵“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40年代末，俞先生先是致函胡适之，后又与沈兼士、邓以蛰等名教授联名呈文国民党政府，要求对知堂从轻发落，“俾就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见1990年8月北京中华书局初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被士林誉为古道可风。50年代中期，又是俞先生向全国文联建议组织知堂和王古鲁、钱稻孙一起到西安旅行，这是老人晚年唯一的一次出游，身心大快。到了“文革”浩劫，俞先生在惨遭“红卫兵”抄家批斗、受尽折磨、自顾不暇之际，仍偷偷向学生吴小如打听知堂老人的消息，其笃于风谊由此更显得可贵。因此，尽管俞先生未能留下关于知堂老人的片言只语，他已用往昔的实际行动作了说明，我们后辈就不必苛求了。

关于俞先生，我还有一件事可说。1987年秋，我到北京与一家出版社商谈书稿，工作之余到闻名海内外的琉璃厂海王村“淘书”，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旧期刊中，发现一本1948年无锡佛学会印行的佛学杂志，怀着好奇打开一看，竟有一篇俞先生说佛的文章，原来俞先生也精于此道。但此刊索价不菲，我又阮囊羞涩，再加当时孙玉蓉女士所编的《俞平伯研究资料》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想必已经列入“俞平伯著译系年”，因此也就轻轻放过了。待到回沪后检出孙女士赠我的这本研究资料一查，恰恰漏收此文，我才后悔不迭，却已无法可想。时间一长，连这本佛学杂志的刊名和俞先生佚文的题目也忘了。

去年读到俞先生在北大执教时的学生张中行先生所作《俞平伯》（载1990年7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负暄续话》），始知张先生40年代后期主编佛学研究月刊《世间解》时，俞先生曾应约惠稿。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线索，急忙去查阅原刊，《世间解》创刊于1947年7月15日，发行人兼编辑人署名“续可”，该刊宗旨在《发刊辞》中说得很明白：“世间解是佛的另一称号，其意义是佛对于世间出世间皆解了悟，本刊取此为名……就是要显扬佛理，或说是研讨人生之道。”而作者阵容之强大，也使人刮目相看。除熊十力、任继愈等研究佛学的大家外，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朱自清、废名、赵景深、金克木、南星、顾随、吴晓铃等也都是撰稿人，这当然与编者交游广阔有关。

俞先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同年7月6日在北平居士林的演讲稿《今世如何需要佛法》，9月15日出版的第3期又刊登俞先生的另一篇《谈宗教的精神》，两篇都是佚文，《俞平伯研究资料》未见著录。我依稀记得无锡佛学会刊物所载俞先生文即为两篇之一，很可能是转载，可惜已记不确切。不管怎样，而今人们只知道俞先生是“红学大师”，他对佛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却鲜为人知，这两篇佛学佚文的“出土”是值得重视的。现把较短的《谈宗教的精神》照录如下：

谈宗教的精神

古代的文明是宗教，近代的是科学，如何会通二者我们应当细想的。

古代的文明确是宗教，近代的文明不一定是科学。科学，文明的片段而已，它帮助

文明的发展，加速地进行，但它还不够算做文明的本身。

“提倡科学，打倒迷信”，人人都会说，但不一定对。宗教信则有之，迷与不迷，尚在两可。这一顶不合式的帽子，是你给它戴的。

再说，在这时代我们的信与行，假如都对，我们正应当快乐康健幸福安全。但我们能够保证这快乐康健幸福安全吗？当然，这并不由于上述的错误，但安见得这里没有错呢？或曰，我不懂你的真意了，你莫非反其道行之，在想着提倡宗教（算他信而迷）打倒科学吗？我不则声。

那末，你是不敢吗？我或者不敢，我或者敢，但这问题，不是敢与不敢，乃是可与不可。假如可，当然敢。假如不可呢，也无所谓敢与不敢。

我真有一点这个意思。古代的宗教难再生，他的精神实在应该复活的（自然我不指它的仪式），它的崇高的奉事精神即我们的光明的薪求，然而我们不如古人远矣。空空的薪求光明，光明不因之而来；诅咒黑暗，黑暗不因之而去。殉道者的生平，即一切志士仁人的榜样也。

若说科学，更十足的外行，科学当然无止境，不能任意教它在某一点上站住。我也不愿提起原子能原子弹，这些话，老说，多贫气。我们能否改变它的方向，使它与人道主义相配合，而免却人类终趋于幻灭的壑？科学界的先生们朋友们怎样想呢？

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已经自然分明的在那边跳着要出来，即极端的唯物必与极端的唯心在某地会合，握手言欢，真正的近代文明史，这方才开始写。现在我们只留在无边的黑暗里，凡怀孕这光明的，必须受种种苦，亦惟有受罪，才能保证这光明。此是前定，或曰命定，人不能违也。

我对宗教缺乏研究，但我从俞先生阐发的古代宗教精义中，分明看见一个深长的悲天悯人之心。张中行先生推崇此文“所见深而透，文笔还是他那散文一路，奇峭而有情趣”（见《俞平伯》），我想凡是读过此文的人都会有同感的吧？

1990年1月
（原载1991年3月香港《明报月刊》303期）

盛成先生的一组抗日怀旧诗

盛成先生的大名，海内外读者想必不会感到陌生，他是我国现代享有国际声望的一位重要作家、学者。20年代旅法期间，盛成用法文写成传记文学《我的母亲》，文笔质朴，情感浓挚，气度恢宏，又充满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因此深受法国大文豪瓦莱里赏识，特地为之作万言长序推荐。书出后果然震动法国文坛，驰誉西方和阿拉伯青年世界，盛成一举成为国际文化名人。西方的盛成崇拜者和研究者组织的“盛成文友会”至今仍在活动，1985年3月法国总统又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盛老叶落归根，于1978年回到北京定居，因他是郁达夫的好友，为了编辑《回忆郁达夫》一书，我于1984年4月间特地赴京拜访他老人家，承蒙他热情接待，笔录了《与达夫一起去台儿庄劳军》，当时他俩都是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共同担负去台儿庄前线慰劳抗日将士的光荣使命。回上海后，我把整理稿寄请他过目，他在6月2日的复信中说：“来书及笔录及达夫两篇文章（指郁达夫写台儿庄劳军的《黄河南岸》和《在警报声里》两文——笔者注），均拜读并稍加审定。关于劳军经过，我当初因内容不简单，故未即答复。因你自沪来，令我口述，难以故人之往谊，敷衍塞责。故接信及读达夫文章后，捉笔补述歪诗七首，聊表续貂，如何？”随信附来了这七首诗，可惜由于篇幅所限，拙编未能编入。而今拙编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盛老的诗稿却仍存在我筐中，一拖就是三年，日前检出，不禁感到有负盛老嘱托。值此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之际，特将盛老这七首抗日怀旧诗公布，以为纪念。目前盛老仍以88岁高龄，孜孜不倦地从事马来语，特别是马来语与中国古汉语关系之研究，令人感佩。盛老几乎不再发表作品，我想这七首诗是会引起海内外盛成爱好者的兴趣的。

台儿庄忠贞农妇

饱妇沦陷苦，偷渡运河来。
急呼炮不准，东岳庙里开。
那是火药库，轰毁敌全埋。
果然十数吼，近卫师团崩。
大汉忠贞妇，洒上子弟兵。
今后谁常胜，功成氏无名。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徐州致美楼。
当时诗稿已失，此乃追忆，增删而成。

四十七勇士

西北转向南，攻开敌后方。
田边歼右哨，绕道麦中央。
敌注视前线，包围不及防。
右轰左扫荡，动摇急逃亡。
前冲后跟踪，四十七英雄。
近卫师团溃，日暮又途穷。

牺牲四十五，二士担架逢。
醒来问消息，告以大捷中。
伤重命难续，复仇必反攻。
共誓一同死，四十七英雄。
台庄传捷报，南北中西东。
含哀呼尚飨，饰终酒满盅。

注：饰终即“加等饰终，仰推令典”，乃我国古代增加为国捐躯之光荣，尊荣死者的典礼。

回忆史迪威将军

一

花园饭店隔墙邻，上校武官美国民。
彼此寒暄明底蕴，达夫与我闯风尘。

二

台儿庄要美传真（李宗仁语），史迪威见李宗仁。
一夕倾谈前线去，战地文章报捷春。
以上打油诗二首在致美楼午后作并赠诸同志。

三

乐群重聚桂林迟，语重心长再会期。
打通一条滇缅路，日本投降君已离。

一九四五年七月 昆明

四

舟中天下可怜虫，流打洋场氓进宫。
先是丧家鹰犬颂，戒严令烛反攻风。
蒋至台湾，御用文人文孙发表为他驳斥史迪威长篇文章多次，在台感赋。

五

我为达夫追往事，当年正气竟皆碑。
公私一念留真伪，四海无声只有诗。
陈子善君自沪来京为达夫索稿，因口述往事，并及史将军，遂成终阙云。一九八四年 北京

（原载 1987 年 10 月香港《明报月刊》262 期）

我与夏公通信

夏公，是夏衍先生的同代人或下一辈对他的尊称和爱称，大陆文学艺术界谁人不知？就年龄而言，我已属于他的孙儿辈，应该称他夏老或夏爷爷，但我觉得还是从众显得更为亲切，更能体现我们之间的忘年友情。

我与夏公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初夏。我因参与《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已记不起当时是为了哪个疑难问题冒昧登门向夏公求教的，谈话的具体情形也已不复记忆。这只能怪我记性太差，我实在佩服近年大写长篇回忆录的各色名流，竟能把十多年乃至几十年前的往事包括当时的对话之类写得那么细致生动，活灵活现，我自愧弗如。但有两点却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夏公身体的瘦弱和谈兴的浓厚，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自己算得是瘦骨零仃的了，夏公却比我尤甚，枯手残腿，不知怎的让我联想到他早期的名作《包身工》中骨瘦如柴的女童工。二是我们谈话时，在他写字桌上窜上跳下的一只小花猫，这使我大感意外，没想到夏公如此温情，如此热爱可爱的小生命，那还是个抹煞个性抹煞个人爱好的年代啊！后来我才知道，夏公的爱猫如冰心老人的爱猫，在老一辈作家中是传为佳话的。

此后数年，夏公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越来越忙，我无事也就不再打扰。直到我着手研究郁达夫和潘汉年这两位同属创造社的现代作家，才又开始与夏公通信。夏公热情有礼，去信必复，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就请秘书代笔。他晚年的代表作《懒寻旧梦录》问世以后，我发现书中虽提到他抗战胜利后去过新加坡，但未忆及他曾为胡愈之先生主编的新加坡《风下》周刊撰写的一批精采的杂文，当我写信告诉他后，他十分高兴，让秘书回信致谢，表示“很希望能找到这几篇旧作看看”，文人的敝帚自珍由此可见一斑。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夏公亲自给我回信，现从中检出三封公布，并略加说明。

子善同志：

二十五日手札收悉。承指出潘汉年没有参加A11之事，我是引用了别人写的材料，经核对，的确潘回上海后该刊已停，故已在《新华文摘》转载该文时，请他们改正了，谢谢！郁达夫和我交游不深，加上近来身体不好，而又文债不少，不能从命了。

问好！

夏衍 十七

此信写于1982年12月17日。当时夏公发表了一篇令文坛震动的长文《纪念潘汉年同志》，为早期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成为中共情报工作重要代表的潘汉年所蒙受的大冤案平反，文中提到潘汉年在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回到上海主编《A11》周刊一事，经我查考与史实有出入，因为潘汉年以“创造社小伙计”的身份创办《A11》周刊是1926年4月，刊物出版了一个月即停刊。因此，我给夏公去信指出，他立即接受我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他老人家的一丝不苟，不能不使我感动。

我当时已起意编集《回忆郁达夫》一书，故而在信中又恳请夏公拨冗撰文纪念这位曾被左联开除的著名作家。夏公虽未马上答允，使我感到些许遗憾，但三年后为纪念郁达夫殉国40周年，夏公还是应画家郁风女士之请撰写了那篇有名的《忆郁达夫》，我终于夙愿以偿。

子善同志：

手札拜悉。汉年文集迟迟未能出版，我看主要是去冬以来出版界发生了经济困难之故，去冬今春出版的正经一点的文艺书籍，印数大多不超过五千，看来出版社也确有难处。目前情况稍有好转，您再催问一下如何？所询《自由谈》上丁一山所写文章之事，可以肯定不是我写的，原因之一是我当时忙于电影方面的工作，这一类题目的文章不会写。其次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中央局第二次大破坏，翌年二月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我们正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在《申报》上写文章也。这件事，您不妨向唐弢同志请教，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勿复，并致敬礼！

夏衍 九月二十一日

此信写于1987年9月21日。为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空白，我与王自立兄合作，费时三载，经过多方搜集整理，编成了《牺牲者——潘汉年文学作品选》。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自始至终得到夏公的关心和支持，正是由于他的热心介绍，我们才请到李一氓先生为此书作序。但书稿交付花城出版社后迟迟未见付梓，我不禁焦急，写信时不免向夏公抱怨了几句，夏公就在回信中安慰和开导我。我还就当时有人称“丁一山”是夏公的笔名向他求证，他也在这封信中作了详尽的解答。

子善同志：

五月二十五日手书收到。关于拙作《上海屋檐下》，三七年上海版和四〇年的三版本我都没有看过校样，解放后文学出版社又出版过一次，那时出版社给我改了几处，如把讲拿破仑故事改为愚公移山的故事等等。这件事，我曾向出版社提过意见。因此到一九八四年戏剧出版社编辑《夏衍剧作集》（三册）时，我同意按初版重印，并自己校对了一遍，作了一些误植的改正，内容没有改动。所以“教材”如选用，盼能以戏剧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为准。

潘汉年作品选能出版，已经可以告慰死者的了，我们对您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是十分心感的。匆匆致敬礼！

夏衍 六月五日

此信写于1988年6月5日。潘汉年的文学作品选终于在是年2月出版了，我给夏公寄去了样书，他欣慰之余，在回信中对我勸勉有加，真使我受之有愧。当时我参加编选大学文科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拟收入夏公的名剧《上海屋檐下》第二幕，就版本源流向夏公请教。他又不厌其烦地作了说明，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从而使我们的编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他的这段回忆也成了珍贵的文坛史料。

一个月前，夏公走了，被誉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元老，新兴戏剧和电影的开山者，进步新闻工作的奠基人”（柯灵先生语）的夏公走了。以95岁的高龄，本可谓寿比南山，去而无憾了。但作为受过他指点和帮助的后辈，我仍感到无限悲痛。夏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杰出贡献，自有方家探讨评说，我只能写下与夏公通信的点点滴滴，以此寄托我的深切哀思。

1995年3月6日于上海

(原载 1995 年 5 月《香港文学》第 128 期)

赵景深先生对我的帮助

当笔者从上海电视新闻中听到赵景深先生逝世的噩耗时，恍如晴天霹雳，不禁惊呆了。去年，上海举办全国省版书市期间，赵先生还兴致勃勃地赴会道贺。会议开始前，包子衍兄和笔者一起去向赵先生问候请安，他老人家紧握着笔者的手，连声说：“你是搞郁达夫的，记得，记得！”我告诉他拙编《回忆郁达夫》将出书，以纪念达夫先生被害40周年，赵先生宽慰地笑了，勉励我说：“你们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很有意义！”又有谁会料到，没过两个月，赵先生就突然离开了我们。

赵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作家、戏曲史家、小说史家、现代文学史家、翻译家和语文教育家。早在五四时期，赵先生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是天津新文学团体绿波社的社长，1923年秋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这个新文学运动“最早且亦最大最光荣的文学团体”（赵先生语）的中坚分子。从1930年起，赵先生担任出版新文学作品“四大书店”之一的北新书局的编辑达12年之久，他主编的《青年界》杂志在大中学生和文学爱好者中广为流行，影响及于全国。也就在1930年，赵先生又出任复旦大学教授，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直到现在。

赵先生治学范围宽，涉猎亦广，在中国古典戏曲史、小说史、曲艺史以及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诸方面都卓有建树，其中《中国文学小史》曾受到闻一多先生的赏识，把它比作Macy的《世界文学的故事》，推荐为清华大学学生入学考试的必读书，六年内重印达15次之多。不久前，笔者就曾在旧书肆中偶然得到一册第15次重印的《中国文学小史》，扉页上有赵先生的亲笔题签：“瑾弟：傻大哥景深六月十三日”。特别是他老人家对于戏曲的钻研和爱好可谓一往情深，乐此不疲，半个世纪如一日。赵先生被人尊称为“戏剧研究的泰斗”和“曲海宗师”，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记得那天下午与王自立兄一起到赵先生家，他刚接待过一批客人，来不及休息，就热情地与我们握手，关切地询问我们的研究情况，当他得知我们正在搜集达夫先生的佚文时，马上转身到书房里取出厚厚一大本剪贴得整整齐齐的书信集来，高兴地说：“你们只在《月刊》上见到一封达夫先生给我的信，其实我还保存着一封呢！你们可以看 赵景深著《文人剪影》扉页和他的题签看。”我们翻阅着这本珍藏多年，纸张已经泛黄变脆的书信集，确实被深深吸引住了。这是赵先生1940年元旦所辑的现代中国作家给他的书信集，分为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散文家、文评家、文史家六类，其中除了两封达夫先生的手札外，还有胡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王统照、汪静之、沈从文、巴金、老舍、王鲁彦、朱湘、戴望舒、许钦文、许杰、彭家煌、蹇先艾、黎锦明、叶灵凤、叶鼎洛、施蛰存、邵洵美、艾芜等人的函件，另有许多作家，我已记不清名字了，真是丰富多采，令人目不暇接。显而易见，这是一批极为珍贵的现代文学史料，经过十年浩劫，得以幸存，实在难得。我们在征求赵先生同意，抄录这两封郁达夫手札的同时（现已编入拙编《郁达夫文集》第九卷），建议赵先生拨冗把这批书信整理付梓，供现代文学研究者参考。赵先生满口应允：“我本来也有这个想法，经你们这一催促，我一定尽快整理出来，只是时间相隔多年，信中所说的一些事已记不全了。”果不多久，我们就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六

辑和第七辑上读到赵先生亲自编排注释的《现代作家书简》中《小说家书简》和《诗人书简》两部分，但《戏剧家书简》等其他四部分却未见继续刊出，大概赵先生忙于戏曲史和小说史的研究，暂时中断了这项工作。而今赵先生已经故去，希望能有人来完成赵先生的未竟之志，使其他四部分珍贵书信早日与读者见面。

到了1982年下半年，我们开始编辑《回忆郁达夫》，自然而然想到应请赵先生惠稿，而且巧得很，笔者适在这时发现了北新书局出版《达夫全集》的预告（载1949年1月《青年界》新六卷第五号封底），全集编纂委员会由郭沫若、郑振铎、刘大杰、赵景深、李小峰、郁飞六人组成，计划出版“六大厚册，二百万言”，即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日记游记集、散文杂文集、文艺论文集和译文杂著集，但这部全集后来未能问世。因此，立即写信给赵先生，一则恳请他老人家为拙编撰文，二则询问北新书局拟出《达夫全集》事。赵先生在7月21日的回信中说：“我也正在想念1949年《青年界》某期第四版刊登的《达夫全集》出版预告的广告（好像是套色的），编辑人似有振铎、大杰、小峰和我。我曾在《沫若全集与达夫全集》一文注释中略谈这全集六卷的概况，但没有谈得详细，可能还有错误。蒙允设法用静电复印一份寄给我，非常感谢。拙文一定在年底以前写就，写好后就寄给你。我当写我编此全集的经过，另外还写我与达夫的交往等。我本来写过一篇《达夫全集序》，早已遗失，实是可惜。”我于是把这则预告的照片寄给赵先生，隔了两个月，赵先生在12月14日的回信中，首先就自己患病毒性感冒，“未能及时复信为歉”，接着就说：“这照片很清楚，很珍贵”，“我当拉杂地写回忆录，主要写我怎样编辑《达夫全集》，两封信也许想附谈一下。”就这样，我和赵先生就如何撰写郁达夫回忆录多次书信往还，他老人家没有一点架子，虚心接受我这个后辈的一些建议，使我很受感动。他在1983年1月2日的来信中说：“您的建议很好，我编《郁达夫论》也当作为一节来谈。我虽未写，但准备工作已作了不少，即尽力引起我的回忆。”2月9日，他在来信中又说：“拙文完稿日期一再移后，非常抱歉，但我对此事是时刻在心的。”

三个月之后，赵先生这篇《郁达夫回忆录》终于杀青了，全文长达万字，分为“《文人剪影》及其他”、“《郁达夫论》”和“《达夫全集》”三大部分。赵先生这篇回忆录详细追述了他与达夫先生交往的经过，他编《郁达夫论》和《达夫全集》的始末，还别具一格地附有几份比较表。文中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很值得我们重视，如尽管纸型都已打好，何以北新书局最终未能出版六卷本《达夫全集》，这一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赵先生的回忆就揭开了这个谜，他说：“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曾由陈子展陪我去见郭沫若，询问沫若是否可以出《达夫全集》，沫若认为其中黄色描写有副作用，不宜出全集，只能出选集。后来书店都要国营，北新书局合并到三联出版社，再合并到上海文化出版社，因此这部《达夫全集》始终未能刊行。”

遗憾的是，赵先生与许钦文先生一样，未及看到拙编《回忆郁达夫》出书，就溘然长逝了。笔者与赵先生接触不能算多，不敢说对赵先生的道德文章有多大的了解，全面评价赵先生留给我们的几百万字的宝贵遗产，更非笔者力所能及，作为一个受过赵先生教泽的后辈，只能用这篇不像样的悼念文章来寄托我深切的哀思。愿赵先生安息！

(原载 1985 年 2 月 10 日香港《文汇报·笔汇》)

琐忆胡风先生

胡风先生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深感震惊和悲痛。虽然我早知道他身体不好，但他已几度战胜病魔，我总相信他生命力的顽强，不会这么快就离开我们的。我与胡风先生的接触并不多，一共才见过三次面。1980年夏天，我在北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的定稿工作，记得那时已查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大冤案，胡风先生从四川到了北京，经与梅志先生商定，我和一位同事在8月1日下午去拜访胡风先生，就定稿工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向他求教。也许因为我们是注释《鲁迅全集》的，胡风先生对我们格外亲热，他不顾病后体弱，侃侃而谈。可是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我们不能全听懂，于是只好请梅志先生充当临时“翻译”。我提起胡风先生写的一份回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材料，他大为诧异，连声问我们是怎样见到这份材料的。原来，这是我们与胡风先生的一次特殊的“交往”。三年前，为了注释鲁迅给他的六封信，我们与复旦大学的同行们共同提出一些问题，辗转通过有关部门向他请教，因为胡风先生那时还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身陷囹圄，我们无法与他直接联系。隔了一段时间，复旦大学的同行转来这份他写的长达几十页，洋洋数万言的文字材料，文中详细解答了我们的问题，并从历史的和哲理的高度，坦率地陈述了他对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对与鲁迅的关系以及对两个口号论争的看法。读着这篇在狱中写成的回忆文字，我激动不已，不仅佩服胡风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更为他坚定执著、光明磊落的态度所吸引。当我说明事情经过并衷心感谢他对我们的帮助时，胡风先生才恍然大悟，他说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梅志先生边“翻译”边告诉我们，胡风先生写这份材料费了不少心思，却不知道谁需要它，今天总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胡风先生听着也不禁笑了。

隔了半个月，我们第二次去看胡风先生，仍是梅志先生当“翻译”。大家无拘无束，谈得更为融洽。胡风先生还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生活情景，告诉我们他用“胡风”这个笔名，就是因为母亲姓胡。我想起“鲁迅”这个笔名也是用的母亲的姓，许多大作家对自己的母亲都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这是值得深思的。在谈话中，胡风先生不时流露出对鲁迅的深切怀念，对萧军、聂绀弩、路翎等人的思念，还透露了他和梅志曾帮助鲁迅编辑《海上述林》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根据这两次谈话内容，我们整理了一份纪录稿送请胡风先生过目审定，这就是后来发表在《鲁迅研究资料》第九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上的《关于左联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

至于第三次与胡风先生见面的时间，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是闻讯他脑疾复发，我赶往医院探望，他几乎不认识我了，经梅志先生解释了几句，他才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梅志先生告诉我，他这病是在狱中得的，时好时坏。我亲眼目睹一代文豪身心所受的严重摧残，真是百感交集。为了不多打扰他老人家的休息，我没坐多久就起身告辞，胡风先生特地嘱咐梅志先生把我送到车站，一路上我们谈到他今后的安排和生活，我安慰梅志先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千百万读者不会忘记胡风先生，人民不会忘记胡风先生！

果不多久，胡风先生彻底平反的消息正式公布了，全国政协、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全国作协先后为他安排了工作，他的身体也大有好转，并不时有新作问世。这一连串好消息实在令人高兴，我曾写信向他老人家致贺，他在由梅志先生代笔的信中表示了感谢。近年来，由于我的研究对象有所改

变，与胡风先生联系少了，但只要我去信，他总是让梅志先生及时作复。我編集《回忆郁达夫》一书时，考虑到他老人家抗战初期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郁达夫共过事（郁达夫任研究部主任，他任副主任），曾去信恳请他写点什么。胡风先生让梅志先生回信说，他很尊重郁达夫，但在武汉期间与郁达夫接触并不多，想来想去，没有可记之事，只能不写了，请我谅解。我虽然不无遗憾，仍不能不认为他这种严谨的写作态度是对的。

一个多月前，上海书店就影印三四十年代文学刊物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建议重印胡风先生主编的《七月》和《希望》。谁都知道，这两种刊物在40年代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七月”诗派。我对他们说，胡风先生如果知道了，一定会感到欣慰，而且只要他身体许可，他一定乐意为影印本作序。谁知此事尚未进行，他老人家就溘然长逝了，怎不叫人痛惜？

胡风先生说过：“我首先是诗人”。他失去自由20多年，从未放下手中的笔，无法继续从事理论研究，他就写诗，写了许许多多诗，不供发表其实也无处发表的诗。这些诗大部分保存下来了，他曾亲口对我说过，长短短大概有多少首，我记不确切了，总在万首以上吧。这是真正用心血写成的诗，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奇葩。而今胡风先生已经故去，我认为应该将它们整理出版，与海内外广大读者见面。这些诗与厚厚三大册《胡风评论集》一样，是胡风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遗产！这样做，也是我们对胡风先生最好的纪念。

（原载1985年7月12日香港《文汇报·笔汇》）

彭芳草自述生平及其他

顷读《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上张小鼎先生的《彭家煌与彭芳草》，文中指出《鲁迅全集》注释把彭家煌与彭芳草混为一人的错误，考辨有据，令人信服。但对彭芳草生平，由于缺乏第一手史料，只能引用顾凤城编《中外文学家辞典》中的简略介绍。因此，有必要进行补充，以利于对这位鲜为人知的30年代作家的研究。

彭芳草先生已于1987年12月13日在开封病逝。他生前曾与笔者通信，自述生平甚详，现把他1986年6月13日亲笔所写履历照录如下：

彭芳草，男，汉族，原名山寿，字叔美，芳草係20年代从事文艺写作时所用笔名，原名即废弃不用。湖北武昌人，1903年9月出生于破落了的封建官僚家庭。幼年未受正规教育，仅在私塾和英文夜校就读。1922—1927年间，先后在北京以半工半读方式就学于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时代参加政治运动，曾兼有国共两党党籍，但1930年后已无任何党派组织关系，1980年起任开封市政协第四届委员。1940年以前，主要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在京、沪、汉、宁等地报纸任职，曾任北平《世界日报》总主笔，上海神州国光社编审科长等。1940年以后，以教学为主，曾任广东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华文化学院新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等。1950年起任河南大学地理系教授至今，其间曾兼任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多年。主要学术活动：20~30年代从事文艺创作，著有《厄运》（小说）、《苦酒集》（杂文）等；30~40年代从事国际政治研究，著有《国际政治经济年报》、《均势主义批判》等篇；50年代起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地理研究，著有《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和危害》、《国家地理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政治地理的变化》等篇。曾任开封市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获开封市科协优秀作品奖。

此外，彭芳草先生1985年7月10日致笔者信中还专门谈到他的文学生涯，他说：“我不是专业的文艺作者，我的几部作品都是在编辑副刊时逼写出来的急就章，最后为了生活，才集合起来卖给书店”。他还说长篇小说《管他呢》“描写当时一部分醉生梦死的大学生，最后终于觉悟不能不管完结”（原文如此——笔者注）；杂文集《苦酒集》“主要收集北京《心声晚报》附刊文字”；长篇小说《厄运》“描述当时一个人力车夫的苦难遭遇”；短篇小说《走向死灭之路》（载《读书杂志》第一期）“描述某个钢铁工人在革命失败后的苦难”，等等。

关于学术界把他和彭家煌混为一，彭先生也在此信中有所说明，他说：

（一）芳草、彭芳草都是我笔名，后来正规化，自20年代我在北京《心声晚报》编副刊起，到今天80年代，从未改名，都有证可查。把我和彭家煌混为一，是错误的。赵景深教授说曾为文更正过。

（二）据传冯沅君教授（山东大学）曾对我的文学活动作过评价，认为我学习鲁迅文笔可以乱真，但内容不能超其范围。这使我愧不敢当。有人说：我不搞文艺是怕丢丑。这都不对，实际是因为没有强大外界压力，就提不起笔来。（冯君批评文字，赵景深曾把英文原文抄给我，十年动乱期间被指为自我吹嘘的材料，撕碎了。）

彭先生这里有一点误记，对他的文学活动作出评价的不是冯沅君，而是

另一位女作家苏雪林。苏雪林在《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英文版，1948年北平怀仁学会出版）的《导论》中称彭芳草是杂文作家，其所写杂文摹仿鲁迅，几可乱真。不管苏雪林的评价是否恰当，彭芳草的杂文受到鲁迅影响恐怕是确实的，希望对中国现代杂文史有兴趣的同好能够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原载 1988 年 6 月北京《鲁迅研究动态》第 6 期）

台静农先生的两篇佚文

1990年11月9日，台静农先生在台北溘然长逝。海峡两岸共同敬重的文坛前辈，当代知识界清流的表率，又有一位离开了我们。

台先生早岁积极从事新文学创作，与韦素园、李霁野等组织“未名社”，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蜚声新文坛，深得鲁迅赏识，为现代乡土文学家的代表，后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也卓有建树，自成一家。但自从他1946年渡海赴台执教于台湾大学以后，由于长期的人为阻隔，大陆读者几十年来一直无缘拜读台先生的新作，这实在是大陆文化界的不幸。

四年前，香港作家林真兄寄给笔者一本台湾旅美女作家洪素丽主编的《一九八四年台湾散文选》（台北前卫出版社版），没想到开首第一篇就是台先生的《关于西山逸士二三事》。笔者立刻被这篇恬淡悠远、韵味深长的回忆文字所吸引，诵读再三，爱不释手。从此就锐意穷搜台先生在台湾发表的各类文章，在许多海内外同好的协助下，日积月累，竟然为数可观，特别是那些独具风格的散文，可以编成一本集子推荐给大陆读者了。台先生晚年的散文，不论忆人记事，还是谈文说艺，都不做作，少雕饰，天然浑成，传神传真，传情传心，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必将受到大陆读者的欢迎，这是笔者深信不疑的。

不久，笔者通过远在美国的台益坚教授与台先生取得联系。台先生不仅惠允拙编出版，而且从书名到删选篇目，都悉心指点，使笔者深受感动。可惜台先生终于未能等到大陆版《台静农散文集（1948—1989）》问世，就匆匆地也许是不无遗憾地走了。

这里所介绍的台先生两篇佚文，是编选台先生散文集时，由北京舒芜先生提供的。但是后来遵照台先生本人的意愿，散文集只收他赴台后的作品，这两篇作于1946年赴台前的散文限于体例，只能割爱。现在台先生已经谢世，笔者不敢永藏私筐，决定将其公之于世，作为对台先生的一个纪念。

第一篇佚文是根据台先生墨迹照录的，其中提到的方重禹不是别人，就是舒芜。舒芜出身书香世家，是清末桐城派巨子方苞的后人，其父方孝岳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其堂姑方令孺和堂兄方玮德也都是名重一时的新月派作家。舒芜40年代在四川江津白沙镇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文学系任教时，与台先生共事数年，交谊甚笃，这篇题跋就是两人友情的见证。至于第二篇所说的叶广度，是台先生好友四川大学叶麟教授之弟，这本诗集似未见刊行，但叶广度的诗一定颇有特色，否则台先生不会如此推崇备至，台先生的耿直狷介在这篇古雅清通的序文中也可见一斑了。

跋自书鲁迅诗卷赠方重禹

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余自青岛到平，寓魏建功兄处之独后来堂。又三日，芦沟桥事变起，余遂困居危城，不得南归。时建功兄方辑鲁迅师遗诗，钞写成卷，余因过录两卷，此一卷钞成于八月七日。明日，敌军进城，有所谓敌军入城司令者，公然布告安民，又三日，余乘车去天津，由津海道南行，回忆尔时流离道途之情，曷胜感喟。今胜利将及一年，内战四起，流民欲归不得，其困苦之状实倍于曩昔，此又何耶？

今检斯卷赠重禹兄，追寻往事，随笔及之。禹兄与余同辞国立女师学院讲席，后复同寓旧院两月有余，后日东归，此别不知何年再得诗酒之乐，得不同此惘惘耶？

静农记于白苍山庄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

《叶广度诗集》序

夫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固达士所深惜，而人情所难为。然而，呵壁问天，日斜叩鵬，徜徉泽畔，歌哭无端，忧能伤人，意自难免。

吾友叶君广度，少有奇节，壮历忧患，丧乱以来，憩影沙头，问樊迟之稼，学东陵之瓜，似乐放逸，与世相忘。然而，骨梗横胸，芒角在喉，发为歌咏，多见慷慨，是岂如渊明所云：“人生实难”，有不获己之情乎？

丙戌之夏，余困居废院，槐阴蔽道，鼯鼠当阶，昨犹弦歌，今若败刹，环诵斯集，感喟不胜，恨无藻翰如吾广度，抒吾愤懣于万一耳。

附 记：

今日上午刚寄出拙稿，下午就收到北京寄来的一包书，打开一看，不禁呆住：《台静农散文集》赫然在矣。素雅的装帧设计，一如台先生的为人，还带着油墨清香！包内有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的一封信，说“《台静农散文集》已出版，现寄上赠书共 20 册，其中台静农先生十册，您本人十册，请查收。”书是 9 月出版，10 月 23 日寄出的；从北京到上海，邮程竟长达一个月又六天！如果书能早一点寄到上海，也许还赶得上及时转往台北，让台先生在弥留之际见到，多少也算是个安慰吧？现在，一切都晚了。

1990 年 11 月 29 日晚
(原载 1991 年 1 月香港《明报月刊》301 期)

遗憾和欣喜

平生爱读书，藏书，也爱编书。现在单说编书，屈指一算，与人合作和自己独立完成的，已达十多种，有郁达夫的文集，潘汉年的文学作品，有梁实秋的文学回忆录，还有周作人的集外文……，多少也有些影响。但似乎命中注定，每编成一种集子出版，都成了令人遗憾的事。此话从何说起？因为出书后总发现有所缺漏，不是自己有了新的发掘，就是识与不识的师长文友热心提供。既然自认为从事的是钩沉辑佚，是严肃的文学积累工作，就不免有愧对读者之感。虽然可以主客观条件限制为由原谅自己，譬如日本学者为搜集郁达夫资料自由来往于新加坡、印尼、台湾、香港和大陆之间，我哪有这种可能？但每念及此，毕竟深感遗憾。而今出书，绝大部分初版等于绝版，再版的可能微乎其微，以致即使有了新资料也无法再出增订本，这样作为编者，我的遗憾就几乎是永远的了。

新近编印了一本《台静农散文选》（人民日报出版社版），尽管只有薄薄15万字，却历时四载，此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尤其当书终于问世时，远在台北的台静农先生已溘然长逝，不及亲见，使编者的我更平添遗憾和惆怅。由于海天阻隔，搜集资料难上加难，我深知这本散文选遗珠之憾更无法幸免。正巧《新文学史料》将出台老纪念专辑，我于是急就《台静农先生后期著作系年》应命，以期高明指点。果然，日前接到北京张香山先生惠寄之台老《〈闲情集〉序》，正为拙编所未收者，我的欣喜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张先生30年代是天津“左联”和“左联”东京分盟的成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坛前辈，但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张雪门先生公子，我以前一无所知，他老人家对后学的关心帮助，使我衷心感激！

张雪门先生在台湾付梓的旧体诗集《闲情集》大概是非卖品，印数甚少，仅在友好间传阅，因此台湾洪范书店出版的《龙坡杂文》也未能收入此序。时隔多年，很可能台老自己也已忘却，显然是一篇不折不扣的佚文。此序以浅显的文言出之，娓娓道来，情文并茂，对老友诗艺人品的褒扬恰如其分，堪称现代文人序跋之佳作。可我在欣喜之余，遗憾之情不禁又袭上心头，拙编虽早已被读者抢购一空，再版仍然无望，遑论增补？为了不使台老佚文长存私篋，我思之再三，决定先期披露，一则答谢张香山先生的美意，二则以飨爱好台老作品的许多读书人，也好使我这次的欣喜不致再为遗憾所代替。现将台先生为《闲情集》所作序文照录如下：

宁波张雪门先生以赤子之心，具胞与之怀，毕生精力，瘁于教学。昔年主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及香山慈幼院，海内治幼稚教育学者，咸推先生为巨擘。抗战军兴，奔波各地，于戎马仓皇中率其弟子，以培植幼苗为务。应邀来台，创台北育幼院，规模略具，以目疾退休，门弟子为葺石室于大屯山麓居焉。虽病发，犹勤造述，为从事教育者指南。今年先生八十矣，以诗稿寄静农曰：“拙稿起于无题，止于闲情，幼百余首，皆予五十后心声，以系业余之作，名曰闲情，不亦可乎，子为我序之。”盖尝闻之于先生，无题诸诗作于民国三十三年，时先生任教于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上元节诸诗，作于战后与家人团聚时。三十五年七月，由平飞沪，转航来台，作南行诸诗。四十九年骤患风痺，艰于行履，作病中诸诗。五十年来，得诗止此数，是知先生不欲以诗名也。然诗者性情所之，哀乐所寄，往往发乎不能已。若眷怀故国，涕泗河山，或惆怅清歌，凄凉子夜，此则先生不能不以诗写其高致，而读先生诗者，亦可想见先生之风概矣。静农始交先生于北平，渡海南来，时

以尊酒为乐，自先生病发，此乐已不可得，犹时以诗简见投，每愧无以酬。承命为序，不能辞，非敢以言知先生诗者。

辛亥六月台静农于台北市歇脚龕
(原载 1991 年 8 月 30 日成都《读书人报》)

我所知道的巴老二三事

德高望重的巴老不辞年迈体弱，欣然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飞往香港接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消息传出，大家都很高兴。在港澳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巴老抵港之际，我不禁想起巴老与我有关的几件事。

我知道巴老的名字，还是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那篇有名的散文《从镰仓带回的照片》，明丽流畅，亲切真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害”肆虐期间，巴老被诬为“黑老 K”，受尽迫害和折磨，我则暗暗珍藏着两本“非法”得来的已经破旧的《春》和《秋》，并以始终搞不到一本《家》而深以为憾。“四害”被粉碎后，巴老的书得以重见天日，我才买到一套崭新的“激流三部曲”，夙愿以偿。

我唯一的一次与巴老见面是在 1978 年春天。那时我已在大学担任教职，并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为了解决鲁迅后期书信注释中的几个疑难问题，希望能去拜访他，向他求教。我现在已记不起当时是写信还是打电话与巴老联系的，反正很快就得到了同意见面的回音，使我喜出望外。见面的日子我倒还记得一清二楚，是在 4 月 29 日。那天上午八时半，我准时到武康路巴老家中，巴老在楼下的客厅里热情接待了我。他有点感冒，但说话依然缓慢而有力，尽可能详细地回忆、解答了我的问题，只是他老人家那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没有每句话都听懂。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发现巴老对已故的挚友黎烈文先生怀着深厚的感情，谈到有人把黎先生说成“反动文人”，“逃往台湾”，巴老十分愤慨。那时“四害”虽已除掉，严冬并未完全过去，还是乍寒乍暖的时节，巴老对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说这些话，顿使我肃然起敬。我回家后立即整理了一份简要的谈话记录送交巴老审定，他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一些修改，还加了两条注释，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的《访问巴金同志——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这篇访问记首次提供了 1936 年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领衔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是巴老和黎烈文两人共同起草的这个重要史实，一时颇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再去打扰巴老，因为我深知巴老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够好，更何况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他老人家被“四害”剥夺了创作的权利，而今重新拿起笔来，有多少心里话要向读者倾吐，有多少新的想法要与读者交流，他壮心不已，要续译赫尔岑的《往事与深思》，要一本一本地写《随想录》，还要创作反映知识分子艰难历程的长篇小说……时间之于巴老，显得格外紧迫和宝贵，我们不能妨碍他，干扰他。然而，有一次我还是忍不住去麻烦了他老人家。

那是 1981 年 4 月间的事。福州的赵家欣先生写信告诉我，他写了一本回忆录《风雨故人情》，其中有一篇《黎烈文与改进出版社》，想找一张黎烈文先生的照片作为插图，因在福州遍觅不获，嘱我在沪设法。我一时也无处去找，突然想到或可向巴老求援，巴老亲口对我说过黎先生，后来又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怀念烈文》，也许他那里能找到黎先生的照片？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应拿这样的琐事去增加巴老的负担，踌躇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写了信，说明原委，请求帮助。约一个月后，我接到一封信，信封落款是“文联金铨”，我一眼就看出这是巴老的笔迹，急忙打开信封，里面有二张黎先生晚年的照片，一张是单人照，另一张是全家合影，二张照片都是从

一书中撕下来的，都很清晰。可以想见巴老接到我的信以后，找来找去找不到黎先生的照片，为了不使我失望，才从藏书中撕下这二张照片寄给我。这真使我既感激又不安，我不但浪费了他的宝贵时间，还使他损坏了一本书。巴老这种热诚关心后学的做法，与当年鲁迅先生为了帮助文学青年，不惜牺牲自己的珍贵藏书一样，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我马上挑选了单人照寄给赵家欣先生，可惜后来由于印刷上的原因，巴老惠寄的这张照片未能在《风雨故人情》中刊出。

自 1982 年起，香港三联书店和广州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郁达夫文集》和《沈从文文集》，王自立兄和我应邀担任《郁达夫文集》的编辑工作。花城社苏晨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们，巴老对出版这二套文集很赞同，很支持，文集出版后也按卷寄给巴老。这对我们不啻是鼓励和鞭策。我知道巴老未必注意到他曾经帮助过的我这个青年人就是文集的编者之一，但他对文坛前辈的敬重，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尤其当有人对这二套文集中风言风语的时候，我就想起巴老对文集的关心，更坚定了工作的勇气和信心。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去年 3 月初的一天，我路过一家旧书店，无意中发现书架上有一本巴老散文集《忆》的初版本，书品甚好，打开一看，扉页上又赫然有着这样几个钢笔字：“赠彼岸先生 巴金”，原来这是巴老 30 年代的签名本，而今已极为难得，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着实得意了几天。不过，这位“彼岸先生”是谁？我却一无所知。当时巴老刚因骨折住院治疗，自然不能再惊扰。不久，我与柯灵先生通信，就请他便中转达我的问候，并代询“彼岸先生”情况。柯老回信说：“嘱代询巴金同志事，据云‘彼岸’姓郑，是老华侨，现健在，任广东文史馆馆员。巴老自己也买到一本赠彼岸的书。”这真是太巧了，也可算是我与巴老交往中一个有趣的插曲吧。

以巴老的声望和在文学上的成就，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是完全当之无愧的。本文发表时，巴老可能已经圆满结束在香港的活动飞返上海了，再过一个月，又是巴老的 80 岁诞辰，作为一个热爱他老人家又受过他指教的后辈，我衷心祝愿巴老健康长寿，下次再访香港。

1984 年 10 月于上海

（原载 1984 年 10 月 26 日香港《文汇报·笔汇》）

附 记

1994 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全集》最后一卷，即第 26 卷《日记编（下）》，首次公开了巴老的《上海日记》（1966 年 1 月至 9 月）和《“文革”后日记》（1977 年 5 月至 1982 年 4 月）。有友人阅后见告，日记中提到我。可是因为忙乱，我一直没去复查。

今天在日本学者平井博先生的书房里见到《巴金全集》第 26 卷，翻开一查，果然有我当年拜访巴老的记载。1977 年 4 月 29 日巴老日记云：

（晴）七点后起。上午师大黄成周、陈子善来谈鲁迅书信注释事，坐了大半个小时。

同年 5 月 3 日巴老日记又云：

师大鲁著注释组来信。寄还师大鲁著注释组的记录稿。

巴老真是认真仔细，记得如此具体。这样，拙文中所回忆的令我感动的往事在巴老日记中也得到了证实。

时光流逝了整整 20 年。9 月 21 日下午，即我赴日访学前五天，我在杭州巴老休养地又一次拜见了巴老，并陪同坐在轮椅上的巴老在风景秀美的西湖边绿阴小道上散步，在“夕阳无限好”的黄昏与巴老合影留念。巴老说话已不大连贯，头脑仍很清晰。我没有具体的问题要请教，能再次见到巴老已经心满意足了。当同去的李辉兄建议巴老把“文革”中被迫写下的大量“检讨”整理出书时，巴老明确表示：“等我死了以后再出。”这话给我以震动，想必也为关心巴老的读者所关注，因而及时附记于此。

1997 年 10 月 3 日于东京都立大学

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

这几年岁暮，经常收到海内外师友的贺年卡，多姿多采，琳琅满目，令我欣喜不已。因为，正是这一枚枚小小的贺年卡，把我与许许多多时相过从或从未谋面的师友的心紧紧维系在一起，彼此互祝新年好，新年笔健，新年万事如意！

我今年得到的贺年卡中，数施蛰存先生惠赠的最为别致。这是一枚 64 开、白底红字的自制贺年卡，上录宋代词人赵长卿的《探春令·早春》：

笙歌间错华筵后，喜新春新岁。菜传纤手，青丝轻细。和气入，东风里。幡儿胜儿都姑姊。戴得更吃戏。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

这枚贺年卡薄薄一纸，朴实无华，却堪称高洁素雅，另有一番情趣，凡见过的，莫不爱不释手。

赵长卿其人，在宋代词人中大概属于二三流之列，后来的各种宋词选本几乎都不选他的作品，就是一个明证。唐圭璋先生编的《全宋词》中虽然录有他的词三百多阕，关于他的身世，只有寥寥数语：“长卿自号仙源居士，南丰宗室。有《仙源居士惜香乐府》九卷。长卿疑名师有，俟考。”谭正璧先生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赵长卿”条略多些，也不过百把字：“赵长卿自号仙源居士，南丰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末前后在世。恬于仕进。尝买一妾，名文卿，教之习苏书，又能唱苏词。三年约满，为其母嫁与一农夫，常常寄所作词或片纸问讯，长卿每为酬答。长卿词以文词通俗，善抒情爱著名，有《惜香乐府》十卷（《四库总目》）传于世。”但这阕《探春令》倒是清新可诵，较有特色，它切合人们喜迎新春、展望未来的欢快心情，“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说得多好！施先生录之以贺友好，确是再恰当不过。

在赵长卿的词后，施先生还加了跋语：“余弱冠时曾以此词歇拍三句制贺年简，以寄师友。赵景深得而喜之，志于其文，去今一甲子矣。景深鹤化，忽复忆之，更以此词全文制柬，聊复童心。奉陈文几，用贺一九八六年元旦，兼丙寅春正。施蛰存敬肃”。原来，围绕这阕《探春令》，还有一段文坛轶事，值得探究。

早在 60 年前，施先生就已把这阕《探春令》的最后三句制成贺年简分赠师友了，那时他刚登上文坛不久，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作，如《梅雨之夕》、《将军底头》、《石秀》等等，均未问世，而今，他已成了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的作家、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当年赵景深先生得到这封贺年简后，并不因施先生尚未出名而轻视，仍然十分喜爱，一直保存着。后来他应吴祖光先生之请为上海《新民报》1946 年新年增刊写了一篇《现代作家的贺年片》（收入 1948 年 4 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文坛忆旧》），在介绍了他所珍藏的徐志摩、刘梦苇、吴芳吉、孙席珍、郑振铎、李健吾、徐调孚、黎锦晖、焦菊隐等人美观大方、各呈异彩的贺年卡后，特别提到“施蛰存用的是赵长卿《探春令》里的词句：‘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时隔半个多世纪，在赵先生作古一周年的日子里，施先生忆及此事，不忘旧情，重将赵长卿词“全文制柬”，一则向亲朋好友祝贺虎年，二则也带有纪念赵先生的意义在，难怪现还健在的赵夫人收到这枚贺年卡后感到高兴，赵先生

如泉下有知，也当发出会心的微笑吧？我想。

（原载 1986 年 3 月香港《明报月刊》243 期）

马华新文学的拓荒者

——温梓川先生周年祭

与温梓川先生久不通音信，正在想念之中，也许他又远赴英伦医治眼疾去了吧？不料日前接温师母手札，告知他老人家已于去年10月20日作古，这个不幸的消息来得太迟了，但仍似晴天霹雳，使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我生亦晚，八年前开始搜集整理郁达夫作品时，才知道梓川先生的大名。原来他早在50年代就编印了一本《郁达夫南游记》，我对是编有过如下的评价：“这是海内外第一本收集郁达夫在新加坡作品的选集”，它的面世无疑是“郁达夫作品出版史和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只是书中还收录了郁达夫“南游”前的作品，体例上“未免不伦不类”¹。后来他又撰写了《郁达夫别传》在吉隆坡《蕉风》月刊连载，这是海外第一部较为完整的郁达夫传记，影响也很大。但当时海禁初开，我打听不到梓川先生的下落，无法与他联系，编选《回忆郁达夫》时，原拟请他惠稿，也因此未能如愿。

机会终于来了。前年，为纪念郁达夫遇难40周年，梓川先生在马来西亚檳城《南洋商报·文星》上发表《关于〈郁达夫别传〉》一文，日本铃木正夫先生寄示剪报和梓川先生住址，我不禁喜出望外，当即驰函请教他的《郁达夫别传》何时可以出版单行本，他在11月4日的回信中告诉我：“我没有想到，我对郁达夫先生所写的拙文，引起您先生的注意。当时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在纪念郁达夫先生的去世，又适值战后，参考资料不多，只靠平时收罗的几十本有关资料，才能下笔。当然，当时写得并不妥善，遗漏甚多，在退休后重读一遍，觉得有许多要补充的地方，先后写成不少篇什，完成了《郁达夫别传》。现在我正在收罗郁达夫有关的像片，拟于明年1月底付排，出版后定当寄奉，请届时评正是感。”并认为我对《郁达夫南游记》“所评甚是”，谦逊、诚恳之情很令人感动。不久，他又热情提供了郁达夫佚诗《过吉隆坡叶亚来墓》、郁达夫手刻闲章“生怕情多累美人”印拓和《郁达夫别传》新增的一章《郁达夫绋袍送贫士赋诗吊叶来》，对我的郁达夫研究给予宝贵的支持。

尽管梓川先生在郁达夫研究上卓有建树，不过，奠定他在马华新文学史上地位的还是他的早期创作。他原名温玉书，祖籍广东惠阳，1911年出生于马来亚檳榔屿^①，1926年负笈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次年入上海暨南大学深造，毕业后南返，但仍时常往来于檳城和上海之间。梓川先生求学期间即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作品散见于《一般》、《秋野》、《申报·艺术界》、《矛盾月刊》等报刊，还主编过《檳榔月刊》。他曾要我帮助查找发表在曾今可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的作品，我发现单是署名“温梓川”的著译就有九篇之多，还有一篇署名“温伟南”的小说《莫斯科一舞女》，我无意中把第一页复印给他，他马上来信嘱我将全文寄去，难道“温伟南”是梓川先生的另一笔名？可惜我没能来得及请他证实。此外，1934年6月《矛盾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上刊登的翻译小说《逃犯》（马来亚骚芬·古鲁士作），

¹ ①参见拙作《香港郁达夫研究管窥（一）》，载《香港文学》1985年10月号。

① 梓川先生的出生年份，李立明著《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作1911年，马著《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作1918年，温师母来信谓梓川先生享年76岁，因此，当以李说为是。

其实也出于梓川先生手笔，只是署了他的好友彭成慧的名字，他一再要求我找到该文，谁知待到我去年11月把复印本寄往槟城，他却永远看不到了！

梓川先生当时出版过诗集，翻译过不少托尔斯泰的作品，但以编译东南亚的民间情歌和小说创作成就最大。他长期搜集马来亚和暹罗等国的情歌，和陈毓泰合译的《南洋恋歌集》1930年由上海华通书局印行后，一版再版，流传颇广。编选精当，译笔优美是该书的特色，郁达夫曾专门为文推荐，认为他俩精心编译的这些南洋情歌，其简洁干脆甚至比脍炙人口的海涅的情诗还高出一筹^①。梓川先生当时的译诗还有一部分被钟敬文先生编入《马来情歌集》中，未署名。这个无人知晓的文坛史实也是他在来信中向我透露的。



温梓川著《立人的另一面》扉页和他的题签

至于梓川先生的小说，则以充满南国情调，风格纯朴坚实见长。他描写马来亚中下层社会，善于从平凡的题材中发掘不平凡的意义，注重刻画知识分子和弱小人物的各种心态，代表作为小说集《美丽的谎》（1939年上海长夏书屋初版）和《夫妻夜话》（1952年香港海滨书屋初版）等。郁达夫对《美丽的谎》也很赏识，称赞书中“篇篇都写得很整洁”，手法“很周到”，作者今后如精进不已，是可以成为马来亚社会的忠实纪录者的^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梓川先生南返后，除了经常为《星洲日报》、《南洋时报》和国内报刊撰稿外，还主编《槟城新报》的副刊《热风》和《诗草》，把中国知名作家汪静之、何其芳、刘大杰、何家槐等人的诗文介绍给南洋读者，而他自己那些具有浓郁南洋风味的作品也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这就在中国和南洋之间架设了一道文学交流的桥梁，为促进马华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新加坡方修先生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史稿》是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著作，但书中对梓川先生文学活动的评介似太简略，有点令人遗憾。

到了五六十年代，已卓然成为马华文坛老将的梓川先生长期主持槟城《光华日报》编务，仍笔耕不辍，时有新著问世，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散文集《文人的另一面》。据我有限的见闻，新文学家写文人轶事，当推赵景深先生为第一人，他的《文人剪影》、《文人印象》和《文坛忆旧》堪称此中三绝，而梓川先生这本《文人的另一面》完全可与赵先生的媲美。书中所回忆的曾孟朴、傅斯年、郁达夫、张资平、徐志摩、梁实秋、汪静之、顾仲彝、洪深、滕固、蒋光慈、沈从文、叶公超、戴望舒、邵洵美、丰子恺、彭家煜、何家槐、张竞生、章衣萍、章克标等名噪一时的新文学家，不是梓川先生当年亲承警欬的师长，就是朝夕相处的文友，因此写他们的音容笑貌，个性爱好，无不真切、生动、传神，对许多鲜为人知的新文坛史料，如一部名作的诞生，一场争论的内幕，书中也多有翔实可靠的记载，而且落笔清俊，亦庄亦谐，别辟一径，难怪新加坡的评论家说它是“温梓川最为人称道的一本书”^②。《文人的另一面》初版于25年前，现在就是在海外也已可遇而不可求，当梓川先生得知我极想一睹为快时，慨然把手头仅剩的一册馈赠，还说“请勿以旧藏

^① 参见郁达夫作《杂谈》，载香港三联书店版《郁达夫文集》第七卷。

^② 参见郁达夫作《介绍〈美丽的谎〉》，载香港三联书店版《郁达夫文集》第七卷。

^③ 参见马 著《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年初版。

见嫌为幸”，真叫我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在此之前，梓川先生还编著过一本《作家的学生时代》，香港老作家李辉英先生称其为《文人的另一面》的姊妹篇，颇为推许^②，但我尚未见到。鉴于梓川先生当年与许多中国和马华新文学家有过接触，交游广阔，熟知不少新文坛掌故，我曾建议他拨冗再写《文人的另一面》续篇，他在1986年8月14日致我信中作了令人兴奋的答复：“关于文坛史料，我出版《文人的另一面》后，陆续写了几十篇，从《新青年》起，长的有万五千字，最短的五千字左右，凡是我认识的作家，我打算都把他写出，现在还未写完。书名拟定为《文坛画虎录》，有点幽默。团体方面有朝花社、太阳社、创造社、立达学会、戏剧协社、新潮社等，人物方面有《鲁迅先生的温情》、《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爱情》、《犯了花一般罪恶的邵洵美》、《曹聚仁的真面目》、《吓跑少女的徐訏》、《黎烈文凭吊茶花女》……等等。这部书夹叙夹评，颇有趣味，在发表时颇得读者欢迎。”然而梓川先生溘然长逝，中止了这项重要的写作计划，我不能不为又一批珍贵的文坛史料永远消失而叹息。

老人多爱怀旧，梓川先生每次来信，都是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写满好几张稿笺，他伤悼老友赵景深先生的去世，想念就读暨大时的老师汪静之先生，更屡屡垂询上海近年的变化，他说：“我离开上海多年，印象犹存，只是地名路名已全部改易，真是陌生得很！”直到病逝前一个月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还兴致勃勃地与我讨论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我相信，如果天假以年，梓川先生一定会旧地重游，因为上海是他开始50年有声有色的文学生涯的地方，他能不神萦梦绕吗？

梓川先生的逝世实在是马华文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他的《郁达夫别传》因一再修订补充，迟迟未付梓，《文坛画虎录》现存的文稿也不知能够成书否，他还打算重编一部收集较为完备的《马来情歌集》，并把他的旧作小说汇集出版。现在他已离我们而去，我希望梓川先生的后人和海外的马华文学研究者共同努力，使梓川先生的遗愿得以一一实现，这才是对这位马华新文学拓荒者的最好的纪念。

梓川先生周年忌日于上海
(原载1987年12月香港《明报月刊》264期)

^② 参见李辉英著《三言两语》，香港文学研究社版。

钱钟书先生与我有关的几件事

大连范旭仑先生远道征稿于余，嘱为他编选的《记钱钟书先生》续集撰文，还寄来了他新发现的钱先生佚文《白朗：咬文嚼字》（原载 1947 年 11 月 22 日《大公报·文艺》“西书评介特辑”）复印件，让我先睹为快。盛情可感，无法推却。但是，写些什么呢？我没有见过钱先生，仅通过一次信而已。钱先生的著作融汇中西，体大思精，我虽爱读，却体会不深，难以评说。因此，只能从钱先生与我有关的几件事说起了。

1989 年 4 月，台湾《联合文学》月刊第 5 卷第 6 期推出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经过将近一年的策划编成的“钱钟书专辑”，有首次发表的《谈艺录》修订本增补，有钱先生友好的记述访谈，有对钱先生作品的考证评析，还有钱先生著作单行本和研究资料目录等等，内容丰富，引人注目。当时我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直接写信给《联合文学》主编马森教授，询问“专辑”是否愿意刊登钱先生集外佚文的目录，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马上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整理出《钱钟书佚文系年（1930—1948）》寄去，赶在发稿前的最后一刻编入“专辑”。我在《系年》的“前言”中说：

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著述宏富，博大精深，为海内外学人所瞩目。他 1949 年以前的作品，除论著《谈艺录》、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和已经收入《旧文四篇》中的论文《中国诗与中国画》之外，还有许多散见于各种报刊，从未结集。笔者根据历年查考所得，编成这份《钱钟书佚文系年（1930—1948）》，供海内外“钱学”研究者参考。限于篇幅，钱先生在《清华周刊》、《国风》、《新语》等刊上发表的旧体诗不录。 1989 年 3 月于上海。

当然，现在来看，这份《系年》只是初步的搜集考订，缺漏在所难免。但作为“钱学”研究史上第二份佚文目录（第一份是马力先生的《有关钱钟书的一些资料》，载 1979 年 8、9 月香港《开卷》第 2 卷第 1、2 期），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罢？

到了翌年 11 月，钱先生八十华诞在即，我突然发现在编订《钱钟书佚文系年》时漏收了一篇书评《英国人民》，于是提供给台湾《联合报》副刊，于 11 月 21 日重刊以为纪念。我还写了一则简短的说明，因未在大陆发表过，也一并彙录如下：

一九八八年春，大陆有家出版社拟出学界泰斗钱钟书先生的佚文集，嘱我搜集。我很清楚钱先生对此事的一贯态度，但出版社却说钱先生这次“未表异议”。为慎重起，我还是先写信征询杨绛先生的看法，果不出所料，杨先生在该年三月二日的复信中明确表示：“钟书对自己的少作很不喜欢。年来京沪出版单位有三处曾派人商谈搜集编印，他一概坚决不同意，并谢绝提供线索。来函所说……想系传说。他也会表示异议并劝阻此举。他说，彦火《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续编（一九八二，香港）六十六页记了他一段谈话，可表示他对‘自己过去写的文章’的意见。他谢绝香港重印他的英文著作事，去年港报曾有报导，也许你看到了。你耗费了宝贵的心力，我非常抱歉，恳请原谅。”香港作家彦火兄这本名著一问世就送我，我早已知道钱先生的“意见”，这是必须尊重的，一场误会，此事就此作罢。当然，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这是莫大的遗憾。

因此，当《联合文学》月刊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钱钟书专辑》时，我踌躇再三，

还是编订了《钱钟书佚文系年（一九三〇——一九四八）》交其刊登，目的无非为日益高涨的“钱学”研究提供一份鲜为人知的新史料，让海内外的“钱迷”能够按图索骥。发表后我才发现整理时遗漏了这篇原刊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大公报·文艺》第一百八十期《书评特辑》署名“钱钟书”的书评《英国人民》。后来发表的“一甫”编《钱钟书著作目录》（载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初版《钱钟书研究》第一辑）也未录这篇书评，可见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钱先生佚文。钱先生在三、四十年代写过不少戛戛独造的中英文书评，这篇即为其中之一，其机智犀利，其学术价值无俟我再赘言了。

值此钱先生八十华诞之际，《联副》重刊钱先生这篇佚文作为纪念。应加说明的是，钱先生生性超脱，淡泊自守，“落索身名免谤增”，对人们的盛誉漠然置之。而“钱学”已成为显学，汪洋恣肆，我才疏学浅，难以窥其堂奥，只能做这些钱先生戏称为“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工作为“钱学”略尽绵力。但愿此举不致打扰钱先生精神，衷心祝愿钱先生健康长寿，继续杜门避嚣，优游于博大精深的学问境界。

事后我把样报寄给钱先生，内心不免惴惴，因重刊《英国人民》未及征求钱先生的同意。没想到钱先生不以为忤，亲笔回信表示感谢，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钱先生12月10日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子善先生著席：

三日前得台湾寄来剪报，始知拙文承掘墓陈尸，恩及枯骨，感愧无既。此篇早已忘怀，幸无谬论，然终是贾宝玉所谓“小时干的营生”也！杨绛文将编一集，已与本院出版社有成言，俟编就印成，再接洽台湾出版，何如？蒙厚爱，渠亦深致谢忱。草此，即颂冬安

钱钟书敬上 十日

杨绛同候

拙作蒙过奖，愧悚之至。此乃黄女士、孙先生及诸同人之功，安敢叨为己力乎！

信中所说不仅是重刊书评《英国人民》一件事，因此有必要略加说明。当时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吴兴文兄希望在台印行杨绛先生的作品集（繁体字本），嘱我代为联系，故钱先生在信中如此答复，后来我还有幸得到一套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杨绛作品集》签名本。至于“拙作蒙过奖”，则是指电视连续剧《围城》。当时该剧播出后好评如潮，我去信时也谈了几句观后感，认为这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优秀电视剧，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名著改编。没想到钱先生把功劳完全归之于编导孙雄飞先生和黄蜀芹女士，长者之古心谦德，令人感动。

钱钟书1990年12月10日致木书作者的信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正好关于钱先生的佚文又有一个小小的发现，不妨在此一并介绍。在我的《钱钟书佚文系年（1930—1948）》之后，这些年来，又有好几位“钱学”研究者编订了钱先生著译系年，拾遗补阙，愈加充实完备，对“钱学”研究的深入无疑大有裨益。在最新的由李洪岩先生编订的《钱钟书作（译）品系年目录》（载《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钟书的生平与学术》，1995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初版）中，有如下一条：

《忏庵诗稿》跋（1963年）1964年油印本。

同时，作者在此书第十三章《默存》的第四节《与卢弼的文字因缘》中又有如下一段话：

另按郑逸梅《文苑花絮》第 207 页：“《忏庵诗稿》上下二卷，新建胡先骕步曾著，黄曾樾题签，柳翼谋、卢弼、范罕作序，钱钟书为之跋。附陈散原、江瀚、袁思亮识语，都很推重。《水杉歌》也搜罗在内。这个本子，在北京油印，字迹较大，凡三十余页。印数不多，所以他邮给我，附语‘勿宣扬，一宣扬，恐不克应付。’”《谈艺录》第 347 页：“胡步曾先生命余订其《忏庵诗》”。可惜的是，这个油印小册子笔者未搜罗到，竟不知里面具体说了些什么，胡先骕先生的作品当然值得看。

由此可见，钱先生这篇《〈忏庵诗稿〉跋》虽已编入作品系年，却仍深藏书海，尚未现出真身。

我也无缘拜读印数极少的《忏庵诗稿》油印本，但我见到了台北中正大学校友会 1992 年 5 月为纪念胡先骕先生百岁冥诞而编印的《胡先骕先生诗集》。此书书前有柳贻征序（1934 年作）、范罕序（1932 年作）、卢弼序（1939 年作）和马宗霍序（1963 年作）；又有陈三立题识（三则，1918 年、1934 年作）、江瀚和袁思亮题识（均 1934 年作）；还有龚嘉英的《忏庵诗稿提要》（1992 年作）。然后是正文《忏庵诗稿》二卷，上卷为 1916 年至 1927 年间的诗作，下卷为 1939 年至 1964 年间的诗作，共 400 余首；又《忏庵诗稿补遗——南征二百五十韵》（1940 年作）。接着就是钱钟书的跋，附录诗四首，即钱钟书的七律《胡丈步曾远函论诗却寄》、王咨臣的七律《丙寅仲夏客居庐山徒步至植物园谒步公墓》和七古《读忏庵诗稿》，以及龚嘉英的七律《胡校长步曾先生逝世追念会》。书后又附编者撰写的《胡先骕先生年谱（1894—1968）》。

显而易见，这部《胡先骕先生诗集》是 60 年代《忏庵诗稿》油印本的扩充。书中附录的钱先生七律《胡丈步曾远函论诗却寄》因已收入《槐聚诗存》（1994 年 5 月北京三联书店初版），可以不赘，但钱先生的跋终于被“发掘”出来了，这是令人高兴的事。胡先骕先生的诗固然“意理气格俱胜”，无不高妙，钱先生的跋也是言简意赅，评鹭精当，现照录如下：

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登临游览之什，发山水之清音，寄风云之壮志，尤擅一集胜场。丈论诗甚推同光以来乡献，而自作诗旁搜远绍，转益多师，堂宇恢弘。谭艺者或以西江社里宗主尊之，非知言也。承命校读，敬书卷尾。庚子重五后学钱钟书。

庚子年是 1960 年，因此可以断定，钱先生这则跋语并非像李洪岩先生编订目录中所说的作于 1963 年，而是作于 1960 年，钱先生校读《忏庵诗稿》的时间也应在 1960 年。从《胡先骕先生诗集》所收的《忏庵诗稿》又可知道，在钱先生承胡先生之命以编年方式校订之后，诗稿又有所增补，如气象恢宏的《水杉歌》（1961 年作）、《得吴雨僧书却寄》（1961 年作）、《题陆丹林枫园纂史图》（1964 年作）等等。至于《忏庵诗稿》是否确为 1964 年印成，我未见原本，就不敢轻易下断语了。

遥祭李辉英先生

李辉英先生与世长辞了。我5月初去鲁迅、茅盾、郁达夫、丰子恺等现代著名作家的故乡考察，迟至返沪后才从北京出版的《文艺报》上惊悉这个噩耗。悲痛之余，重读李先生80年代初写给我的十多封信，愈加怀念这位正直、诚恳的30年代老作家。

人刚到中年，记忆力却提前衰退，我已记不起当初通过谁的介绍才开始写信向李先生求教，确切无误的是李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写于1982年5月13日。当时我正和王自立兄合作为香港三联书店编订《郁达夫文集》，同时对鲁迅著作中多次提到的30年代的北方文人张露薇较有兴趣，因此李先生在回信中详细解答了他所知道的张露薇其人其事，并对郁达夫作品中经常引用外文诗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样中西文混杂“破坏了形式上的统一，颇足诟病”。态度之热情、坦率，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半个月后，我们编注的一本小册子《郁达夫忆鲁迅》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我马上寄请李先生指正，他的回信很长，而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不妨照录如下。

子善先生：

惠函及《郁达夫忆鲁迅》一书，均已收到，谢谢。我一口气读完了《郁达夫忆鲁迅》，取得了不少的启发，特别是《回忆鲁迅》不但使大多读者了解一些三四十年代的文坛状况，尤其就此认识到郁氏与鲁迅交往的一片忠诚，所谓“文人相轻，自古已然”的说法，不攻自破。郁氏因与鲁迅交往，而遭受创造社诸君子的猜疑，也是事实。二、三、四十年代派系的不和，矛盾重重，影响团结，削弱了本身的力量，实为不智之甚。至于像创造社的攻击文学研究会，因为后者有个有钱有势的大老板，仿佛这也是攻击的目标，似嫌离题太远了。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正以“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名义展开编辑工作，准备出郭氏文集，不知系派不和的材料亦在搜求之内否？就学术研究说，应该从实阐明才是。

东有恒路、唐山路一带地方，似乎还有些印象，不过有点儿模糊。上了年纪的人，记忆力特差，仿佛开明书店的编辑部和印刷厂也在那一带似的。“八一三”日军的炮火毁了开明，也毁了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北方集》的书稿。

编注一册像《郁达夫忆鲁迅》这样的小册子，必定花费不少的精力，那是不在话下的，造福于研究鲁迅和郁达夫的人，确乎难得之至。特遥祝您同王自立工作上的成功。

上海师范大学，是不就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在哪个地区？先生去学校上课，由住地出发，路上约须多长的时间？搭车容易么？仔细想来，一个人的一生，花在交通上面的时间，一定是个大的数字，只是因为从来无人做过这件工作，迹近发神经，不说也罢。

三联派人打电话来，通知我派人前去领取郁氏文集第二卷，领回之后，匆匆翻翻，发现有一、二处须加订正，特提出请赐参考。一、P23第六行第七字“以乎李兰香……”的“以”字，是不是“似”字？二、P101第十七行的直线——恰好占用了该行首字的地位，是否应改正一下？三、P219第十行首字是个逗点，可能出自手民之误。鸡毛蒜皮之类，改不改没有什么要紧。专复，顺颂文安！

弟 李辉英六月廿七日

李先生在信中对二三十年代的那些文坛恩怨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对拙编也作了肯定的评价，后来还亲撰一文在香港杂志上推荐。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仔细询问我住所所在的马路和上班所花费的时间，

拳拳之心，使我深受感动。从此以后，我和李先生鱼雁不断，经常向他请教30年代文学的一些疑难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老人多爱怀旧，何况李先生长期旅居香岛，一旦得知和大陆多年的老友天人永隔，就倍增伤感之情。那年9月28日给我的信中就提到著名散文家吴伯箫、诗人方殷先生先后逝世给他带来的悲痛：

子善先生：

九月十八日大函奉悉。京津之旅，想定心旷神怡，满载而归，令人生羡。此刻我将报告您不愿闻听的消息，方殷先生已于九月份内不幸逝世，噩耗传来，不欢者竟日。另一迟到的消息，政协吉林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于毅夫先生已于六月仙逝，八年抗战中与方、于二位先生均有往来，不料竟成永诀，殊深哀痛。八月十日，吴伯箫先生因癌症而去世，吴为我在东北师大任教时的文学院院长——顶头上司。大夏大学原址面积相当宽阔，不过您上班的单程都要一个小时，双程至少两个小时，时间的浪费，相当可惜。是否有脚踏车代步？像上海那般一千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公共交通工具的难以调动是每个国家共同的现象，非独中国的上海一地如此。有关郁达夫的文字，我如有所发现，必将复印下来，留供参考。随信另封寄上拙作《雾都》一册，请多多指教。书中错字奇多，正如已故曹聚仁先生所谓港版书有错失，不足为奇，如果没有错失，那才是奇事。此诚为一大讽刺，而一般港版书确乎如是！良可浩叹！《雾都》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与意识流的说法，毫无关联，甚至您说它是一部旧写实主义的作品，我也不反对。意识流一套捞什子，我一直不愿接受，责我顽固我也敏而受之，这么一来，等于自动堵塞了创新的道路，对不对？郁集第三卷三二二页刊出之《桐君山的再到》，原发表处《生生月刊》是我和朱禄园先生担任编务，仅出一期就此关门大吉，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情，距今已四十七个寒暑，时间过得多么快呀！郁集的编辑，花费您们不少劳力，但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就算心力交疲，也没有二句话可说，对么？草草不恭，不再叨叨了。祝

文安！

弟 李辉英敬上九月廿八日

李先生在这封信中还谈了他对现实主义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看法，这当然是他的一家之言，可供研究李先生文学思想和作品者参考。虽然近年大陆已出版了《李辉英研究资料》，有几种新的文学史著作也提到了李先生的小说，但以李先生在30年代“东北作家群”里的地位，他的作品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可惜他寄赠的《雾都》和其他好几种作品集，我都没能认真拜读，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有负李先生的雅意。

和李先生通了许多信，却一直无缘见面。去年3月我到港参加香港大学第二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本拟拜访李先生以了夙愿，但友人告知李先生年迈欠安，很少见客。为了不打扰李先生，我只得作罢。没想到我就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现在我只能写下这篇不像样的文字寄托我对李先生的哀思，如果李先生泉下有知，请他老人家谅解我。

（原载1991年7月《香港文学》第79期）

藏书家的遗憾

——悼念唐弢先生

唐弢先生逝世了，噩耗传来令人悲痛不已。现检出唐先生于1990年4月9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交《香港文学》发表，一则寄托我深切的哀思，二则也可让读者了解一下这位海内外著名的藏书家最后的遗憾。

子善同志：

手示谨悉。政协开会期间，我不慎在宾馆摔了一跤，左脚伤筋，疼痛异常，被送入医院，至今未愈。开会之前，听说拙书已出版^①，便于会议期间送人，免得麻烦。他们虽应允，但云书未送来，仅有样书一本。闭幕前，我又去催，至今无回音。不知是否上海已见到？书出后我自当送上一本。兹有一事奉托，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瞿秋白思想研究》（丁守和著，精五·九五元，八五年出版），我写《鲁迅传》要用，遍寻无着，不知上海旧书店、小新华书店有否？烦代一查，书款当汇奉。即颂

文安！

唐弢九〇·四·九

瞿书务请一查，款当汇奉，拜托拜托。丁守和原系熟人，他也无余书。又及。

由于唐先生是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我尊敬的前辈，也由于我曾在唐先生指点下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王锡荣兄合作编选《〈申报·自由谈〉杂文选》，80年代以降，我与唐先生鱼雁往来不断。而这是唐先生生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还未及作复，就得知他旧病复发住院抢救，再也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因此很可能这也是唐先生最后写的一封信。

唐弢著《书话》（1962年北京出版社）封面

信中所说的“拙书”，我记得是《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初版），此书主要收入唐先生80年代所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札记和序跋，集中探讨现代文学接受西方影响、承继民族传统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史料翔实，新见迭出，体现了唐先生晚年的学术追求和成就，为治学者案头所必备，可惜我永远无法得到他的题赠了。

信中所说的另一件事是他因撰写《鲁迅传》之需，急于购读丁守和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思想研究》，心情之迫切溢于言表。按理说，唐先生与丁守和先生熟悉，实在买不到，借阅当无问题，再说图书馆中也不难找到吧？但唐先生却执意要自己购置一部，嘱我务在上海一查。然而此书因印数太少，跑遍上海的新旧大小书店，早已毫无踪影。我想这就是藏书家的固执和可爱了。尽管唐先生已经发出对于读书和藏书甚觉“疲倦”的感叹（见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12月初版《书香集》），但感叹归感叹，这位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晦庵书话》的著名藏书家，还是无法完全割弃对于书的眷恋和收藏的热情，这封信不就是一个明证吗？我对唐先生深感歉意的是，无法满足他这个小小的愿望。其实，就版本而言，丁先生这部著作很普

^① 此处疑有漏句。

通，根本无法与唐先生拥有的大量现代文学珍本孤本相比，但唐先生反而得不到，他是带着未能完成《鲁迅传》，未能读到丁先生这部著作的遗憾离开人世的，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1992 年 1 月 16 日于上海
(原载 1992 年 3 月《香港文学》第 87 期)

忆张向天先生

很久没与张向天先生联系，正想写信去问候，还未动笔，却从香港《文汇报》上见到了张先生病逝的噩耗，震惊之余，不禁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张先生的名字，在国内鲁迅研究界中，一定不会觉得陌生。早在 50 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鲁迅旧诗笺注》，这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本系统探讨鲁迅旧诗的专著，见解精辟，分析中肯，影响很大。随后，张先生又在香港陆续出版《鲁迅作品学习札记》、《鲁迅诗文生活杂谈》、《鲁迅日记书信诗稿札记》等书，在海内外鲁迅研究界享有一定的声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先生为研究鲁迅、宣传鲁迅、捍卫鲁迅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成绩卓著。可是，不论是香港出版的《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还是国内近年出版的四厚本《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分册）都未介绍张先生的生平和著述，未免令人遗憾。

我已记不清当初通过谁的介绍给张先生写信，只记得大概是在 1980 年或 1981 年，为了鲁迅书信注释中的几个疑难问题，我以后辈身份向他求教。他及时作了答复，于是我们就断断续续通起信来。我们谈鲁迅，谈郁达夫，谈现代文学研究，张先生热情，诚恳，乐于指点后学，使我受到很多教益。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张先生致力于鲁迅生平和作品史实的查考和辨正，隔几天就在香港报刊上发表一篇。他从不故意标新立异，而是扎扎实实地苦功夫，或旁征博引，或条分缕析，文笔生动，时有创见。据我极为有限的见闻，张先生首次发现《地底旅行》译文中的诗其实是鲁迅自己的创作，首次对鲁迅为人书幅题字作了集解，首次对鲁迅诗中“孺子”、“缁衣”等词的本义作了严密的考证，他写了多则读鲁迅书信识小录，对许多新发现的鲁迅书信作了详细注释，他还一再令人信服地指出十卷本《鲁迅全集》注释的错讹……。特别是他在 70 年代初以“黄钺”为笔名与胡菊人先生围绕鲁迅展开的一场论争，更引人注目。胡先生对当时国内存在的歪曲鲁迅、糟蹋鲁迅的倾向表示反感，提出异议，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他对鲁迅政治品格的指责，却是严肃的鲁迅研究者不敢苟同的。针对胡先生的观点，张先生一鼓作气，接连发表了 72 篇批评文章，既具强烈的论战性，又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真可谓是气势磅礴，令人神往（论争情形，陈漱渝先生已在《鲁迅研究动态》总第九期上作了全面介绍，不赘述）。但这些有分量的文章大部分未曾编集，国内研究者更难以见到。因此，我有一次在信中建议张先生把这些旧作编选一本集子，交国内出版，并自告奋勇地联系了一家出版社。张先生得知后一再来信道谢，他很谦虚，认为“国内作者等待出版书籍者极多，海外人士不应再向国内‘争食’”。在我坚请下，他又告诉我胡先生已是统战对象，再在国内出版批评他的文字，恐怕不合适。我却以为统战对象与学术论争不应混为一谈，政治上统战，学术上就不能争鸣了？照样可以各抒己见嘛！何况胡先生已把他的那些文章结集出版（见《文学的视野》，香港明窗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初版），张先生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有关文章结集，让更多的读者互相对照了解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张先生被我说动了，“愿意试试”，已着手整理旧作，进行编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没有编成。当时我曾有“越俎代庖”的想法，代张先生来编，但也因为忙，一直未能动手。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有点后悔。

我和王自立兄合作编注的《郁达夫忆鲁迅》出版后，给张先生寄去一册，

请他指正。他在回信中称赞拙编有“肯定的价值”，同时不胜感慨地说：“近来研究郁达夫者日多，而独先树研究之旗者为日本人士！卅多年来我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惊风骇浪之政治风涛中，自保尚不可能，还有什么余暇作研究？看到日本人士的成绩，真令人汗颜！”这话确实切中当时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的要害。我由此联想到张先生自己，他思想进步赤诚爱国，热烈拥护新中国，但由于身处海外，难以看清国内六七十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形势，有时也就免不了受骗上当，他在“文革”后期写过一二篇吹捧“石一歌”的文章，即为一例。所以“四人帮”倒台后，一时难免为人们所误解，以至他晚年心情悒郁，在给定的信中也有所流露。但我认为这是不能苛求张先生的，充其量不过是白璧微瑕。这点失误，与他的成就相比，毕竟是次要又次要的。

对张先生的历史我所知不多，他在信中曾提到他是沈阳城北道义屯人，原名张秉新，早年在清华求学时，是闻一多的学生，30年代后期起，他就用“张春风”的笔名在《论语》、《宇宙风》和香港《大风》等刊上发表作品，定居香港后长期在中学执教。张先生博览群书，旧学根底深厚，除了研究鲁迅、郁达夫等现代作家外，还写过大量的文史小品，以“丙公”笔名出版过《衙前集》及其续集，书中诗书琴棋，风俗掌故，无所不谈，对祖国的挚爱，对故乡的思念，则是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

最近，听说有关部门拟邀请张先生参加国内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的学术活动。以张先生的学识和贡献，完全受之无愧。我更感到兴奋，因为我与张先生神交已久，未曾谋面，这次或许有机会亲聆张先生教诲了。万万没想到他老人家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默默地走了！香港报载张先生遗言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

张先生有次在信中对我说：“叨在同心同德之鲁迅共同爱好者，学习者，彼此共勉”。在沉痛哀悼张先生的时候，我就想到这话不但是对我一个人，也是对国内所有爱好鲁迅、谨严地而不是轻率地研究鲁迅的后辈说的，我们应该不辜负这位在香港那种环境里长期坚持研究鲁迅的可敬的前辈的期望。我还想到，张先生的名字无疑将永久地留在鲁迅研究史上。作为纪念，能不能把他历年来研究鲁迅和现代文学的一些精采篇章在国内出版一本选集呢？我热切地期待着！

（原载1986年7月北京《鲁迅研究动态》第51期）

柳苏和周作人佚稿

台湾《联合报》副刊1993年4月8日开始连载柳苏先生的《北京十年》，海外读者一定读得津津有味。当我拜读这组妙文之后，不禁想起6年前与柳苏先生在北京初识时的情形。

那年深秋，我北上参加鲁迅博物馆主办的“鲁迅周作人兄弟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因我搞过《鲁迅全集》注释，又编订了《知堂杂诗抄》，与这两位五四新文学巨人都沾点边。会间，一位满头银发、温文儒雅的矮个老人作了60年代香港《新晚报》连载周作人晚年最后也是最有分量的一部著作《知堂回想录》有关史实的专题发言，颇受欢迎。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柳苏先生。柳苏？我大感意外，这位从1949年起就在香港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著名左派作家当时正在北京幽居，其原因扑朔迷离，令人匪夷所思。不过，我已管不了那么多，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直觉告诉我一定能从柳先生那里“挖”出许多有价值的文坛史料，既然他能够参加学术会议，不妨虚心求教。因此，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俩在会上合影留念，并在会后到他的双榆树寓所拜访，畅谈了一个晚上。临别时，我提出今后能否与他通信论学，他欣然惠允，但叮嘱我去信务必寄“史林安”收。

这就是我与柳先生交往的开始。从此我与柳先生鱼雁不断，他总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我为能得到这样一位正直随和、学养深湛的前辈的热诚指点和帮助而暗自庆幸。在此期间，他所写和所编的好几种书，也都及时馈赠，让我这个“书痴”先睹为快。叶灵凤的一套《读书随笔》还是毛边本，尤为难得，我如获至宝，给学生上课时还专门拿来举例说明新文学作家中的“毛边党”（鲁迅语）遗风犹存。我每次一进京，除非实在匆促，一定会去看他，在他那间陈设简单的书房兼会客室里消磨过好几个愉快的下午或夜晚。他还在《北京十年》中提到的那家中外合资大有来历的广东餐馆请我吃过饭，这已经是去年12月他即将返港的前夕，他有点依依不舍地说，你下次来北京就见不到我了。没想到不到两个月，我们又再次在香港重逢。

与柳苏先生聊天，如沐春风，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他妙语如珠，一如他的文章那么引人入胜。说到幽默俏皮、行云流水般的“柳苏体”文字，他在北京羁留十年，并未放下手中的笔，香港《明报月刊》数年前连载的《燕山诗话》（署名程雪野），北京三联书店一版再版的《香港，香港》和新近才问世的《香港文坛剪影》，以及好评如潮的香港三联书店版《丝韦卷》等等，都是他的得意之作。我们之间的交谈主要也就围绕他多姿多采的写作生涯，谈他所熟悉而我又极感兴趣的叶灵凤、曹聚仁、徐訏、聂绀弩等文坛前辈，当然更多的还是谈周作人。

柳苏先生五六十年代到北京八道湾探望过周作人，与周作人通过信，向周作人求过字，曾被周作人戏称为有“嗜痂之癖”。更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生命的最后几年，除了零星的一些翻译文字，已不能在大陆发表作品，柳苏先生却慧眼独具，伸出援手，在他主持的《新晚报》副刊刊登了老人的许多小品佳作。正因为有了这段可纪念的文学因缘，柳苏先生应我之



柳苏保存的周作人的手稿

请，认真修订了他在周氏兄弟比较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收入拙编《闲话周作人》。这是一篇使拙编大为增色的精采的回忆录，将来书出版，读者就可明白作者如何检讨自己从青年时代至今逐渐认识周作人，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作了公正而令人佩服的评价。

在北京的一次闲谈中，柳苏先生透露他藏有一大批周作人手稿，厚厚的一叠《知堂回想录》（原题“药堂谈往”）之外，还有不少小品随笔，很可能其中有未发表的晚年佚文。这个消息令我大为振奋。当时我编的《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虽已出版，但以后如果有机会重印，柳先生所藏不是正可补入吗？可惜那时柳苏先生身不由己，徒唤奈何。于是我们只好相约，有朝一日柳先生安然返港，再整理提供给我。为此我等待了整整5年。

而今柳苏先生终于回到他称之为第二故乡的香港，继续他的文字生涯。他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与我见面之后，很快检出这批周作人手稿，慨然复印相赠。当我见到老人娟秀清雅、一丝不苟的亲笔手泽时，不仅是惊喜万分，更是感动万分了。

柳苏先生精心保存的这批周作人手稿总共36篇，署名分别为岂明、知堂、仲密、槐寿、山叔等。经我仔细核对，发现其中15篇已在60年代的《新晚报》副刊上揭载，且已收入拙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剩下21篇却是从未发表过的，计小品随笔16篇，即《诗与真实》、《现代的诺亚方舟》、《别国的迷信》、《反对韩文公》、《洋八股的经验》、《小大自休》、《蟬的寓言》、《果子与茶食》、《略谈乳腐》、《日本的米饭》、《陆奥地方的粗点心》、《敝帚自珍》、《堕贫闲话》、《爱说诳的人》、《无名的先觉》和《爱罗先珂所说的缅甸佛教徒》；译文5篇，即《收集佛教书》（日本野间宏作）、《鱼鲑》、《肴核》（以上两篇日本青木正儿作）、《普茶料理》（日本山路闲古作）和《希腊小喜剧》（古希腊路亚阿诺斯作）。这真是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界的一次重大收获，它们对深入研究周作人，尤其是探讨周作人晚年心态和创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周作人是公认的现代散文大师，他的小品随笔冲淡平易，从容清涩，耐人寻味。无论是社会的、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感知的、想象的，宇宙之广、苍蝇之细、人生之杂，在他笔下全都切实生动，情趣盎然。这批佚文不就是又一个明证吗？虽然其中若干篇是为稻粱谋的急就章，与老人创作巅峰期的那些名作杰构相比已略有逊色，但只要想一想当时有不少文人骚客在“歌功颂德”，老人这些我行我素，保持自己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富于审美和史料价值的文字也就难能可贵了。

柳苏先生把这批周作人手稿交给我时，曾感慨的表示，既希望我有新的发现，又觉得如佚文较多，当年出于种种原因无法发表，很对不起老人。柳先生真是忠厚长者，其实，他是周作人作品的真正知音。这批佚文已由笔者提供给长沙钟叔河先生，全部编入《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相信不久的将来即会与世人见面。柳苏先生实在功莫大焉，老人如泉下有知，也当合十称谢。

（原载1993年7月28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为鲁迅刻名印的“刘小姐”

鲁迅 1933 年 11 月 11 日致郑振铎信中说：“名印托刘小姐刻，就够好了。居上海久，眼睛也渐市侩化，不辨好坏起来，这里的印人，竟用楷书改成篆体，还说什么汉派浙派，我也就随便刻来应用的。至于印在书上的一方，那是西泠印社中人所刻，比较的好。”

鲁迅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刘小姐”是谁？一直不为人所知。前些时候，我们从郑振铎作《访笺杂记》（原载 1934 年 1 月 31 日天津《大公报》，收入《徇傴集》）中，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鲁迅和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中的部分画笺，起初琉璃厂清秘阁不愿承印，经郑振铎“再三奉托了刘淑度女士和他们商量，方才肯答应印”。为鲁迅刻名印的“刘小姐”，是否就是这位“刘淑度女士？”果然，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和第二期（1934 年 1 月和 4 月出版）上，我们又发现了一份由齐白石订出润格，顾颉刚、黎锦熙、郭绍虞、朱自清、许地山、俞平伯、董鲁安、谢冰心、叶圣陶、魏建功等文教界著名人士联合签名，推荐刘淑度女士治印的《告白》。《告白》中说：“刘淑度女士师仪，铁笔刚劲，得其师齐白石翁之传”，可见刘淑度确是一位篆刻家，而且在当时已颇享盛名。最近，我们在魏隐儒先生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这位年过 80 的老篆刻家，证实鲁迅这封信中提到的“刘小姐”，确系她本人。

刘淑度，名师仪，山东德县人，1899 年生。她在保定念小学时，就被家中字画条幅上盖着的大小各种印章所吸引，不久，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看到别人刻印，从而对篆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她在橡皮上学着刻，其祖父看到一个姑娘家竟爱好治印，很高兴，就买了些印石给她学刻。她把这几方印石刻了磨掉，磨掉又刻，一时竟入了迷。

1925 年冬，刘淑度考进北京女师大国文系，在同学们的鼓励下，重新拿起刻刀治印。后来，国画家李苦禅把她介绍给白石老人，那时老人已不收徒弟，但看了她的作品后，觉得她的篆刻已达到一定水平，很难得，于是破例答应做她的老师。她勤学苦练，进步很快。老人对这位入室弟子也很器重，白石曾在她的十多本印谱上作了详细的批语，并对她的治印艺术作了很高的评价：“从来篆刻之盛，本属士夫，女中能事无关矣。门人刘师仪女士，字淑度，自幼喜刻印，篆法刀工无儿女气，殊为闺阁特出也。”

1930 年，刘淑度在女师大毕业，以后长期担任中学教员。她节衣缩食，用剩下的钱购买印石和印泥，坚持从事业余篆刻。钱玄同、许寿裳、朱自清、俞平伯、郭绍虞、谢冰心、台静农、容庚、商承祚等都请她刻过名印和藏书印。她为郑振铎所刻的名印和藏书印就更多了，总不下十几方。原来，她与郑振铎夫人高君箴在上海神州女学时是同窗好友，到京后仍过从甚密。1931 年郑振铎编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她和高君箴一起担任郑振铎的助手，帮助查找资料、标点引文、校对清样，等等。到了 1933 年秋，鲁迅和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她也积极参与其事，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当时，郑振铎除了自己奔走，还托她代为收集画笺。她到处寻访，不但是琉璃厂，北京四城的南纸店，几乎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为此事足足奔忙了好几个月，把搜罗得来的各种画笺交给郑振铎，由郑振铎寄给鲁迅选定。接着，她又再三与琉璃厂清秘阁协商，才解决了该店起初不肯承印《笺谱》的困难。《北平笺谱》出版后，鲁迅和郑振铎又借王孝慈藏本翻印《十竹斋笺谱》，也是

她第一个出面去与王孝慈交涉。为了感谢她的大力帮助，郑振铎曾把鲁迅和自己亲笔签名的一部《北平笺谱》和一部《十竹斋笺谱》送给她。可惜的是，这两部名贵的笺谱和她自己的许多印谱都在十年浩劫中被“扫荡”而散失。

刘淑度开始访笺时，郑振铎曾把鲁迅关于编印《北平笺谱》的来信给她看，使她了解鲁迅是此事的主持人和编印《北平笺谱》的意义。刘淑度虽然没与鲁迅直接见面，但她曾在北师大附中听过鲁迅《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对鲁迅是十分崇敬的。既然画笺是鲁迅和郑振铎两位师长所要，她访笺时就更加全力以赴了。想必是郑振铎在信中向鲁迅谈到了她的辛勤工作，所以在上述这封谈名印的信之前，鲁迅还在另两封与郑振铎讨论收集画笺的信中提到了她，这两封信郑振铎当时交给刘淑度看后，就一直保存在她手中，不料十年浩劫中也被人抄走，至今下落不明。把《鲁迅日记》和现存鲁迅 1933 年 9 至 10 月间写给郑振铎讨论收集画笺的信进行核对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日记》没有漏记，那么，不多不少，正好缺少 1933 年 9 月 18 日和 10 月 31 日所写的两封信。但愿这两封鲁迅手迹还有可能重新发现。

想必又是郑振铎的推荐，鲁迅才在 1933 年 11 月 11 日信中请郑振铎转托刘淑度治印。郑振铎把此事告诉刘淑度后，她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能为鲁迅治印，担心的是怕刻得不好，鲁迅不中意。她遵照鲁迅的要求，经过反复琢磨，约在 1933 年底，在两方寿山石上刻成了白文“鲁迅”和朱文“旅隼”两印。印刻成后，她曾送请知名篆刻家贺孔才征求意见，他在印存上写下了“迅字佳”、“隼字佳”的赞语，刘淑度至今珍藏着这两方印存。她当时并打算精益求精，重刻“旅隼”印，但郑振铎认为两方印刻得都很好，不必再改，一齐取走了。

鲁迅对刘淑度为他治印这件事很重视，当时由于郑振铎不能马上去上海，这两方印就暂存在他那里。1934 年 8 月 14 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中还特地提到这件事：“先生此次南来，希将前回给我代刻的印章携来为禱。”半个月后，郑振铎回到上海。9 月 2 日《鲁迅日记》记云：“下午保宗（茅盾）及西谛（郑振铎）来，并赠《清人杂剧》二集一部十二本，名印二方。”这就是刘淑度刻的白文“鲁迅”和朱文“旅隼”印。

鲁迅对这两方印是十分喜爱的。查《鲁迅日记》，鲁迅收到这两方印后第一次为人书写字幅，是在 9 月 29 日，是日他应友人张梓生之请书写七律《秋夜偶成》一幅，落款所钤名印即此两方。应该指出，鲁迅为人书写字幅时同时钤印两方，这还是第一次。同年 12 月 9 日，鲁迅书写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诗，又一反过去为许广平题字时主要使用“金星石”印（即许广平赠送给他的那方印）的惯例，钤下了这两方印。最近，承杨霁云先生惠示，我们看到了鲁迅 1935 年 12 月 5 日为杨霁云书写的项圣谟题画诗原件，所钤名印也是这两方。

尽管刘淑度自己对“旅隼”印不够满意，但鲁迅对这方印却特别看重。1934 年 12 月《准风月谈》初版，封面上就赫然钤着这方“旅隼”印。显然，这不是随便所钤，而是作为封面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郑重使用的。而且，鲁迅在自己作品封面上钤名印，这是唯一的一次。至于鲁迅平时在自己藏书上和向友好赠书时使用这方印，那就更多了，如鲁迅在收到这两方印的次日，就在所藏《淞隐漫录》等书上钤下了这方印；他在 1936 年 2 月 29 日送给杨霁云的《故事新编》一书扉页上也钤着这方印。这方“旅隼”印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鲁迅后期仅有的两方笔名名印（另一方是“洛文”印）中

经常使用的一方，这固然是因为“旅隼”这个笔名“喻士卒劲勇，能深攻入敌”（许广平语）之意，为鲁迅所爱用，但另一方面不也说明了鲁迅很欣赏这方名印的镌刻艺术吗？

刘淑度为鲁迅所刻的这两方印，章法谨严，刀法刚劲，奇崛秀朴，浑然一体，获得静中见动、板中求活的艺术效果，确实颇具齐派风格，深得汉印神韵。从鲁迅在信中对她治印的首肯和尔后对这两方名印的赏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晚年鉴赏治印艺术仍不改初衷，即他早年与周作人合作的《蜕龕印存》代序中所主张的：“铁书之宗汉铜”，“盖粹然艺术之正宗”。

刘淑度先生如今已经 82 岁了。她很谦虚，一再表示自己几十年来“愧无建树”。但她当年为鲁迅治印和帮助鲁迅、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无疑是为保存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要不是鲁迅在信中提上这么一笔，这些动人事迹恐怕要湮没无闻了。

（原载 1981 年 1 月北京《大地》第 1 期，与吴朗先生合作，由笔者执笔）

将国画与文学联姻的人

——访著名画家程十发先生

当我把连环画《孔乙己》、《阿Q正传一零八图》和《伤逝》摊放在程十发先生面前时，程先生的眼睛不禁一亮，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你从哪里找来的？我自己早已没有存书了。”

身为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程十发，是当代中国画坛最具个性、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他早年求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40年代张大千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名人画海》中就已收录他的山水作品，换言之，程先生刚年过弱冠，就已脱颖而出，跻身全国画坛名家之列了。50年代以降，程先生更是才情勃发，名声大振，开创了“程派”国画的新局面。举凡山水、花鸟、走兽、鳞介和人物，程先生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书法篆刻同样深有造诣。高雅超逸的古典美，生动活泼的民间美，回肠荡气的生活情趣，幽默亲切的个人情怀，在程先生的画笔下水乳交融，天然浑成。他的国画作品显然不是以数量取胜，而是以优质见长，无论构思、立意，还是笔情、墨趣，几乎每幅都有独特追求和创新精神，乍看强越夺目，细嚼回味无穷。论者称“程十发的画体现了一个当代艺术家在纵向的传统和横向的当代及世界性上，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光辉灿烂的交叉点”，可谓并非过誉的中肯之言。程先生的出现，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像一阵瑰丽耀眼的闪电，在历史上是一次性的，不大可能再重复。明乎此，程先生的“愿普天下同生净土”图在不久前的德康艺术品拍卖会上以150万人民币的高价成交，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我这次拜访程先生主要却不是谈他的精湛的国画艺术，而是与他讨论他在国画与文学联姻上所作的可贵努力。程先生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似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的许多国画佳作都与中国文学密切相关。为行家所津津乐道的《湘夫人》、嵇康《广陵散》、《唐人诗意册》（六种）、《白乐天解姬图》、《李长吉相马诗意》、《李长吉湘妃诗意》、《李长吉诗意图》（两种）、《苏东坡造像》、《易安漱玉图》、《李清照词意》等等，虽然作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都是从楚辞到唐诗宋词中汲取灵感，衍化生发而来的吗？他画的《红楼梦》人物图也是栩栩如生，别具一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红楼梦》版本曾选作插图。我在采访时曾好奇地问到，为什么他特别喜欢唐代“三李”之一的李贺？程先生的回答很风趣，李贺不是诗人中的“牛鬼蛇神”吗？我在“文革”中也是“牛鬼蛇神”，同病相怜嘛，所以我对他的诗特别有好感，真令人莞尔。但我想除此之外，作为“鬼才”，李贺诗中魅异诡怪的鬼神世界一定引起了同样追求浪漫、神奇、璀璨的艺术境界的程先生的强烈共鸣，所以才会对李贺情有独钟，一画再画，越画越精采。程先生恐怕是大陆当代画家中以古人诗意入画最多的一位，藏在画卷背后深厚的文学底蕴，画家描摹诗情、抒写胸臆的无拘无束，以及充满画中的风采神韵，实在使观者赞叹不已。

更为难得的是，程先生不薄古人，更爱今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新文学巨匠鲁迅的小说精心创作连环画就是明证。1956年9月，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程先生创作了连环画《孔乙己》，1958年7月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

社出版，这是鲁迅名篇《孔乙己》最早的连环画，1981年9月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重印，部分原稿则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珍藏。6年之后，程先生又以更大的热情创作了《阿Q正传一零八图》，先在广州《羊城晚报》连载，后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线装二册，古色古香，疏朗大方。该书《前言》中称，《阿Q正传一零八图》“采用了我国传统的水墨写意画的方法，而又予以自己的表现手法和自己的独特风格”，“作者忠实于原作的要求，一变平常习用的华丽纤巧而采用了比较朴实雄厚的笔法。作者描绘的阿Q形象比较生动，比较接近于原作的精神”，“在街道、村庄、风物的描绘方面，也具有江南、浙东风俗画的韵味，发挥了水墨画的民族传统特色。”的确，就不朽名作《阿Q正传》的深刻独到而言，用连环画来表现并非易事，程先生却是较为完美地做到了。时隔30多年，而今重新翻阅此书，仍能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其中鲜明生动的艺术魅力。这固然首先得力于原作者鲁迅，但程先生的再创造也功不可没。程先生把我带去的《阿Q正传一零八图》摩挲良久，然后向我透露了两个秘密，一是此书《前言》虽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其实出自大陆鲁迅史料专家丁景唐先生之手；二是“文革”爆发前夕，程先生把此书原稿捐赠黑龙江省博物馆，让它到北大荒“插队落户”，才使这部珍贵的画稿逃脱了“十年浩劫”而幸存下来。到了1981年9月，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程先生又与其公子程多多合作，创作了连环画《伤逝》，与原作一样，连环画也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把小说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悲欢离合表现得细腻、深沉和真切，同样使人爱不释手。

在接受采访时，程先生还告诉我，除了把鲁迅小说改编成连环画，他在60年代还应著名报人赵超构之请，为《新民晚报》创作了根据曹禺话剧《胆剑篇》改编的连环画，在该报连载，后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倒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新发现，使我颇感惊喜。程先生在总结他的连环画创作时强调，连环画是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一种艺术样式，认为连环画不登大雅之堂无疑是一种偏见，当年鲁迅大力提倡连环画是富于远见的。许多画国画的不愿为或不屑为，这很可惜。当然，不能把连环画误作一种独立的画种，版画可以创作连环画，油画也可创作连环画，还有漫画连环画，当今在东瀛风靡一时的各种漫画集不就是连环画吗？我只不过在国画连环画方面作了一些新探索罢了。画连环画不比画单幅国画，可以一挥而就，它需要更严密的整体构思，要花费更多的心血，付出更辛勤的劳动。我现在老了，又忙，画不动了，只能期待后来者了。程先生虚怀若谷，其实他创作的鲁迅小说连环画，无论在鲁迅作品改编史上还是在国画连环画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遗憾的是，这次到台湾展览的程先生国画杰作中没有这方面的作品，否则观众可以更全面完整地领略程先生在国画与文学联姻上的重大贡献，那该多好！

（原载1995年7月27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艺术天地任遨游

——略谈陈世五先生的藏书票

不知不觉，陈世五先生谢世已一年有余了。世五先生生前自甘淡泊，不求闻达，在海内外美术界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但是盖棺论定，我以为他在中国藏书票创作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将来如果有人研究中国当代藏书票艺术，就不能不提到这位独树一帜的大家。

世五先生的经历其实很简单平凡，几十个字就可大致概括：1924年出生，四川成都人。40年代为生活所迫操起画笔，国画、油画和水彩画都曾涉猎，无师自通。50年代初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了漫长的书籍装帧设计生涯，风格洗练，佳作纷呈，受到巴金先生激赏的具有深沉历史感的《讲真话的书》的封面就出自他的手笔。与中国无数知识分子一样，世五先生也饱经忧患和不公，但他对艺术的追求始终执著不渝。他亲口对我说过，在70年代初那个视中外优秀文化如草芥的年代里，他还冒着危险闭门临摹《清明上河图》整整一年，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勇气！

世五先生迷上藏书票是80年代初的事，尽管这是“业余爱好”，他却乐此不疲，潜心探索，终于独辟蹊径，闯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新路。他擅长制作孔版藏书票，举凡中外古今的神话、寓言、历史、典故、风俗、民情、文字，乃至文化名人肖像，均能成为题材，真可谓方寸之间任遨游。他的创作生机勃勃，既有泥土芬芳，又富于书卷气，想象之大胆，形式之独特，用笔之奇简，无不充满哲理内涵，具有浓重的画外音而引人深思。尤其是构图色彩之鲜艳强烈，往往使人大吃一惊。观赏他的藏书票，总使我想起野兽派艺术大师马蒂斯，他也会坦言，他的藏书票创作确从凡高、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不朽名作中汲取灵感，然而我知道他并不是简单模仿，而是融会贯通，满怀激情地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方天地。

世五先生一生创作了数百种藏书票，大都自娱，很少为人制作专用藏书票，但偶一为之，即成精品。他曾为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家、诗人曹辛之（杭约赫）先生设计过两种专用藏书票，其中一种以花蛇环绕书本（辛之先生生肖属蛇，又与书本结下不解之缘），同时以三支笔（毛笔、钢笔、画笔）穿插其间，象征票主毕生从事的写作、书法和美术三项事业，极为生动别致，难怪辛之先生十分推重，誉之为“我见到的中国藏书票中最具藏书票特色的一种，可以与叶灵凤以凤凰为图案的藏书票相媲美”（引自1990年12月6日致笔者信）。

我与世五先生仅见过一面，1991年秋我在成都参加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拜访他，他在病床上与我谈藏书票，谈西方现代派艺术，声音低缓却充满激情，使我大长见识。他为自己的病感到焦急，因为他还有许许多多新奇的藏书票有待构思。确实，世五先生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藏书票艺术，虽然病魔过早的夺去了他的生命，但他已经留下了一个迷人的藏书票世界。我相信他的藏书票作品集迟早会问世，届时人们或许会惊叹四川又出现了一位陈子庄式的优秀艺术家！

（原载1994年3月19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缘 慳 一 面

——为江兆申先生书画展而作

这些日子我常在想，如果我真的和江兆申先生见面，我们会谈些什么。他是台湾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人画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我是不懂画的后辈，向他请教如何读画一定是免不了的；他又是已故著名作家台静农的好友，十分推崇台先生的书艺，我编过《台静农散文集》和《回忆台静农》两书，我们会谈到台先生，想必也是一定的。当得知继北京和沈阳之后，江先生将于8月下旬在上海举行书画展，我就一直期待着这次会面。据刘天炜兄相告，江先生也很希望到上海后能与我谈谈。然而这一切已经永远不可能了，三个半月前的5月12日，江先生猝然倒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讲坛上，当时他正在演讲中国文人画的传统，万万没想到历史悠久、气象万千的中国文人画就这样在沈阳画上了悲壮的也是最后的一笔。

江先生生于书画世家，天资聪颖，再加精勤自学，早年所作书法和篆刻即受到邓散木的赞赏。40年代末赴台后，拜溥心畲为师，先苦读历代诗文，又在绘事方面耳濡目染，深得心传。60年代经叶公超力荐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先后任副研究员、书画处处长和副院长，从此尽览历代名画真迹，见识大增，心胸辽阔，画艺与日俱进，终于蔚为大家。不消说，这些是江先生谢世之后我才知道的，在他生前，孤陋寡闻的我只知道江先生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史学者，不但精于鉴赏，对明代吴派书画研究的专精，特别是对唐寅、文征明的钻研，更对海内外艺术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龙坡书法》中对台先生书艺的独到分析，也使我折服。但是，江先生1992年6月亲笔写给我的简历却只有寥寥40余字：“江兆申，字椒原（1925年生），安徽歙县人，现居台湾，生平献身教育及博物馆工作，现已退休，静度乡居生活。”何等平实，又何等谦虚，丝毫不以自己的成就而有所夸耀，其为人处世由此可见一斑。

对江先生的精湛画艺，早已有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在评说，称其诗、书、画、金石“四绝”，他是台湾画坛继张大千、溥心畲、黄君璧之后又一位文人画大师，也早已成为共识，大可不必由我这个门外汉再来置喙。我只想说说拜读《江兆申书画集》之后的惊奇。江先生擅长巨幅山水，山高水长，风起云涌，率性随心，元气淋漓，才情之喷涌，功力之深厚，书卷气之浓馥，实在使我叹为观止。当然，我说江先生巨构的浪漫恢宏，变化多端，并不是说他的小品可有可无，那是同样丰润华滋，气韵超逸的。中国文人画千回百转，发展到江先生笔下，真正是辟一新境，臻于绝唱了。谢稚柳先生所谓“以清人之笔墨，运宋人之丘壑，泽以时代之精神气韵”，确是的评。透过江先生笔墨的恣肆纵横，从容自得，我分明窥见江先生自我性情学养的充分体现，窥见江先生对时空和生命的深切体悟。游心天地，寄托高远，江先生以现代观念融合传统，管领传统，创造了当代文人画的再度辉煌，在当今海峡两岸画坛几乎不作第二人想。而在台湾那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江先生不怕寂寞，自甘淡泊，潜心追求画艺的尽善尽美，更属难能可贵。谁知天妒其才，使江先生处于巅峰时期的宝贵的艺术生命嘎然而止，痛哉！惜哉！

我与江先生只通过二封信，本有可能相见却终于缘慳一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与江先生无缘。但江先生的书画展如期在沪开幕了。我以为读画

册和看原作的体会是截然不同的，印制再精美的画册也无法替代原作的神韵。三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观梅云堂藏张大千精品画展，我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丰富的张大千真迹。领略泼墨山水真面目时的强烈印象至今记忆犹新。我深信这次站在江先生原作前的感受一定也是全新的，无可言传的，历久不忘的。画如其人，有幸面对江先生的真迹，就好像见到了江先生本人一样，就好像真的在与江先生“谈往古来今，都不择辞，兴到则言，意索遂默，至不知今世是何世”。如此说来，我与江先生又毕竟是有缘的，江先生泉下有知，想必也会颌笑首肯的吧？

（原载 1996 年 11 月 2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长序短跋

《知堂杂诗抄》海外归来记

1986年春末，我给湖南岳麓书社钟叔河先生写信，为他主编的《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拍手叫好，因为无论从研究周作人的思想和文学观，还是从保存有关中外书刊珍贵史料的角度看，这都是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叔河先生在回信中告诉我，岳麓书社还打算出版周作人的旧诗和集外文编，并热情约我参与其事，共襄盛举。我却不免有点惶恐，虽然我对周作人的作品颇感兴趣，但自知缺乏研究，难以胜任。

说来也真巧，没过多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郑子瑜教授应邀来上海出席复旦大学授予他顾问教授称号的仪式。我近年来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子瑜先生鱼雁不断，他既来上海自然要去拜访求教。就在这次谈话中，子瑜先生向我透露他还珍藏着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的《知堂杂诗抄》书稿，是周作人在50年代末寄给他的，委托他在海外接洽出版，他原拟交星洲世界出版社印行，后因故未果，一拖就是25年，而周作人去世也已19年了。我早知道子瑜先生当年与周作人有过一段交往，他撰写了第一部《周作人年谱》，周作人则为他的《郑子瑜选集》作过序；我也知道周作人中、后期的一小部分旧诗曾由曹聚仁先生介绍，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儿童杂事诗》还出版过丰子恺插图的单行本，但万万没想到还有这样一部诗稿流落在海外，喜出望外之余，我当即建议子瑜先生把诗稿交付岳麓书社出版。子瑜先生欣然惠允，并且表示：如果由大陆的出版社出版这部《知堂杂诗抄》，那是再合适没有了，也可了却他多年的心愿。

回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子瑜先生就把一大包《知堂杂诗抄》书稿寄来了，总共八辑（即《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苦茶庵打油诗》、《苦茶庵打油诗补遗》、《往昔》、《丙戌丁亥杂诗》、《老虎桥杂诗补遗》、《题画五言绝句》和《儿童杂事诗》）250余首，书前还有周作人写的总序，真是洋洋大观，周作人中、后期所写的旧诗大部分已包括在内。翻读这部诗稿，确实令人感慨万千。它在海外漫游了那么多年，最终仍复回归祖国与读者见面，只有在国内文艺界比较宽松、开放的今天，才有可能；也只有遇到像钟叔河这样思想解放、注重文化积累、有魄力有远见的出版家，才有可能。知堂老人如果泉下有知，也应感到高兴。

周作人是大名鼎鼎的“杂家”，他的诗也是名副其实，独具一格的“杂诗”。不过，这部诗稿虽经周作人自己亲手编定，仍然有所遗漏，尤其周作人早年的诗作，更是暂付阙如。当然，这与周作人认为自己早年的旧诗，特别是那些富于革命气息的旧诗不属于他所谓的“杂诗”有关。我以为，不出周作人的旧诗则已，要出就该力求齐全。因此，在征得子瑜先生和叔河先生同意之后，我不自量力，一方面根据已在海内外发表的《苦茶庵打油诗》（题又作《苦茶庵杂诗》）、《丙戌丁亥杂诗》（部分）和《知堂回想录》等书，对诗稿作了一些必要的校勘；另一方面从《周作人日记》、《知堂回想录》、《周作人年谱》（张菊香、张铁荣编著）以及其他我所能找到的海内外有关书刊中抄出诗稿未收的周作人各个时期所作旧诗57首，编为“知堂杂诗抄外编”收入书中。这样，共得诗308首，附录集句和对联20多首，算是一本较为完整的周作人旧诗集。

尽管如此，这部诗稿的遗珠之憾仍在所难免，原因是周作人曾多次编选自己中、后期的旧诗，几经删削，散失不少，诗稿所收已远非全部。如我最近又找到一首七律《偶作寄呈王龙律师》，它对于研究周作人被捕入狱后的心态很重要，可惜书已付梓，来不及补入了。因而，亟盼海内外识者指教、补充，以期将来有机会再版时更臻完备。

至于如何评价周作人这些旧诗，子瑜先生已在《〈知堂杂诗抄〉跋语》中谈了很好的意见，足资参考。何况诗无达诂，见仁见智，读者自可作出各自的评价，但我相信，凡从事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都可能从中受到应有的启发。

（原载 1987 年 10 月上海《杂家》第 10 期）

《知堂集外文》琐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刚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取保获释的周作人没有接受朋友胡适的劝告去海外，而是于1949年8月回到北京定居，直至1967年5月逝世。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对周作人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使他晚年得以安心从事他所称之为“愉快的工作”，即以精通希腊文、日文、英文之专长，学贯中西之广博的文化知识和深湛的文学修养，出色地完成了多部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与此同时，周作人继续从事他所擅长的散文小品的写作，1950至1951年间、1957至1958年间和1963至1964年间，是周作人晚年小品创作的三次高潮，不仅数量相当可观，内容也极为广泛，既有洋洋长文，更多数百字短章，天上地下，草木虫鱼，诗书琴棋，信手拈来，无所不谈。除了一部分怀旧之作已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等书在海内外出版外，大部分散见于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的报刊，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60年代初，周作人曾自编一册薄薄的《木片集》，共收50年代后期所作的文史小品48篇，书名则取“古人所谓竹头木屑，也可以有相当的用处，但恐怕是简牍上削下来的，那么这便没有什么用，只好当作生火的柴火”之意，颇为别致。书稿已由国内一家出版社排出校样，可惜因故未能问世。后来，周作人还打算编一册《枯叶小集》，当然也未成功。

继推荐出版《知堂杂诗抄》之后，笔者又邀请《周作人年谱》编者之一的张铁荣兄一起为岳麓书社编订《知堂集外文编》，铁荣兄负责建国前部分，笔者负责建国后部分。在海内外同好的帮助下，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搜集，笔者终于编竣这部厚达60余万字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和“四九年以后”）付梓，总算完成了作者生前未了的心愿，也算是填补了周作人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首先，这部文编收入迄今已经找到的周作人1949年11月至1964年10月间所作而从未收集的所有作品，但以下两类文章不包括在内：一、虽系建国后发表，但已查明作于建国前的作品；二、书简。第一类作品将由铁荣兄编入《知堂集外文编》建国前部分，书简要待今后条件成熟时再编集《知堂书信集》。此外，作者建国后为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专集所作的序跋，凡已出书者，也不再编入本编。

其次，周作人自编《木片集》时是分类编排入选作品的，本编却因所收文章多达千余篇，分类着实不易，因此采用鲁迅所主张的编年体的编排法，所收文章次第按笔者考定的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编入，并一一注明来源。这样编的好处在于周作人建国后散文小品创作的发展脉络可以一目了然，只是《避讳改姓》和《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两篇，前者虽曾由作者自己编入《木片集》，至今不明出处；后者写作时间一时也难以确定，因而只能作为例外，暂时分别编入1958年和1964年的作品之内。

再者，周作人建国后发表的散文小品中，有若干篇内容近似或部分重复，如评鹭《四库全书》，前后就写过好几篇，有两篇内容有雷同之处；题为《古文观止》、《杜少陵与儿女》、《麟凤龟龙》、《农历与渔历》、《冬至九九歌》的文章也都不止一篇，而《大通学堂的号手》等篇又与《知堂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大同小异。凡此种种，虽然还不能说周作人晚年文思枯萎，因为不能不考虑到当时客观条件的某些限制，但确实显示出老人笔力已经不如

从前。不过为提供研究比较之用，仍一并依原貌编入，不作任何删选。

平心而论，尽管有些作品是为稻粱谋的急就章（这种情况在 50 年代初期为《亦报》所写的大量作品中尤为明显），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散文小品还是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基本保持了平和冲淡、自然洒脱的独特风韵。诸如对旧礼教旧观念的批评、对故人和往事的追忆、对文坛掌故和名人轶事的介绍，还有文艺随笔、译著心得、动植物趣闻、风土民俗考略、品物杂识、读书偶拾、个人生活琐记等等，大致可以肯定，于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自然史和民族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的研究都不无裨益，更不必说对周作人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了。笔者把全部书稿通读一遍之后，就觉得见识大长，单从周作人 1963 年所写的《郁达夫书简》一文就欣喜地发现了不为人知的郁周交往的重要史实和尚未收集的郁达夫佚信，这样的例子自然还可举出许许多多。至于其中有些文章的观点和提法，相信读者自会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并得出应有的结论。

最后，还有一点应略加申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整个现代文化史上，无论就声望还是成就讲，周作人都是曾与鲁迅相颉颃的第一流大作家，其影响之大，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对周作人的是非功罪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是摆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研究工作面前的严肃课题，岳麓书社出版《知堂集外文编》和周作人的早期作品，正是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提供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是一个不因人废言的明智之举。这与“宣传”周作人和为周作人“翻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建国以后尚且准许周作人用知堂、启明等笔名发表他的著译，难道现在反而不及那时？即使是周作人敌伪时期的作品，仍有不少值得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为了知人论世，探究作者之所以落水的思想和历史渊源，从而正确评价作者“全人”，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恐怕也有挖掘整理，使其与研究者见面的必要。再说，如果我们的文学青年有兴趣读点周作人的书，认识一下鲁迅这位令弟，进而将代表中国文章“阳刚”和“阴柔”之美极致的兄弟俩作一番比较，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指责重印周作人的作品固然容易，可是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繁荣。这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不知海内外广大读者以为如何？

（原载 1987 年 7 月香港《明报月刊》259 期）

周作人的《饭后随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周作人生前出版了 38 种著作，他去世之后，香港又出版了他的 7 种遗著，洋洋数百万言，堪称著作等身，令人惊叹。这还不包括差不多同样数量的翻译作品。但是，周作人自己编定的作品集，在他生前有两种无法问世，一种是人们已经熟知的《木片集》，另一种就是最近才发现“目录”的这部《饭后随笔》。

“饭后随笔”本是周作人 1949 年 11 月 23 日起在上海《亦报》上开辟的专栏名称。当时，从南京老虎桥监狱获释的周作人蛰居北京，应《亦报》主编唐云旌（笔名唐大郎，著名诗人）之请，先是隔日后来每天为《亦报》的副刊撰写五六百字的小品，长达二年半之久。这些专栏文字天上地下，谈古说今，熔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基本保持了平和冲淡、自然洒脱的独特风韵，而且平添了一种明朗的色调，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或史料价值。因此，虽然改署申寿、鹤生、十山、祝由等笔名，仍然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与丰子恺的漫画和梁京（张爱玲笔名）的连载小说一起被称为《亦报》的“三绝”。此外，周作人还在 1950 年 1 月至 3 月的上海《大报》上以荣纪的笔名发表了一批同样性质的小品。这是周作人创作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他撰写小品最多的时期，它们固然主要是为了稻粱谋，但无疑也标志着周作人的小品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份周作人亲笔所书的《饭后随笔》“目录”，正是他 1949 年 11 月至 1950 年 10 月在《亦报》和《大报》发表的小品。对周作人而言，每隔一年左右时间，把所作文章（有时也包括若干译文）收拢来编为一集付梓，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从 20 年代初“确立了中国新文学批评的基石”（阿英语）的《自己的园地》开始，到 40 年代中期的《立春以前》和《知堂乙酉文编》，莫不如此。显而易见，这是文坛大家的一种自信和风度。这部《饭后随笔》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周作人没有想到，尽管《亦报》和《大报》编者仍然偏爱他的作品，专门拨出篇幅予以连载，毕竟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出版了。这部书稿于是胎死腹中，后来只从其中抽出回忆乃兄鲁迅的十多篇小品编入《鲁迅的故家》中，老人的出书惯例也就此中断。到了 60 年代初，周作人再编《木片集》时，编法就大不相同了，只能从 1956 年以降历年发表的小品随笔中挑选自以为是适合时宜的一小部分。虽然如此，《木片集》几经曲折，最终仍未能印行，只留下了一份清样，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见证。

把这份《饭后随笔》“目录”手稿与当时《亦报》、《大报》所载仔细核对，有两点必须向海内外读者说明：

首先，“目录”手稿所列绝大部分为《亦报》和《大报》所载，只有个别篇章，如《罗罗斯福》和《傅大炮》发表时改题《新潮的泡沫》，想必是编者所为。

其次“目录”手稿中有《狗学狼叫》、《历史下河》等 14 篇为《亦报》、《大报》所未载，估计也是编者认为不妥而退了稿，但世变频仍，原稿早已荡然无存，现在只能存目，藉以告诉读者周作人当年还曾写过这些小品。

长沙钟叔河先生 50 年代末与周作人有过交往，从而使这份周作人手订《饭后随笔》“目录”有幸保存下来。我和鄢琨兄据此对照《亦报》和《大报》所载还原，编成这部《饭后随笔》，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我们认为，

对周作人 50 年代初所作的这些小品文字按照他生前自定的编排方式和顺序重新整理出版，不仅具有一种纪念意义，也是更为符合作者的心愿的。同时《木片集》各文，以及我们陆续发掘的 1950 年 10 月以后至 60 年代中期周作人所作的众多小品随笔也一并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使之成为一部既全新又较为完备的周作人后期小品集。

近年来大陆出版界和读书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周作人热”，各种各样的周作人选本奇迹般地“复活”在畅销书摊上，使人眼花缭乱。这里面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和心理机制在起作用，很值得有关的研究者深思。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误的，即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要探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周作人的选择极具代表性，因此他的著作有重新审视、深入研讨的必要。我们希望这部遵照周作人遗愿新编的《饭后随笔》能在这方面有所助益。

（原载 1993 年 5 月《香港文学》第 101 期）

《周作人集外文》编后记

一个偶然的机，使我与周作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6年暮春，我从来访的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教授处得知其珍藏着周作人《知堂杂诗抄》未刊稿，我是个好事之徒，就又辑集了一份外编作为此书附录，一并给钟叔河先生。这本小书由岳麓书社出版后，颇受海内外的注意。

次年夏，我自广州返沪途中在长沙小住，钟先生当面约我进一步参与周作人集外佚文的搜集整理工作。我历来认为要使作家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就必须公开出版其所有的作品。在国外，譬如在日本，连许多二三流的作家都已印行了全集；而在我们中国，尽管现代文学群星灿烂，那时仅仅只有一位鲁迅出版了全集，太不正常了。何况对周作人这位真正称得上著作等身的现代大作家，将其全部丰富而又复杂的作品特别是长期不为人所知的集外佚文整理出版，就更显得必要和迫切。因此，明知自己才疏学浅，考虑再三之后，还是决定尝试。

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我又邀请南开大学的周作人研究专家张铁荣兄共襄盛举。我们商定，由他负责编选1949年以前的集外文，我则负责编选1949年以后的集外文。1988年1月和8月，我编集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和《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相继与读者见面。但更为精采、更为重要的1949年以前的集外文，却因写作时间跨度之长，散佚篇目之多，大大超出我们最初的估计，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而未能如期编成付梓。不久，铁荣兄东渡扶桑执教，这部书稿只好仍由我勉为其难。

然而，要完成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谈何容易！将近一世纪的沧海桑田，许多原始报刊早已残缺不全，或已成了秘不示人的孤本，探幽发微，钩沉辑佚，犹如大海捞针。虽然已有《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和《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可资参考，但这两部书由于种种原因，错漏不少，单是核实工作就是大量的，琐细的。一个新笔名的考定，一篇新佚文的辨识，更是必须小心谨慎，反复求证。就是这样，断断续续，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才编竣这部篇幅长达百万言的《周作人集外文》（四九年以前），终于可以向钟先生、海内外周作人研究者和广大周作人作品爱好者交卷了。

即使如此，我毋庸讳言，这部集外文的遗珠之憾还是在所难免，且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周作人早期日记中有为绍兴《笑报》撰稿的多次记载，1917年3月7日他离开绍兴移居北京前夕在日记中记云：“检阅《笑报》所载旧作，甲寅以来凡三十五首也”。可惜全套《笑报》无处寻觅，这部集外文只能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残叶和周作人日记等收录了寥寥数篇。值得庆幸的是，周作人1939年10月装订的一本《秋草园旧稿——丙午至丙辰间所作》尚存于世，其中就有周作人1914至1917年间在《笑报》发表的“杂文目”，现首次披露如下，一则可以略窥周作人早期创作之一斑，二则也可稍稍弥补这部集外文之不足：

笑话考 甲寅四月初六日

读《孽冤镜》题词 同初十日

绍兴奇丐传 同十二又十四日

淫书杂说 乙卯三月廿一廿三廿八四月初三日

接吻考 同四月初十日

缠足考 同十九日
怀陶君焕卿 同九月十六日
修造兰亭之商榷 同十一月十八日
改元与更名 丙辰正月十三日
寺僧毁学之闲评 同十四十五日
角先生考 同十六日
最近小说界之趋势同廿六日
新因果说 同廿七日
僵尸考 同二月初七日
女学商兑 同十一日
采补辨 同初十日
学生时代之回忆 同三月初八初九初十日
清明日游南镇记 同初七日
豆腐说 同四月初十一日
乌龟考 同二十三日
朱天君说 同五月廿三廿四日
读旧小说之效用 同六月初一初二日
御女延年之批评 同七月廿四廿五日
绍兴长毛时事 同八月初五初六初七初八日
读《国民浅训》感言 同二十廿一日
不蓄婢妾说 同廿二廿三日
《柳塘诗思图》序 又九月初二日
听蔡先生演说记 又十一月初十一日
怀苏子谷 又十三十四日
学生作文之通病 又十七日
韩非子之笑话 丁巳正月初七初八日
《柳塘诗集》序 又十四日
说青川■ 又二月十一日
《秋草闲吟》序 又十二日
禹庙观花鸭子记 又十五日

当然，我希望这批重要的佚文有朝一日还能挖掘出土。

如何估量这部周作人集外文，有待海内外专家学者深入研讨。我在这里只想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作为与胡适、鲁迅并称为“‘五四’三巨人”的周作人，是个无法回避的巨大而复杂的存在。在周作人研究正期待着充实、创新和突破的时候，相信这部集外文能够提供许多新的资料，纠正若干旧的迷误，有助于我们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探索周作人的心路历程和是非功过。而当我们世纪回眸，回顾和总结近百年云诡波谲的中国社会变迁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的不同人生道路时，相信这部集外文也能成为一份不可缺少的新依据，显示其独特的人文学术价值。

当今出版之难差不多已难于上青天了，在学术类图书出版举步维艰的困境下，如果不是钟叔河先生自始至终的关心和鄢琨兄不计劳累担任特约责编，如果不是海南出版社谢军女士、康晓林先生的远见和魄力，如果不是海内外许多同好（他们之中有日本的木山英雄、松岗俊裕、尾崎文昭、伊藤德

也先生，加拿大的鲍耀明先生，香港的黄俊东先生，国内的贾植芳、黄裳、钱理群、裘士雄、张伟、蔡才宝、封世辉先生等）的热心帮助，这部周作人集外文是无法问世的。此外，在书稿的后期整理过程中，华东师大博士生倪文尖君也协助做了大量工作。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4 年元旦于上海
(原载 1994 年 4 月上海《书城》第 7 期)

《上帝的儿女们》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资平是个复杂而又不容忽视的存在。他的作品至少有三个第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他是现代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家中最多产的小说家，先后创作了24部中长篇小说，5部并不重复的短篇小说集；再有，就是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三角恋爱”作家，读过鲁迅《二心集》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书中有一篇《张资平氏的“小说学”》，鲁迅把《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成一个“△”字，真是再简明不过，也再生动确切不过了。

张资平1893年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1912年负笈东瀛深造，他的文学生涯是在日本开始的。与郭沫若当初是学医，郁达夫当初是学经济，成仿吾当初是学兵工一样，张资平学的是地质，但是共同的文学兴趣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策划筹建了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1920年11月，张资平发表了处女作《约檀河之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短中长篇并举，抒发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内心痛苦，描写日本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更多的则是反映“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热烈追求，以及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对他们的束缚。客观平实的写作态度，清新流畅的笔调，再加上甜熟柔婉的情致，使他的作品很快一纸风行。张资平成了前期创造社中仅次于郁达夫的重要小说家。

20年代中期以后，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重点转移，三角恋爱成为他小说的主调，成为他最为擅长，赢得空前成功，但最终也导致他走向庸俗、走向失败的创作题材。1925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飞絮》，创造社刊物在《飞絮》广告中，称这部长篇是描写三角、四角恋爱的“第一杰作”。《飞絮》是一幕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反对自由恋爱的刘教授把女儿刘琇霞许配给门当户对的洋博士吕广君，但琇霞热恋文学青年吴梅，对这爱情始终不能忘怀。婚爱相逆，遂使苦情绵生，悲剧迭出。其间又穿插姨母与甥女争夺情人，使情节更为错综复杂。作者有意安排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新旧思想，既用心良苦，又颇合时宜。而对青年男女恋爱心理变化刻画或细腻委婉，或脉脉含情，或妒恨拒斥，或变态堕落，或呕血弃世，均写得纤微毕露，从而也就深深吸引了广大读者。

次年创作的《苔莉》是又一幕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小说女主人公苔莉与白国淳自由恋爱后结婚，却发现白国淳在乡下另有妻室，她不过是第三任姨太太。苔莉痛定思痛，转而寻找真正的专一的爱情。商科大学生、新进小说家谢克欧和苔莉都热爱文艺，日益亲密，由同情而堕入爱河。因为苔莉对谢克欧来说是“表嫂”，谢克欧又担心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但苔莉的肉身对他已有无比的吸引力。他们终于同居。谢克欧为前程计，不久又打算与苔莉分手。然而，他们已沉湎在无节制的性生活中而不能自拔，结果竟都身患痼疾，自知不久于人世，两人相约一起出走南洋，双双投海殉情。在这支爱情至上的悲歌里，奏出了低沉凄绝的和声。导致这一对青年人死亡的，不仅是社会的不容，更是情欲本身。性心理描写的精细入微，引人入胜，在《苔莉》中达到了极致，难怪张资平要自负的声称《苔莉》“可超过《飞絮》”。这部小说也确实轰动一时，成为张资平三角恋爱小说的代表作。

到了30年代初，“革命文学”的浪潮已席卷上海文坛，张资平在大量制

作三角恋爱乃至多角恋爱小说的同时，也尝试“转换方向”，但大部分牵强附会，弄巧成拙，并不成功，长篇《爱之涡流》算是其中较为可取的一部。小说描写官宦之家女儿曲折的婚姻遭遇。教会学校女生陈梅仙听从父命，与留德医学博士罗洪元订婚，但她又暗恋大学生文俊英，直至失身于文俊英。不料文俊英不肯与之正式结合，陈梅仙后悔之余，觉得在堕落的现代青年身上找不到真正的爱情，终于嫁给罗洪元。但罗也是寻花问柳之徒，在爪哇染疾身亡。他的堂弟启元于是与陈梅仙产生私情，但在宗法礼教束缚下，他们不敢吐露真情。结果罗家逼启元与表妹结婚，陈心急如焚，却遇到普罗画家梁叔恺，梁开导她：色欲是现代社会的布尔乔亚阶级大多数人想犯的罪恶，包括罗启元之流，有了钱就以女性为玩物，所以第一责任要改造社会。这一番话，竟使陈梅仙马上“明白社会主义”，摇身一变，加入“左翼艺术家联盟”，但她又未能忘情于启元，在启元新婚之夜自杀身亡。小说虽然对资产阶级对待爱情的虚伪态度和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压制有一定的批判，但硬写恋爱至上主义者的女主人公走上革命之路，未免有点不伦不类，从中倒可看出张资平是如何迎合“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时尚的。

张资平的小说中存在着较浓厚的宗教意识，他是现代作家中能够广泛地、多侧面地描写教会生活，揭露教会黑暗丑恶的一面的一个代表。《上帝的儿女们》就是张资平用力最多的一部长篇，自1922年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开始掲載到1931年定稿于上海，历时达10年之久。小说描写教会学校学生余约瑟连做祷告时也在欣赏女同学杜恩金的曲线美。杜恩金嫌他鄙俗，钟情于表兄文仲卿。谁知杜母也在追求文仲卿，争风吃醋，强将女儿许配给余约瑟。余结婚后当上副牧师，他以“赚了钱便可以当上帝”为信条，进谗言挤掉恩师，爬上主任牧师的职位。而文仲卿留美归国后又与杜恩金偷情。余约瑟组织屠牛公司不善而倒闭，辗转去南洋当淘矿工人，最后加入同盟会的华侨暗杀队。他的儿子余阿曷则与姊姊乱伦，又视庄严绚烂的世界为“食和性的世界”，大吊女人的膀子，后来考上陆军学校，加入革命党的战斗队，重逢同走革命路已成残废的父亲。小说试图表现教会内部的阶级压迫与抗争，对教会世界的腐败邪恶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也有所赞扬。但它只批判教徒而不质疑教义，认为圣徒可以疗救社会。特别是小说对性行为、性混乱、性变态的渲染有点过份，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

30年代中期以后，张资平的小说每况愈下，走入粗制滥造的绝境，40年代他又堕入附逆深渊，为国人所唾弃。1959年底，他在安徽劳改农场病死。但是综观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尽管瑕瑜互见，毁誉参半，他毕竟还是对新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小说创作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就总体而言，张资平的小说介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在当时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就是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可读性，固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值得深入研究。张资平在新文学作品如何适应当时的文化市场，如何走向大众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虽然后来跌入了媚俗的歧途。作为“五四”以后在新小说中进行性心理描写的最初尝试者，张资平大大拓展了新小说心理描写的领域，增强了新小说的表现力，但后来也陷进了色情的泥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样值得认真汲取。

（原载1994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上帝的儿女们》）

《回忆郁达夫》编辑说明

郁达夫是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为是震世骇俗的作品；在 20 年代，他的小说曾一度与鲁迅先生的齐名。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他作品中强烈的主观色彩、感伤的抒情倾向和清丽自然的文笔，曾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郁达夫是被作为拥有自己风格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和杂文政论家而载入我国现代文学史的。作为一个最终为反抗法西斯侵略、捍卫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而献身的烈士，郁达夫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在国外，尤其在日本和新加坡，郁达夫也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

研究一位作家，首先当然必须研究、分析他的作品，这是最主要的工作。但是仅限于此还不够，要全面考察这位作家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同时代人对这位作家的有关回忆也绝不容忽视，因为他们的回忆往往会给研究工作提供新的资料，提出新的课题，从而有可能对这位作家进行新的探讨，作出新的评价。以往许多回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的文章对研究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就已证实了这一点。

在郁达夫研究领域里，从郁达夫 1945 年 8 月 29 日晚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被凶残的日本宪兵秘密绑架，惨遭杀害以后，国内外报刊就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悼念文章。1957 年 7 月，新加坡南洋热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回忆、纪念郁达夫的专集《郁达夫纪念集》。自 60 年代中期起，新加坡和日本，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报刊时有回忆、纪念郁达夫的文章掲載，尽管有的是谬托知己，似褒实贬，但也不乏足资参考的好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千方百计查访郁达夫的留日同学、文坛友好以及在苏门答腊流亡时的相识者，发掘整理了许多有关郁达夫生平和创作的新史料，使郁达夫研究工作在其早年的文学活动、晚年的被害之谜等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

可惜在我国国内，“文革”前的 17 年，由于不公正地把郁达夫当作“颓废作家”，错误地夸大郁达夫作品中的消极面，结果使人视郁达夫研究为畏途，回忆郁达夫的文章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几篇。十年浩劫中，田汉、孟超、陈翔鹤、王任叔等许许多多郁达夫的生前友好被迫害致死，更给郁达夫研究工作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随之，郭沫若、成仿吾、阿英、冯乃超等郁达夫生前友好又相继去世，抢救有关郁达夫的回忆史料更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这项工作必须有人来做，这项工作必须抓紧去做。

鉴于此，我们在编辑了《郁达夫文集》（共 12 卷，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和《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卷，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着手编集这本回忆文集。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又承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这本《回忆郁达夫》终于在郁达夫遇害 40 周年纪念来临之际，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本书文章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本书特约稿，作者有范寿康、钱潮、张友鸾、沈松泉、许幸之、冯至、孙席珍、刘开渠、刘海粟、李俊民、楼适夷、李剑华、许杰、周全平、白薇、王映霞、王宝良、王余杞、钱君匋、赵景深、赵家璧、季楚书、黄源、

陆诒、唐弢、蒋授谦、臧云远、赵家欣、许钦文、盛成、徐君灏、乔冠华、石蕴真、胡伟夫、刘尊棋、金丁、张楚琨、吴柳斯和旅居英国的凌叔华、新加坡的胡迈、郑子瑜、广洽法师、黄葆芳、李金泉、泰国的吴继岳、印度尼西亚的郑远安，以及香港的朱渊明等先生。这一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其中有的篇章已先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

二、黎锦明、许峨、郁风、钟敬文、黄贤俊、余瑾、张白山、蔡圣焜、陈觉民、陈文瑛、郁飞、姚楠、王啸平、胡愈之和旅居美国的谢冰莹、新加坡的潘国渠、包思井等先生先前已发表的回忆郁达夫的文章，因为内容都较重要，我们征得作者同意，一并收入本书。除个别篇章外，这些回忆录均由作者重新作了修订。

三、已故的郭沫若、郑伯奇、叶灵凤、黎烈文、易君左和日本的小田岳夫先生回忆郁达夫的旧作，这些文章在过去众多的回忆录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不常见或不易见，故而入选。诚然，这类文章中还有陈翔鹤、王任叔等人的回忆录也很著名，因已选入《郁达夫研究资料》，本书限于篇幅，所以只能割爱了。

所有文章均按作者与郁达夫交往的先后顺序排列，个别的略有调整。这些作者中，既有郁达夫留日时的同学和文艺界的朋友，也有他的学生和受过他指导、帮助的文学青年，既有他在福建省政府和星洲日报社工作时的同事，也有他在苏岛流亡期间患难与共的战友，此外还有他的子女和昔日的亲人。

郁达夫一生各个时期的活动，包括留学日本、创办创造社、执教北京大学、南下广州、大革命前后在上海、迁居杭州、抗战军兴去武汉、远走南洋，直至最后以身殉国，在本书中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反映，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郁达夫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比较复杂曲折，但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烈的挚爱，对艺术的执著的追求，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假丑恶的憎恨，却始终如一，贯穿他的一生。他具有正直、率真的可贵品格，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战士。许多作者还对郁达夫的思想观点、生活态度与气质性格的长处和弱点，对他的作品的独异的艺术特色和局限性，以及他生平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然观点并不一致，甚至还有分歧，但都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为本书撰稿的各位前辈均以谨严的写作态度回忆、缅怀郁达夫，有的要求我们尽可能提供有关的文字材料以帮助回忆，有的对文章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不过，由于年代相隔较久，有些文章在史实上仍难免略有出入。凡是已经发现了的，均已征得作者同意，作了相应的修改。作者已经去世的或因其他原因来不及征求作者意见的，则由我们对文中明显的误记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至于对一些有争议的史实，则保留不同的说法，以备进一步查考。

本书的作者凡健在者，大都年事已高，其中不少人还历尽艰难曲折，健康状况一般说来都不够好，有的还住在医院里，很多人依然壮心不已，活跃在思想文化界，担负繁忙的社会工作。尽管如此，他们仍克服困难，热情惠稿，使我们深受感动。国外作者不远千里寄来佳作，更属难得。许多作者还把自己保存多年的郁达夫照片、手迹提供本书发表，弥足珍贵。我们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成仿吾老，当年与郭沫若、郁达夫一起创建创造社，是郁达夫的好友，他在重病中审阅了本书初选目录，不幸这位中国新

文学的先驱者已在今年 5 月 17 日与我们永别了。其他好几位热情为本书撰稿的先生也已先后离开人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怀念。

郁达夫生前友好刘海粟先生热情为本书封面和扉页题签，钱君匋先生当年为《达夫全集》设计过封面，如今又欣然担负本书的装帧设计，这些都富有纪念意义，我们也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郁达夫生前友好沈从文先生和远在新加坡的刘延陵先生因在病中，一时无法为本书撰稿，但他们都很关心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也应在此致谢。

郁达夫有许多友好故旧在台湾，可是人为的阻隔，使我们无法约请他们惠稿，令人深感遗憾。我们相信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一定会改变，海峡两岸的郁达夫生前友好和研究工作者定将聚集一堂，共同纪念和研究这位著名的文学家和爱国志士。

1984 年 10 月于上海
(原载 1986 年 12 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初版
《回忆郁达夫》)

《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编后缀言

“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胡愈之语）郁达夫，酷爱读书、藏书。从念中学时购读《西湖佳话》和《花月痕》开始，无论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还是在日本和新加坡，郁达夫数十年如一日，不但奋笔著译，而且节衣缩食，大量购书，勤奋读书。这在他自己的文章和亲友的回忆录中都有生动的反映。他爱书如命，称之为“书迷”、“书痴”，是再恰当不过了；“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的诗句，正是他在这方面的自我写照。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使郁达夫损失了留在杭州的数万册珍贵藏书，他在《敌我之间》一文中把这事与老母和胞兄的惨死、爱人的离异相提并论，痛惜不已。在印尼流亡期间，尽管处境险恶，他仍搜求了数千册英、荷、日文书籍，坐拥书城，潜心研读。直至殉难前夕，还打算翻译林语堂的长篇小说《瞬息京华》^①和邱吉尔的《战时演说集》等书。综观郁达夫一生，可说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著书之真诚，读书之广博，藏书之丰富，评书之直率，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我们想到，如果把郁达夫关于中外图书的各类文章结集在一起，也许有人会喜欢读，因为从中可以清楚地领略郁达夫关于著书、译书、编书、印书、买书、读书、评书、藏书、失书的精辟见解，可以增长许多有关书籍的见闻，从而有助于我们陶冶读书的情趣，提高读书的鉴赏能力。出于这种考虑，在范用、沈昌文和秦人路先生的热情支持下，我们编选了这本《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

本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是郁达夫为自己的著译所作的序跋；第二辑是郁达夫为他人的著译所作的序跋；第三辑是郁达夫披阅古今中外各类书刊后所写的评论、介绍文章；第四辑是郁达夫综合各类图书写出的专论或札记，以及泛论买书、读书、藏书和图书馆作用等方面的文章。郁达夫关于图书的著述，除个别篇章外，都已收在这里，各辑都分类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其中部分文章是最近才发掘出来的，为第一次结集。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还对郁达夫作序和评介的中国现代书刊的版本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至于中国古籍和外国作品的版本源流，一则情况比较复杂，二则郁达夫自己在文章中已不同程度地作了介绍，我们一般不再加注。

此外，已经公开的郁达夫日记中也有许多图书评介和关于买书、读书的记载，虽系随手所记，或者只是三言两语，但仍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体会和发挥，也更全面地展示了郁达夫读书的兴味和偏好之所在，所以我们又辑集了《郁达夫日记中关于图书记载摘编》，作为本书的附录。凡日记中能相对独立的对中外书刊及其作者带有感想和评介性质的文字，绝大部分已收录在内。不过，单纯买书和读书的记录，因日记中比比皆是，为免过于琐碎和节省篇幅，就只能割爱了。

最后，谨向热情关心和鼎力支持本书编辑出版的郁达夫先生子女和浙江文艺出版社致谢，向一贯重视文化积累、玉成本书出版的三联书店致谢，并欢迎海内外的“书迷”不吝指教。

1986年夏于上海

^① 郁达夫的遗愿已由其子郁飞完成，郁飞所译《瞬息京华》，1991年12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1 年冬改定
(原载 1995 年 3 月北京三联书店初版
《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

《台静农散文集》编后记

20年代以《地之子》、《建塔者》等乡土小说蜚声新文坛，深得鲁迅赏识的台静农先生，1946年秋渡海去台湾大学执教，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台老晚年不但以书法名重于中外士林，也以散文小品享誉台港文学界。前年他的《龙坡杂文》问世，顿时好评如潮，一再登上台湾文学新书“排行榜”，并光荣获奖。

只要读一读本书所收的这些文章，谁都不难发现，在台老笔下，无论怀旧忆往，还是论文谈艺，无不直抒胸臆，娓娓而谈，字里行间学问和性情交相辉映，历尽沧桑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耿直狷介和深厚博大的人文关怀尽在其中，而抚今追昔的感慨和对真善美的向往更是令人心折，真所谓“思极深而不晦，情极哀而不伤，所记文人学者事，皆关时代运会。”（台湾《联合报》评语）凡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教育、艺术史的，都能从中学到点什么，我以为。

台老文笔朴拙，不做作，少雕琢，固然迥异于当今港台流行的抒情文，却同样传神，传情、传真。这种通俗顺当，如行云流水般找不到一点刻意，看似随意挥洒，像一幅幅浓淡得宜，笔墨无多的小品水墨画，其实难以企及，非经百般磨练无法达到。如果有谁读过台老的一些“少作”，当更能体会台老晚年消磨绚烂归平淡，已臻散文追求的理想境界，炉火纯青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李白的名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借来形容台老的散文，那是太恰当不过了。

起意编这本散文集还在4年之前。那时香港作家林真先生寄给我一本台湾旅美女作家洪素丽主编的《一九八四年台湾散文选》（台北前卫出版社版），开首第一篇就是台老那篇恬淡悠远的《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我立刻被深深吸引住了，诵读再三，回味无穷。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台老去台湾后发表的散文，此后就锐意穷搜，在海内外同好，包括香港的黄俊东、小思、陈无言、台湾的秦贤次、吴兴文、旅居西德的龙应台、大陆的舒芜、朱正、姜德明和日本铃木正夫诸位的鼎力帮助下，居然为数可观，可以为大陆读者编一本集子了。又经画家刘旦宅先生热情介绍，通过远在美国的台老长子台益坚先生与台老取得联系，台老不仅惠允出版拙编，而且从书名的确定到篇目的删选，都悉心指点，他老人家的谦和长厚，使我深受感动。

本书所收台老到台湾后发表的散文小品共45篇，除台湾洪范书店前年出版的《龙坡杂文》诸文全部编入外，还增补了散佚在台湾报刊上的《追思》、《谈谢次彭先生写竹》、《序冯幼衡作〈印象之外〉》、《〈红楼梦的重要女性〉序》、《〈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后记》、《〈乔大壮印蜕〉序》等篇佳作。台老门生故旧徐中玉先生和林辰先生欣然为拙编作序，追忆台老平生风谊，情思绵绵，使我们对台老的道德文章有了更真切的体认。

最后，隔海遥祝尊敬的台老健康长寿！并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前辈、朋友深致谢忱！

庚午暮春于海上
(原载1990年9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初版
《台静农散文集》)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编后琐语

起意编这本书，还在4年之前。那时香港林真先生寄给我一册梁实秋先生的《看云集》（台北志文出版社版），读后大长见识。我认为梁先生这些文字不但是情深意切的怀旧佳作，更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珍贵史料，有必要介绍给大陆读者。后来，由于忙于别的研究课题，此事耽搁下来，但我从此注意搜集梁先生离开大陆去台湾后发表的有关文学活动的回忆录，日积月累，为数已很可观。

去年7月，我应邀赴西柏林出席欧洲华人学会第四届大会，有幸在汉堡天地书店主人梁泳培兄处得到久觅不获的梁先生《谈徐志摩》一书，欣喜之余，重新引起编书的兴趣。于是返国后专诚拜访梁先生长女梁文茜律师，承她热情接待，对我编辑这本《梁实秋文学回忆录》深表赞同，还答应辗转去信请梁先生本人帮忙，设法惠寄我尚未找到的几篇文章。不料编选工作刚着手进行，噩耗传来，梁先生于去年11月3日在台北溘然长逝，我永远失去了向梁先生请教的机会。在海峡两岸文学界共同的哀悼声中，我加快了工作进度，以求本书早日问世，作为对梁先生的一个纪念。

现在，《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全书共分五辑，第一辑是梁先生回顾自己文学生涯的九篇文章。梁先生辛勤笔耕七十余载，集文学批评家、散文家、翻译家、编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于一身，在现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容抹杀的地位。春华灼灼，秋实累累，这些文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生动地展示了作者所走过的多姿多采又颇多争议的文学道路，无论如何，对研究梁先生本人，以及对公正、全面地评价现代文学史上的几次重大论争，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可惜限于篇幅，诸如翻译活动的回忆，只能入选一篇，管中窥豹而已。《影响我的几本书》一文虽非文学回忆性质，但于研究梁先生的思想和作品不可或缺，也一并收入。

第二辑只有三篇文章，份量却不轻，是专谈新月派历史的。新月派的成就和影响，在文学史上堪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相比，可谓鼎足而立。但如何估量其功过，海内外学术界仍存在不小的分歧。作为《新月》的发起人和主干，梁先生以当事人的身份写下的这些回忆，详细地追述新月派的形成和活动情况，无疑将大大有助于对这个著名文学社团的研究。第三辑收入回忆胡适的三篇文章，第四辑则是关于徐志摩的一组文章。梁先生与胡适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与徐志摩也交谊甚笃，他发表的缅怀旧游之作也数胡适和徐志摩为最多，哀思绵绵，意犹未尽，全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这两位新月派代表人物的重要史料，故而分别集中在一起，以示醒目。评论陆小曼山水长卷一文，因与徐志摩有关，自然附于第四辑之末。梁先生还有一篇《徐志摩与〈新月〉——诗人徐志摩逝世四十周年》，系《谈徐志摩》和《忆〈新月〉》等文剪裁合并而成，不录。

最后一辑内容最丰富。梁先生所回忆的这些作家，除梁启超是近代文学大师，夏济安是台湾当代文学的先驱者之外，其余大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时俊彦。只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中的不少人长期遭到歧视和冷落。近年来，他们在新文学创作、评论或翻译等方面的卓越贡献，已逐渐为海内外学术界所重视。梁先生怀旧伤悼，文笔亲切深婉；臧否人物，月旦作品，又自成一家之说，真是非知交不能道，非识者不能言，值得再三回味。集中回忆周作人、老舍的几篇内容略有重复，鉴于搜求不易，不忍割爱，望读者

明察。梁先生另有一篇《再谈闻一多》，主要根据当时报导，议论闻一多遇刺真相，与文学关系不大，也不录。



梁实秋第一本著作《骂人的艺术》封面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本书，并为进一步研究梁先生和其他有关作家提供线索，我尽所知对部分入选文章作了简要的注释。不过我的注释仅限于具体史实，即一、因为年代相隔较长，梁先生记忆有误差的；二、梁先生的回忆不够清楚完整，需要稍加补充的；三、梁先生提及的若干史实和作品的出处。凡属观点性的，如梁先生对与鲁迅先生及左翼作家论战、对左翼文艺运动、对围绕“与抗战无关论”的争论的看法等等，我没有加注，事实上也难以用简注的方式作出说明，因为这些问题比较复杂，牵涉面很广，应该另撰专文探讨的。我的注释肯定有疏漏或不当，恳盼海内外方家指正。

诚然，对梁先生文中的某些观点和提法，我不敢苟同，曾考虑是否作些删节，以免招致非议。但寻思再三，觉得大可不必。梁先生的政治观和文学观是众所周知的，从30年代到80年代，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今梁先生已归道山，我没有理由删改他的遗文，使之失去原意，否则，反而会使读者感到困惑。因此，我最终决定尊重历史，悉依原貌，一字不删（必要的文字校勘当不在此例）。相信读者自会分析比较，得出应有的结论。

香港林真先生和陈无言先生对编选工作诸多支持，钟叔河先生和鄢琨兄又玉成本书出版，谨此深致谢忱。

1988年1月于上海
(原载1989年1月长沙岳麓书社初版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

《回忆梁实秋》前言

梁实秋何许人也？笔者相信现在的大陆读者一定不会再感到陌生和神秘了。在睽隔将近 40 年之后，他们终于从陆续开禁的众多梁实秋作品中逐渐认识了这位 1949 年渡海赴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散文大师。请看一看下面这份统计表吧：

雅舍怀旧——忆故知 1986 年 4 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雅舍小品选 1987 年 10 月人民日报出版社
雅舍小品（初集） 1987 年 12 月上海书店（影印本）
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 1988 年 4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雅舍小品选 1988 年 10 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偏见集 1988 年 12 月上海书店（影印本）
梁实秋散文选集 1988 年 12 月百花文艺出版社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 1989 年 1 月岳麓书社
梁实秋散文（——四集） 1989 年 9 月、12 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雅舍菁华 1990 年 2 月湖南文艺出版社
梁实秋林语堂妙语集萃 1990 年 6 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梁实秋读书札记 1990 年 9 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梁实秋怀人丛录 1991 年 2 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梁实秋美文精萃 1991 年 5 月作家出版社
梁实秋幽默散文赏析 1991 年 9 月漓江出版社
梁实秋妙语录 1991 年 10 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娓娓而谈——梁实秋散文小品精萃 1992 年 5 月 海南出版社

真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而且这份书目肯定还有遗漏，有待版本目录学家继续充实。其中《梁实秋散文》、《雅舍菁华》等书都是一版再版，多次被北京、上海、成都等大都市的书店列为“最畅销的文学作品”，而笔者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去年投票评选“我最喜欢的十本书”，梁实秋的散文赫然与《史记》、《红楼梦》、《简爱》、《战争与和平》、《围城》等中外古今名著一起上榜。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在大陆出版界和读书界已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梁实秋热”，已有论者在研究这种发人深思的“雅舍小品现象”。其实，这一切只不过再次证实了一个客观的艺术规律：趋时媚俗之作，生命必然短暂，真正优秀的作品，一定经得起风吹雨打，而不失其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因此，笔者编选这部《回忆梁实秋》也许是适合时宜的。笔者历来认为，研究一个作家，分析阐释他的作品无疑是首要的也是主要的工作，但这并不排斥读者研读有关作家生平经历的回忆和研究资料，因为它们往往是对作品的有益的补充，或正可与作品互相印证，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接受”作品。何况梁实秋当年的“论敌”鲁迅也早就说过，倘要“知人论世”，最好顾及“全人”。基于这种认识，窃以为不管是梁实秋作品的爱好者，还是专业研究工作者，在欣赏了他那清雅幽默，文采斐然的“雅舍小品”之后，再来读一读这部回忆文集，就大有必要了。

本书所收回忆文字，发表时间自 50 年代至 1987 年梁实秋逝世之时，作

者则遍及大陆、台港和海外，他们中有梁实秋的同窗好友，更多的是他的门生故旧，还有他的事业有成的子女，都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纪念这位名扬中外的文学家，许多篇章本身就是优美动人的散文杰作。在一部多姿多采却又冲突四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是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他是五四时期第一个大学纯文学团体——清华文学社的发起人，后负笈美国，服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返国后成为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鼎足而立的著名新文学社团“新月派”的重要代表，30年代初与鲁迅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战，抗战初期又因提出“与抗战无关”的文学主张而横遭指责，这些在本书中均不同程度的有所涉及，作者各抒己见，从文化意识的脉络，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看法。对于梁实秋在文学批评、散文创作、名著翻译、词典编纂和大学教育诸多领域里的杰出成就，以及他精神气质上的归属、学派风格上的师承和为人处世上的谨严坦诚，书中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鲜为人知的资料，你尽可在其中徜徉掇拾，追寻梁实秋丰富而曲折的人生和艺术行踪。这就有助于进一步深刻认识梁实秋其人其文及其文化底蕴，有助于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梁实秋，从而为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新定位。

编集本书费时三载，甘苦自知，蒙海内外不少师长文友和梁实秋子女热情帮助，吉林文史出版社慨予出版，尤为心感。然而由于海峡两岸社会制度的不同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个别文章的个别提法不得不遵出版社嘱略作删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只能敬请作者和读者谅解了。

1992年5月于上海

《也是人生》前言

十年前，为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害 40 周年，我和王自立先生合编一本《回忆郁达夫》，远在美国纽约的钱歌川先生是我约稿的对象之一。待到钱先生拨冗命笔，把《回忆郁达夫》一文寄来，拙编却已发排，来不及补入了。遗憾之余，我只能把这篇文情并茂的回忆文字转给在海内外享有声誉的《新文学史料》杂志，于该年第 3 期“纪念郁达夫专辑”发表。这是我与钱先生结交的开始。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经常鱼雁往来，直至钱先生谢世。钱先生的好友、著名旅美书法家潘力生先生知道我们之间的这段忘年友情，后来特地寄赠厚厚四大卷的《钱歌川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给我留作永久的纪念。

记得钱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结尾引用了他自己的一首七绝：

五十年前事笔耕，无端遍地满刀兵；
今日重来文会友，时人又得渐知名。

我最近查阅了有关资料，才明白这首诗是钱先生为他睽隔故土 40 年后，在大陆首次出版新著《浪迹烟波录》而作，短短 28 个字，蕴含多少沧桑和感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许多读者根本不知道钱歌川为何许样人，就像他们不知道林语堂和梁实秋是谁一样，这实在是文坛的不幸。

钱歌川生于 1903 年，湖南湘潭人，自号苦瓜散人。早年负笈日本，毕业于东京高师。回国后参与创办开明书店，30 年代初任中华书局编辑兼综合性月刊《新中华》主编，后游学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抗战期间先后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世说》周刊主编等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主任秘书，卸任后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院院长，后转任成功大学英文教授和陆军军官学校教授兼英文系主任。60 年代赴新加坡，先后任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 1972 年退休。晚年旅居美国，专事写作，1990 年 10 月 13 日在纽约病逝。因此，钱歌川的一生大致用六个字即可概括，那就是：编辑、教授、写作。

钱歌川多才多艺，木刻、篆刻和书法无一不能，又翻译过英、美、东欧和日本的小说、剧本及童话，正式出版的就达 10 余种之多，还编过不少有关英文诗歌或翻译和学习英语的书，包括那本在海峡两岸风行一时的《翻译的技巧》，80 年代初留学欧美而今已事业有成的大陆学人大都曾从中受惠，但他却认为这“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书”，不值一提。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是他的中文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

早在 1929 年 2 月，《一般》第 7 卷第 2 期就发表了钱歌川的小说《诞生日》，这是钱歌川的处女作。此后，他又在 1930 年 7 月、9 月的《现代文学》第 1 卷第 1 期、第 3 期上发表新诗《春宵》和《别情》，这些都可看作钱歌川文学创作的最初尝试。直到 1932 年，钱歌川北上，在盛成、阎宗临等友人陪同下饱览故都风光，迷恋不忘。返沪后用“味橄”笔名在《新中华》上连载此行观感的随笔小品，大受欢迎，后于 1935 年 3 月结集为《北平夜话》由中华书局出版，仍不脛而走，钱歌川才对随笔小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踏上散文创作的不归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钱歌川笔耕不辍，“味橄”散文脍炙人口。据我统计，

他在大陆和海外总共出版了《詹詹集》、《流外集》、《偷闲絮语》、《巴山随笔》、《游丝集》、《虫灯缠梦录》、《竹头木屑集》、《狂瞽集》、《罕可集》、《秋风吹梦录》、《楚云沧海集》、《云客水态集》等 20 多本散文集。就数量而言，仅次于周作人，超过了林语堂和梁实秋；就质量而言，也是文采风流，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可谓成就斐然，被誉为不可多得的中国现当代散文大家。

钱歌川的第一本散文集《北平夜话》问世时，当时的报刊是这样推荐的：

文笔生动，趣味隽永，使人读之如在冬夜围炉，促膝闲谈；寓意深刻，观察入微，故都的人情风物，莫不跃然纸上。

这多少道出了钱歌川散文小品的特色。钱歌川的散文题材十分广泛，古今中外，天上地下，或忆好友，或道痴情，或谈宠物，或说世故，或论风俗，或讲女权，或闲话茶烟，或细述游踪，凡人之所不及谈或不屑谈者，钱歌川用锋锐的眼光，诙谐的论调，风趣的笔墨，一一娓娓道来，大都构思巧妙，想象丰富，深合理趣，而语言的朴实典雅，表达的自然舒坦，更使钱歌川的散文平添一种风韵，引人入胜。

在《谈小品文》一文中，钱歌川对西洋散文始祖蒙田所说的“我所描写的，就是我自己”推崇备至，强调这“正是小品文的真谛”。钱歌川认为“小品文是一种表现自己的文学”，“最上乘的小品文，是从纯文学的立场，作生活的纪录，以闲话的方式，写自己的心情。”他不但是这样主张的，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正是这样实践着的。钱歌川的散文，特别是那些精美之作，很注重个人笔调，这种与众不同的个人笔调，在我看来，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如香港作家林真所指出的，钱歌川的散文“有点儿英国散文的味道：闲散，渊博，隽永”；二是他的散文充分展示了作者的个性、癖好和生活的轨迹。因此，读钱歌川的散文，我逐渐感受到一种修养，一种真率，一种亲切，一种人生的态度，就像他笔名“味橄”的含意那样，如嚼橄榄，深有余味，甘美无穷。

当然，在钱歌川洋洋七八百篇散文小品中，要说篇篇珠玑，也是不切实际的，他的散文集中也有一些为稻粱谋的急就或应景之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非是专业研究工作者，一般读者未必有兴趣或有时间通读钱歌川的散文，于是，编选一本钱歌川散文小品精萃也就很有必要了，钱先生如泉下有知，想必也会颌首赞同，这本《也是人生》即由此应运而生。应该说明的是，选本体现了选家的眼光，我既力求反映钱歌川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散文佳作，同时也不否认我个人的偏爱，如多选了几篇颇具文史价值的现代文坛回忆录即为一例，效果如何，就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了。

1995 年 4 月 8 日于上海
(原载 1996 年 4 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初版
《也是人生》)

叶灵凤《永久的女性》前言

在高手如云的现代作家中，叶灵凤是较早尝试创作通俗小说，并且取得了可喜成就的一位。

叶灵凤（1905—1975），笔名林丰、叶林丰、任诃、霜崖等，生于江苏南京。20年代初到上海，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求学。1925年加入创造社，积极参与《洪水》、《创造月刊》编务，成为中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与潘汉年、周全平等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次年与潘汉年另组幻社，出版激进激烈、别具一格的《幻洲》半月刊，在文艺青年中风行一时。后来又接连主编《戈壁》、《现代小说》等文艺刊物，均在当时文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20年代末在“革命文学”论战中曾与鲁迅交恶。30年代初一度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现代书局编辑，1934年与穆时英合办图文并茂的《文艺画报》，其后不久加入邵洵美主持的时代图书公司任编辑，在此期间还曾大力支持新兴木刻运动。抗战爆发，他先在《救亡日报》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广州失陷前夕到达香港，先后主编《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等副刊，并兼任大夏大学文学教授，继续致力于抗日文化宣传。香港沦陷后，以主编《新东亚》、《大同》、《大众周报》等刊物为掩护，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部香港特别情报员，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地下抗日工作。抗战胜利后至70年代，叶灵凤一直在香港定居，长期担任《星岛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笔耕不辍，为香港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叶灵凤多才多艺，集小说家、散文家、编辑家、翻译家、美术家和藏书家于一身，这在现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他早年以小说创作名世，作品甚丰，有短篇小说集《女娲氏之遗孽》、《菊子夫人》、《鸠绿媚》、《处女的梦》和长篇小说《红的天使》等，擅长以奇特怪诞的手法，清幽缠绵的笔调描写爱情和畸恋，情节扑朔迷离，结构变幻多姿，又颇注重人物“内心的分析”，在创造社诸家中独树一帜。散文结集则有《天竹》、《白叶杂记》、《灵凤小品集》、《读书随笔》和《忘忧草》，同样感情浓烈，文笔绮丽。叶灵凤后期专心从事随笔小品写作，同时埋头于香港掌故、方物的开创性研究，尤以一位“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的身份，撰写各类书评书话多达百万言。生前出版有《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香港方物志》、《晚晴杂记》等书。谢世以后又经人整理出版了《读书随笔》（三卷）、《花木鱼虫丛谈》、《世界性俗丛谈》、《香港的失落》、《香港浮沉录》和《香港沧桑录》。作品风格明显由“绚烂归于平淡”，而且中外古今，奇闻逸事，无所不谈，史实与文采兼备，意味隽永，充分发挥了知识性、抒情性、可读性的特长，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散文大家。

《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和《永久的女性》是叶灵凤1932年冬至1936年秋在上海创作的三部长篇爱情小说，前两部先后连载于《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永久的女性》则载连于《小晨报》副刊，其后分别由四社出版部、今代书店和大光书局出版单行本。30年代初，上海各报副刊的连载小说基本上还是旧派文人的一统天下，新文学家尚无立足之地。但1931年4月《时报》率先连载巴金《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以迎合新文学的时尚，结果大受读者欢迎。从此各报纷纷效仿，局面终于改观。叶灵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欣然接受《时事新报·青光》编者的邀请，动手撰写连载长篇的。而且，他有自己的新追求，即试图打破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

界限，探索创作雅俗共赏的新大众小说。对此，他在《〈时代姑娘〉自题》中说得很清楚：“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要尝试的大众小说，是想将一般的读者由通俗小说中引诱到新文艺园地里来的一种企图。”在当时文坛上的一些理论家还在为“文艺大众化”争论不休的时候，叶灵凤用自己这一系列作品回答这个问题，虽然还是实验性的，不可能圆满，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写爱情小说，大团圆固然好，但悲剧结局更能使读者一掬同情之泪，叶灵凤深谙此道，因此这三部长篇无一不是凄婉哀艳的悲剧。故事全都发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时代姑娘》写的是香港巨绅之女秦丽丽与知识青年韩剑修自由恋爱遭到父亲干涉破坏，远走上海荒废学业，自暴自弃，与纨绔子弟调情，最后因韩剑修专情自杀才幡然悔悟。《未完的忏悔录》描写红得发紫的“歌舞皇后”陈艳珠追求与富家子弟韩斐君的真挚爱情，几经曲折，终因无力挣脱旧生活而导致情人沉沦“失踪”。《永久的女性》则写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秦枫谷以纯情少女朱娴为模特儿创作了“永久的女性”画像，轰动上海，却在世俗的压力下被迫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三部小说对旧妇女观、等第观和婚姻制度或多或少有所批判，也寄托着作者对不幸的男女主人公的同情。当然，书中更不乏都市男女的情场角逐，以及复杂多变的两性心理的刻划展示，这既跳出了作者自己先前一度陷入其中的“革命加恋爱”的窠臼，与当时的“主流”文学有点格格不入，同时与流行的旧派言情小说也迥异其趣，带有较浓厚的现代都市色彩，确实使人感到新鲜和别致。

这三部爱情长篇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叶灵凤过去以浪漫抒情小说见长，此时又与施蛰存、穆时英等一起热衷于新感觉派小说的试验，写过为人称道的《紫丁香》、《忧郁解剖学》等短篇，但他懂得为报刊写连载长篇必须另换一副笔墨，否则一定会将读者吓跑，正如他自己在《〈未完的忏悔录〉前记》中所说的：“我下笔时是力求通俗，避免一些所谓‘文艺的’描写的。”不过叶灵凤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艺术上的探求，除了每日一段，标题新颖，笔墨灵巧，内容相对完整，悬念连接不断之外，从整体上考察，作者在这三部长篇中采取了一种“立体的综合的”表现手法，即“一切小说的形式：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客观的描写，主观的叙述，日记，书信，对话，都先后在小说中被应用着”（引自叶灵凤《纪德的〈腰币犯〉》），从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新形式，对读者更富吸引力。《时代姑娘》不断调换摄影生活的角度，在第三人称的写法中加入女主人公第一人称的“日记”独白，又多次穿插当时报上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以凸现情节的重大转折；《未完的忏悔录》更是出人意外地让第一人称的作者与男女主人公一同登场，通过作者与男女主人公的交替对话来展开故事，呈示男女主人公的思想、个性和情感变迁；《永久的女性》则精心营造了浪漫神秘的氛围，三角纠葛的推进又是跌宕起伏，直至卷终方始真正水落石出，在在表明叶灵凤的写法变化多端，引人入胜。叶灵凤在这三部长篇中不同程度地掺和融合了传统章回小说、浪漫抒情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的多种表现手法，使之丰富多采，灵活轻倩，大大拓展了通俗小说的创作领域。

尽管这三部长篇爱情小说在当时赢得了广大读者，但也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指责作者“堕落”，有人惋惜作者浪费才华，还有人把作者贬为“新鸳鸯蝴蝶派”，以至叶灵凤不得不在《〈永久的女性〉题记》中公开表示：“我自己从来不喜欢自己所写下的这类小说。”其后他果然不再提及，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小说差不多被人遗忘了。今天我们返观 30 年代的通俗文学史，

叶灵凤无疑是新文学家中尝试通俗小说创作值得肯定的先行者。这三部风格独特的作品，也无疑在本世纪中国通俗爱情小说佳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

（原载 1993 年 12 月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初版《永久的女性》）

《周越然书话》编者序

对周越然其人，就笔者所见到的记载而言，陈玉堂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1993年5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初版）最为详细，先抄录如下：

周越然（1885—约1946），浙江吴兴人。字之彦，笔名走火（见《晶报》），室名言言斋（藏书室。藏书以说部及词话为多，“说”和“词”均属言部，故榜名言言斋）。南社社友。早年任职商务印书馆编审室，所编《英语模范读本》，为各校所采用，销数广大，所得版税极多。藏书极富，有宋元明版，中外秘籍，所藏《金瓶梅》，竟多至数十种。1932年“一·二八”之役，曾被焚古书近两百箱，西书十几大橱。之后数年，又复坐拥书城。以藏书家见称于时。著有《书书书》、《生命与书籍》、《书与观念》、《文学片面观》、《英美文学要略》，以及各类学习英语等教科、参考书籍。散著见《学灯》、《太白》及上海沦陷时的《风雨谈》、《天地》、《文友》等。

但是，这段介绍与史实是有一些出入的，为免以讹传讹，应略作考辨：

首先是周越然的卒年。据他的“忘年的小友”周劭先生相告，50年代初还在上海见到周越然，那么，周越然去世当在此之后。

其次是周越然的经历。据本人的回忆，周越然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秀才，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前，还曾在江苏高等学堂、安徽高等学校和上海中国公学等校执教。他未进过圣约翰，更未放过洋，却以自学而精通英文，得到过辜鸿铭的赏识，极为难得。但在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他曾出席日伪拼凑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无法与同时隐居沪上、辍笔以明志的文化人，如大藏书家郑振铎等相比。当然，人归人，文归文，这个道理读者应该明白，不必多说。

再次是周越然的著作。《生命与书籍》、《书与观念》、《文学片面观》和《英美文学要略》四种，他本人在《编译之味》一文里列为“所编所译之书”，后一种还是与邝耀西合编的，严格来讲，不能算是著作。周越然的著作，人们较为熟知的是下列三种：

《书书书》，1944年5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

《六十回忆》，1944年12月上海太平书局初版。

《版本与书籍》，1945年8月上海知行出版社初版。

但是，正如姜德明先生所说的，“《书书书》和《版本与书籍》都各印1000册，尤其《版本与书籍》出版之际，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环境突变，读书界的心理已经厌恶了敌伪时期问世的出版物，因此流传不广，市面上极少见。”（见《余时书话·言言斋谈书》，1992年9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初版）笔者所藏的《书书书》和《六十回忆》是原版，《版本与书籍》就只是香港“神州图书中心”60年代的影印本了。

周越然在30年代还出版过一本小书，至今鲜为人知，笔者也是从香港藏书家黄俊东先生的《书话集》（1973年9月香港波文书局初版）中才知晓的，那就是天马书店版的《性知性识》。黄氏在书话《性知性识》一文中称此书“是一本用俏皮的笔调来写性故事的妙书”，作者在书中“娓娓而谈，篇章很短，但都涉及一般性的知识和有关名词的来源、历史，在文章中，他很少为某种性事做说明，却是借了文学中或医书中的故事描写而谈起一些常识和

见闻来，由于三言两语，精警有趣，故颇能收寓教育于消遣的文字中之效”。记得三四年前，上海文庙旧书集市上曾出现过这本《性知性识》，可惜笔者晚了一步，为他人所捷足先登。在讨论性和性学不再谈虎色变、在高罗佩的《秘戏图考》和《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文版也已问世的今天，周越然的《性知性识》似有必要提及，在本世纪中国性学史上给它一个恰当的位置。

周越然爱书如命，一辈子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进商务工作之后，由于所编写的《模范英语读本》独占全国中学教科书市场达25年之久，版税极为丰厚，以至有足够的财力逛书肆，跑冷摊，“时时购书，日日购书”，千方百计搜求珍本秘辛，很快就成为海上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他本来就有较好的国学根柢，在古籍中浸淫日久，专心致志于“研究版本，研究藏印，研究题识，研究文章”，也终于成为一位版本目录学家。这不是笔者过誉，有《书书书》和《版本与书籍》两书为证。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这两部书，这位“言言斋”主人近现代藏书家的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周退密先生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1993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就将其列为一大家。

周越然所藏，固不乏宋刊元槧，以词曲小说为主的众多明清精刻精印本和手稿手钞本更是其一大特色，他甚至能不囿于旧时藏家的偏见，把宣统年间刻本也目为“善本”，可见其识见不凡。他藏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大量罕见西文书，尤以18、19世纪西方汉学著作和性学著作为最。中国历代藏书名家无不以度藏本国线装古版书为己任，而中西并蓄，锐意穷搜西文古旧善本，即便不自周越然始，他也是极少数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依笔者有限的见闻，大概也只有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的宋春舫“褐木庐”藏西文书可以与之比肩，其在中国藏书史上的意义是自不待言的。

诚然，按过去的标准，周越然藏书中有相当部分“格调不高”，他自己也说过他的书“闲书”过多，“正书”过少。说穿了，无非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收藏中外“性”书，其中单是《金瓶梅》的中外版本，就有十多种。周劭先生也有“我在今陕西北路的周越然家里阅览过他这类藏书，真是叹为观止”的回忆（见《黄昏小品·雪夜闭门谈禁书》，1995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荷兰汉学家高罗佩40年代编著《秘戏图考》时，曾得到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书家的帮助，笔者怀疑此人就是周越然。周越然丰富的“性学”藏书，许多都是人弃我取的孤本珍本，哪怕是色情、淫秽的，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民俗史、婚姻史、性学史、医学史、文学史、语言史等等，也仍然是一种重要史料。与周越然齐名，有“北马南周”之称的另一位著名的“性学”藏书家马廉（隅卿）逝世以后，其“平妖堂”珍藏已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不知周越然历劫幸存的“言言斋”性学藏书后来归属何处，如果星散或遭毁，那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

周退密先生在《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咏周越然七绝中有“文字飘零谁为拾”句，这本《周越然书话》的编选，就是希望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周越然的第一本书话集《书书书》全部收入本编。第二本书话集《版本与书籍》除首篇《古书的研究》之外，也全部收入。《古书的研究》因系《书书书》中《版本》和《古书一叶》两文合并删节而成，故不再重出。散文集《六十回忆》中，则选出关于书的《言言斋》、《购买西书的回忆》等七篇收入本编。“集外”部分有《书谈》等七题九篇，其中谈马建忠、严复、苏曼殊、林庚白诸篇，虽是怀人忆事，因与书密切相关，又有史料价值，也一并收入。周越然谈书的集外文当然远不止这些，限于篇幅，另有《螟巢日记》等文只

能割爱了。

周越然的书话，无论说书林掌故，还是探版本源流，无论叙购书趣闻，还是辨古书真伪，均举证周详，论列精细，实实在在无虚言。文笔之半文半白，亦庄亦谐，也是其风致独具，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有论者称“周越然的书话，在中国古今同类散文小品中显示出承前启后的独特个性”（见陈青生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沦陷篇》，199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可谓的评。相信今天的爱书人能从这本书话集中学到许多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有用知识。至于他文章中有些上海方言，如一再出现的“鼠牛比”一词，即普通话“吹牛皮”之意，请读者注意及之。

1997年2月

补 记

这篇《编者序》在《博览群书》1997年5月号先行刊出后，承浙江嘉兴市秀州书局主持人范笑我先生告知，周越然50年代曾在上海水产学校教授语文，1962年去世。

1997年7月28日《浙江日报》副刊又发表了周越然之孙周炳桐先生写的《对〈言言斋书谈〉的几点补正》，文中说：

关于我祖父的藏书问题。祖父早期的藏书正如文中所说，差不多全部毁于“一·二八”战火。但文中结尾时所说：“剩余的藏书也给子女散售殆尽了”，这是不符事实的。

“一·二八”事变后，祖父将家迁到上海租界内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由于他爱书如命，当然又继续买书，藏书又渐渐多起来，其中有不少是中外文珍本。上海解放后，1957年，祖父已年逾古稀，主动将他所珍藏的中文古籍珍本数百种通过当时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另外还有一卡车（不知有多少本）外文书捐赠给复旦大学。

至于其他一般藏书，一直保存在陕西北路寓中，直到祖父去世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家的人都十分担心这些“四旧”书继续留在家中会增添麻烦，嘱我全部上交当地派出所，而派出所指令我立即送往废品收购站。这就是祖父自己也料想不到的第四次“亡书”。

这样，一代藏书大家周越然的卒年及其“言言斋”藏书的下落都已有了明确的答案。

1997年9月10日

《刘半农书话》编者序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巨人大家辈出，刘半农（1891—1934）即为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作为《新青年》的同人，他的名字是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新文化运动勃兴时撰文“骂”倒“王敬轩”，他是初期白话诗歌创作的播种者，他首创中文新式标点和“她”、“它”两字，他又是现代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他在杂文写作、倡导民俗学研究、译介外国文学和推广摄影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开创性的。这一切，都早已载入 20 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史册。

同时，刘半农又是一位具有开放意识的读书人，喜好藏书，是北京琉璃厂的常客。又不为陈见所囿，人弃我取爱收冷僻的孤本零册，他发现并标点出版《何典》，他搜集并精印《初期白话诗稿》，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为人熟知的佳话。但是，除了《半农杂文》一、二集所收录的部分序跋外，刘半农许许多多关于中外书刊的长文短章至今未曾结集，未免可惜。于是，“近人书话丛书”收入这部拾遗补阙性质的《刘半农书话》，也就顺理成章了。

本书分为五辑，第一辑收入刘半农为创作的新诗集、杂文集和众多语言学著作所作的序跋；

第二辑收入刘半农为标点、校勘的古典小说和诗集，编纂、整理的字典、敦煌学和民俗学资料集等所作的序跋；

第三辑收入刘半农为友人、学生和外国学者的各类编著所作的序跋；

第四辑收入刘半农为翻译和校订的外国文学及民间故事所作的序跋；

第五辑收入刘半农的读书札记和藏书题识。

不算个别过于专门的，如《越谚序录》和《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等文，刘半农的书话类文字已大体在矣。刘半农对中外文化的许多精辟而有趣的见解，刘半农丰富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知识，刘半农对民间文艺的特别关注，在书中都有生动的体现。近年来，刘半农已少为人所提及，这或许与他曾是五四时期的“激进派”有关。其实，忽视或低估刘半农对 20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都是皮相之见。在读了这本书话集后，人们对刘半农的认识该会更全面，对刘半农学术造诣的评定也该会更充分吧？

是为编者序。

1997 年 3 月 10 日于上海

《〈申报·自由谈〉杂文选》编后记

1982年夏天，我和王锡荣兄参加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在山东烟台举办的鲁迅研究讲习班，见到唐弢先生。在闲谈中，唐弢先生提到方行先生建议他主编一本《自由谈》作品选，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参加。《申报·自由谈》是30年代影响最大的文艺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虽然当时《自由谈》影印本已经问世，但一般读者仍较难见到，编选一本供一般读者阅读的《自由谈》作品选无疑很有意义，再说，这也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好机会，因此，尽管我们水平不高，还是不自量力地答应了。

回上海后不久，在唐弢先生具体指导下，在方行先生、丁景唐先生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全力支持下，我们着手进行工作。原先打算编选《自由谈》自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接编起，至1935年10月31日停刊止所发表的杂文和散文，后来考虑到这样做篇幅未免过大，而革新后的《自由谈》数杂文成就最高，当时也最受欢迎，经过以鲁迅为首的一批进步作家的倡导和前引，《自由谈》在推动中国现代杂文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极为重大，于是，征得唐弢先生的同意，我们最后决定编选《自由谈杂文选》。但我们本职工作都很忙，加上京沪两地书信往返颇费时日和技术上的一些原因，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历时三年，几经反复，方始完成。值此付梓之际，照例有几个问题要略作说明：

本书所收杂文，除了重视公认的名家名篇，也努力挖掘一些思想和艺术水平较高又不大为人知晓的佳作，鉴于《自由谈》本身就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刊物，对政治态度不同、艺术风格各异的作家及作品，也给予适当的注意。不过，内容过于隐晦曲折的，不选。

鲁迅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也是《自由谈》的擎旗人，他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就尖锐的战斗性、卓越的见识和纯熟的写作技巧而言，几乎每篇都可入选，然而限于篇幅，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只能割爱，好在《鲁迅全集》并不难找，读者想能谅解。

由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自由谈》上的杂文多半是署笔名发表的，鲁迅一人就变换了 40 多个笔名。因此，我们又对入选作品的笔名作了一番考证，凡已经查实真名者，均在笔名之后注明。至于瞿秋白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都经鲁迅之手且署鲁迅笔名，书中入选的几篇就直接注明系瞿秋白之作。

作为如鲁迅所说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自由谈》上的杂文大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但不少用的是“曲笔”，深沉含蓄，现在的读者恐不容易理解，为此，我们还对少数入选作品加了一些必要的简注，供读者参考。本书所收的文章，都曾与原件核校，除更正极明显的笔误外，其余均以符号标明：〔 〕表示误字；【 】表示衍字；[]表示脱文，以存原貌。

此外，入选作品的发表日期则在文末注明。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入选作品在数量上以 1933 年至 1934 年上半年发表的为主，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杂文最犀利泼辣，最能代表《自由谈》的风格和特色。后期《自由谈》主要发表文艺短论，我们只能选入二三篇，聊备一格。

我们不敢说书中所选的作品已荟萃了《自由谈》杂文的精华，遗珠之憾肯定难免，我们只希望读者通过本书能对《自由谈》杂文的成就有个大概的

了解，如果读者因此引起对中国现代杂文更大的兴趣和爱好，我们也就心意足了。

今年是鲁迅逝世 50 周年，我们谨以本书献于鲁迅先生灵前，作为对这位《自由谈》伟大作者的一个纪念。

《自由谈》作者廖沫沙先生热情为本书题签，谨此志谢。最后，还应向上海文艺出版社致谢，不是他们热心，本书是难以与读者见面的。

1986 年 4 月于上海
(原载 1987 年 3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
《<申报·自由谈>杂文选》)

学者散文的魅力

——“名家散文精品丛书”序

何谓学者散文？30年前，台湾著名散文家余光中先生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作过切中肯綮的界定：

学者的散文，……包括抒情小品、幽默小品、游记、传记、序文、书评、论文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文化背景深厚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美且敬。

这种散文，功力深厚，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无法作伪。

现代白话散文一般认为发轫于1918年《新青年》杂志所创设的“随感录”，此后的发展进程千回百转，难以尽言，或可用“品种繁多，流派迭起，名家辈出”这12个字略作概括，诸如鲁迅的冷峻、周作人的冲淡、冰心的隽秀、朱自清的清幽……无不各呈异趣，各放异彩。但作为现代散文重要分支的学者散文直到40年代才踏入成熟完美之境，嬉笑冷嘲皆成文章的钱钟书，委婉多讽而又明丽醇厚的梁实秋，以及寓幽默于雍容之中的林语堂和风趣中蕴含古典情调的王了一（王力），皆为其中的佼佼者。这并不是说在他们之前没有学者散文，英年早逝的梁遇春就是学者散文的高手，鲁迅、周作人、徐志摩等大手笔的部分作品无疑也是学者散文中的杰作佳构。但若从整体考察，学者散文到了40年代才开始兴盛，才出现更为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散文重镇，并一度与剑拔弩张的主流散文分庭抗礼，却是不争的事实。而80年代以降活跃于散文文坛的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黄裳等位，其实正是不同程度上承继了中断多时的学者散文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

学者散文既可叙事，也可抒情，当然更可议论。它与一般散文最大的不同，在于感性之外，多了一点知性。学者散文的文字，不单有情趣、文趣，更有理趣与“知”趣。这里的“知”趣，是知识广博之趣，是洞察人生、社会与自然之趣。所以，学者散文应该是个性的，开放的，多层次的和富于原创性的。散文作品即使不是出自专家学者之手，但造诣相当且特色大致相同者，理应归入学者散文之列；反之，有些写散文的虽为学者，但情感虚假，文字平板，“知”趣索然，同样不能滥竽充数。

学者散文都有一种博大宽容的怀抱，对中国人、中国历史和文化、全人类的精神和物质文明，都有自己的关注和思考，都表现出一种真切的终极关怀。作者未必会长篇大论来宣示这种怀抱，却往往将自己的反思和省察融入情景交汇的随笔小品中，以此扩人眼界，启人心智。

学者散文也都有一种优雅的风致，娓娓道来，不着痕迹。读去像随意闲聊，漫无边际，咀嚼起来却别有情味，正如日本厨川白村所揭示的那样，“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

学者散文又都有敏锐的机锋，观人述事，写景抒情，状物析理，都别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新颖角度，新的意念，新的感觉。这种睿智来源于作者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丰富扎实的人文知识积累，来源于作者对人生世事的深刻观察和独到见解。

学者散文还都有鲜明的风格，每位学者都将自己的人格与学问熔铸在文章中，浑成自然地融合成晶莹的珠玉，读者读其文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汪洋恣肆的，有泼辣佻达的，有温文儒雅的，也有隽逸清丽的，文思如此，文笔同样也是如此。

学者散文再都有高超的文字表达能力，在精巧的结构，严密的文理之外，更将文字舞弄得千姿百态，千娇百媚，生龙活虎，清明剔透。文白揉合，中外混和，雅俗相间，妙语警句层出不穷，是学者散文的特别吸引人之处。

归根结底，以博识才情为基础的学者散文同样必须真诚，准确的说，更应比一般散文具备真诚的品格。作为与作者生命中的感觉、理智、学养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处于同构状态的学者散文，是完全不能容忍作伪的，无论技巧层面还是精神内涵，均无例外。只有这样，学者散文才能臻于真正的真、善、美的境界。

如果以此为标准来估量伊荪选编的这套散文名家系列丛书，就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尽管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这些熠熠生光的名字读者已不陌生，但伊荪是从学者散文或准学者散文的新视角来遴选这些名家的“精品”的，每集栏目的设置、选文的取舍都相应地颇具匠心，这就凸现出选家与众不同的眼光，很有创意，在当前的“散文小品热”中独树一帜。因此我乐于为之作序推荐，相信广大散文爱好者不会错过这样的好选本。

（原载 1994 年 4 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初版
《梁实秋散文精品》）

《捞针集》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话集。书名“捞针”，不是故弄玄虚，取“大海捞针”之意而已。书海像大海一样浩瀚，我爱书，生活中不可一日无书，书海徜徉，每有发见和心得，辄喜不自胜。有时也兴之所至，化为文字，与海内外同好交流。现在承李庆西、吴俊两兄的美意，结集编入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今人书话文丛”出版，算是对自己以往书话写作的一个小结，一次再出发。

我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我的专长吧，我又有考据癖，因此，这本《捞针集》以谈论现代文学和台港文学书刊以及相关的人和事为主。现代作家的一篇佚文、一首遗诗、一则逸事，现代文学史上一本鲜为人知的著作、一段湮没不彰的史实，往往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至于文章是否具有独特见解，文笔是否工拙，倒在其次了。当然，所专者不一定就是所好者。我访书求知的范围其实更广更杂，诸如外国文学、古典音乐、藏书票艺术，甚至中外性学等等，各类书刊我都注意收藏；各家学说，我也略有涉猎。但才有所限，力有不逮，很少形诸笔墨，偶一为之，还不知是否贻笑方家，现也收入本书，一并接受读者的检验。

现代书话的写作，据热情为本书作序的姜德明先生的考证，30年代初已经出现。到阿英、叶灵凤、唐弢、黄裳、孙犁诸家就蔚为大观，知堂老人那些引录恰切、短小隽永的序跋题记更是其中的精品。唐弢所谓“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的论断，已被海内外书话研究者多次引用，也确实道出了现代书话写作的真谛。或者可以这样说，“书话”已成为现代散文的一种新文体，一种形式极为活泼多样的新文体，理应进一步发扬光大。而珠玉在前，我作为书话写作上的后来者，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这些年来，我与书的关系，读书藏书之外，是编的多，写的少。以至于有刊物在发表文坛前辈为我的论文集写的序文时，误注此书为我所编选；以至于有友人在赠书给我时，戏称我为“编家”；以至于还有友人撰文劝我多写披露独家发现的文章。我想，今后凡有学术和史料价值的书，我仍会尽力去编订，因为这是有意义的文化积累工作，为还本世纪文学和文化史的本来面目、繁荣下一世纪的学术计，应该继续有人做；同时也希望自己多写些，写好些，能有第二、第三本书话集与读者见面。毕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大理论家、也是大藏书家的W.本雅明说得好：在所有得书手法中，最令人钦佩的就是自己来写。

1997年2月18日于上海

眉批杂议

梁实秋的书评艺术

“梁实秋热”正方兴未艾，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接连推出《雅舍小品》合订本和《雅舍杂文》两书，就是一个明证。美中不足的是，《雅舍小品》虽号称版本正宗，却偏偏缺少了梁实秋1986年4月专为台湾正中书局初版《雅舍小品》合订本而写的《后记》，此文追忆脍炙人口的四集“雅舍小品”写作经过，甚为重要。而今上海人民社版“有头无尾”，实在是不应有的疏漏。

梁实秋的散文确实写得好，智慧和谐趣在他的笔底闪烁，精致雅洁而又情味浓郁。但坊间五花八门的选本互相重复，大同小异。既然作者是大家手笔，为何不多介绍一些新鲜的佳作给读者呢？至少笔者是深感着不满足，也因此而留心寻觅。这里刊出的几篇书评序跋，就是笔者努力搜集的结果。它们从未编集，是梁实秋的后佚文，相信会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欣喜。

梁实秋其实也是一位出色的书评家，早在20年代末，他在《新月》“书报春秋”栏以陈淑、李敬远等笔名发表的众多书评，就已引起文坛注意。30年代以降，梁实秋先生主编《益世报》、《世界日报》和《北平晨报》副刊，书评一直是其中一项重要而又精采的内容。他评论曾孟朴的《鲁男子》，老舍的《猫城记》和《骆驼祥子》等现代名著，发人所未发，切中肯綮。而序跋也者，不就是一种特殊的书评？到了晚年，梁实秋在台湾以硕果仅存的“新月派”大老的身份，众望所归，为文学后进作序撰评，更是无可推脱的经常之事。但他从不溢美，不作违心之论，无论对余光中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的品赏，对小民、喜乐合著的《故都乡情》的首肯，还是对杨小云四部爱情小说的推介，梁实秋都是娓娓道来，或引经据典，或条分缕析，从容不迫，很有分寸，他的艺术见解也就从中自然流露，不由你不信服，这或许就是梁实秋这些书评序跋的魅力之所在。

（原载1994年2月5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一个真实的梁实秋

前年10月，我应邀到台北参加“林语堂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由台湾书话家、藏书票鉴赏家吴兴文兄带领，到闻名已久的九歌文学书屋访书，与九歌出版社发行人蔡文甫先生在装饰简洁典雅、充满书香的九歌文学书屋里边喝咖啡边畅谈文学，不知不觉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

九歌出版社是台湾三大纯文学出版社之一，与叶步荣先生主持的洪范书店和隐地先生主持的尔雅出版社形成鼎足之势，在海内外华文文学界久享盛誉。主持人蔡文甫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著有长短篇小说集《雨夜的月亮》、《解冻的时候》等十多部，文笔细腻，以刻画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情感困惑见长，曾获台湾文协文艺奖和韩国文学奖。

就在那个令人难忘的下午，我被告知九歌出版社将出版余光中、痖弦、陈秀英三位先生合编的《雅舍尺牘》。蔡文甫先生了解到我也从事梁实秋研究，编写过《梁实秋著译年表》，希望我在大陆再广为搜集梁实秋书札，以使书更为充实完备。蔡先生推重梁实秋的人品文品，一直热心出版梁实秋的著译，梁实秋晚年的《白猫王子及其他》、《雅舍谈吃》、《雅舍散文》一、二集等书都是在九歌问世的，而今再编印《雅舍尺牘》，



《雅舍尺牘》所收梁实秋致林海音的信

无疑又是一项具有文化积累意义的重要工作，理应支持。返沪之后，我就向蔡先生提供了我所掌握的梁实秋早年致孙伏园、刘英士和晚年致方仁念等位的书札，总算为《雅舍尺牘》的出版尽了一点微力。

去年6月，一本装帧精美、编排颇具匠心的《雅舍尺牘——梁实秋书札真迹》飞到我手上，我一口气读完，爱不释手。此书搜集了梁实秋散布于海内外各界尺牘共25家78通，其中英文函9通，除英文函系打印件外，其余各封均手迹与铅排并列，两相对照，既可欣赏作者书札文采，又可观摩作者书法艺术，使读者于温煦亲切之中更增研读的兴趣。书前有余光中先生的代序《尺牘虽短寸心长》，书末有痖弦先生的《编后记》，对梁实秋书札的文献及历史意义颇多精采的发挥。

作家书札，也可视作他的另一种文学作品，而且，有时候，书札比正式的文学制作更能显示出作家的人格精神，因为文学作品往往是设计下的产物，具有比较严谨的美学考虑，不像给人写信，原不准备发表，往往直抒胸臆，直陈其事，不设防，不加隐藏，也无需雕饰。这种传递方式，最为坦率，也最见性情。读梁实秋书札，就可再次证实这一点。这些书札或长或短，侃侃而谈，文白不拘，中英并用，时见“雅舍小品”余韵，从中多少可以窥见他早年在大陆、中年客居美国、晚年在台湾的生活状况、文坛交游和内心世界。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完整的梁实秋，在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辞典家的身份之外，点点滴滴，透过这些书札在读者面前轮廓成形，尽管那形象只止于侧影或背影，但不是更真实，更可亲近吗？

就我所知，梁实秋书札，先已出版过《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台北正中书局版），梁实秋女儿梁文蔷博士所著《长相思》（台

北时报出版公司版）中也收录了相当一批家书，但前者曾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争议，后者可惜只是摘录，因此，这本《雅舍尺牘》对研究梁实秋其人其文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现从中选出 13 通交《美文》刊布，供“雅舍小品”爱好者欣赏。

（原载 1996 年 8 月西安《美文》第 48 期）

开现代学者散文先河的叶公超

14年前，台湾洪范书店推出秦贤次编、经作者本人审定并题写书名的《叶公超散文集》，叶公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终于重现世人眼前。其实，在30年代“新月”诸子中，叶公超名士才情，文采风流，与梁实秋堪称“双璧”，不但在文艺批评领域是如此，在散文创作领域同样也是如此。叶公超精通18、19世纪西方文学，对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一往情深，伍尔芙的意识流小说、艾略特的现代派诗歌和新批评理论以及瑞恰慈的读者反应理论，都是他首次引入国门的，可谓功莫大焉。这些，近年已陆续有人提及，但叶公超散文的杰出成就至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人们熟知的现代学者散文的重要代表梁遇春和钱钟书当年都是叶公超的高足，作为老师，叶公超曾在《小品文研究》中对精致化的散文（即学者散文）作过富有创见的界定，他自己的散文自然也是不同凡响，珠圆玉润。可惜他写得太少，《叶公超散文集》中收录的严格意义上的散文仅《小言两段：扑蝴蝶·吃饭的功用》、《志摩的风趣》、《深夜怀友》等寥寥数篇。现在，笔者新发现的《门》、《买书》和《徐宾远墨竹展序》三篇佚作可以稍稍弥补这个缺憾了。



《门》原载1933年4月2日《清华周刊》文艺专号，其时叶公超正任清华西洋语文学系教授，而由清华学生会编辑的《清华周刊》的文艺栏主任就是后来成为名小说家和名学者的吴祖襄（吴组缃）。《门》发表时有一篇署名“编者”的《编后》，相信出自吴组缃手笔，文中有“《门》是一篇警策的Familiar essay，叶先生是一位散文家，现任《新月》编辑，作品皆有西洋散文的风格与气息，曾有《捉蝴蝶》一篇，最为人所乐道”等语，台湾版《叶公超散文集》封面这个品评是比较恰切的。叶公超认为“人类的好奇心和追求心都是因门的阻碍而产生的”，与其学生钱钟书在《窗》中所说的“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有异曲同工之妙，若把两文对照赏读，必定会倍增趣味。

原载1936年11月26日北京《世界日报·明珠》第57期的《买书》则是作者的夫子之道。大凡文学家，没有不爱书的，叶公超无疑也是个十足的书迷。叶公超藏书之丰富，读书之广博，见解之精辟，只要去翻一翻他在《新月》上的那些精采的书评就可见一斑，而这篇旁征博引、妙语连珠的《买书》则是另一个角度的明证。虽说叶公超也不免感慨书满为患，但他仍坚信“书是有生命的东西，有脉搏有感觉的朋友”，非对书籍有特殊感情者是写不出《买书》的。

最后一篇《徐宾远墨竹展序》是叶公超晚年的绝笔，是他“对文艺的兴趣永远没有退休”的一个小注脚。此文虽写于1981年8月，但同年12月2日台北《中央日报·中央副刊》刊出时，他已逝世两周，不及亲见了。

（原载 1993 年 10 月 2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关于叶公超两题

近日先后读到《书人茶话》上龚明德兄和舒芜先生两文，都直接或间接与 30 年代“新月派”文艺理论家叶公超有关。恰巧，我正在编选《叶公超批评选》，于是写下这两节文字，作为对这两篇文章的一点补充。

一

龚明德兄在《叶公超记忆不确？》中，根据叶公超发表在 1937 年 1 月 25 日《北平晨报·文艺》上的《鲁迅》一文内容，认为叶公超晚年《病中所忆》最后一节《评论鲁迅》中所忆及的“在这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到胡适之、徐志摩的散文都不如鲁迅的。我说鲁迅虽然没有人格，但是散文却最好”这段话为误记。龚兄恐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实，鲁迅逝世后，叶公超接连写了两篇文章。除了这篇《鲁迅》之外，他还有一篇先写的《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发表于 1936 年 11 月 1 日天津《益世报》。这篇仅 1600 余字的文章的重要性不亚于《鲁迅》。叶公超在文中认为，应该“看到一个战士鲁迅以外的鲁迅”，“哀悼非战士的鲁迅，是‘非’，不是‘反’”，“战士的鲁迅不论，而鲁迅仍有可纪念的”。这“可纪念的”，在叶公超看来，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鲁迅“在小说史方面的工作是应该有专家来纪念他的”；二、“我想大家都会想到的便是鲁迅的小说”；三、“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正是在这第三个方面，叶公超指出：“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如果拿这段话与他晚年《病中所忆》里的那段话对照，不难发现，叶公超的回忆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虽然由于年代相隔较长，他把《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混为一谈了，虽然他在《非战士的鲁迅》中也没有直接说到胡适之和徐志摩的散文不如鲁迅，但“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不也可理解为包括了胡适之和徐志摩两位吗？因为这两位都被鲁迅“骂”过是当时文化界人所皆知的事实，熟悉鲁迅与“新月派”交恶史的叶公超不可能不知道，他又是这两位的好友，能这样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今年是鲁迅逝世 60 周年，重读叶公超这些从学理层面讨论鲁迅成就的旧文，我以为是不无益处的。

二

舒芜先生在《重读〈彼得·潘〉》中指出，杨静远、顾耕两位在新译《彼得·潘》的《译者前言》中说到梁实秋译《潘彼得》时，把此书出版时间定在 1940 年不确，此书的出版“大约还是 1934 年我进初中之前的事”。舒芜先生的回忆是对的。梁译《潘彼得》1929 年 10 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初版，1935 年 9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列为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二集之一种，近年又由台湾九歌出版社重印。

梁译书前有叶公超写的精采的序。叶公超在序中对《潘彼得》从剧本到小说，对巴利创作《潘彼得》的经过，对《潘彼得》的意义和价值均有生动

细致的描述。叶公超认为，“儿童是不知不觉的生活的艺术家”，“能敢于忘却这个现实的世界，能永久从顽耍中来表露一种永恒的快乐”，《潘彼得》正是要“表现宇宙间那种永在的儿童精神”。它之所以会受到欧美各国青少年读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以受社会多数永久的欢迎而论，就是莎翁的戏也未必能与之同日而语”，也就不难理解了。

叶公超自视甚高，不随便为人作序，除了这篇《潘彼得》序外，仅为伍光建译《诡姻缘》、梁遇春译《荡妇自传》、曹葆华译《科学与诗》和赵萝蕤译《荒原》等四五本书作过序。清一色为外国文学名著译本作序，译者不是译坛名家就是后起之秀，译本后来又大都有定评，叶公超下笔之严谨由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最后应补充一句，《潘彼得》当时还有一种节译本，题《彼得潘》，徐应昶重译，1931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仅81页，而今也难以寻觅了。

（原载 1996 年 8 月 31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凌叔华海外作品掇录琐记

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中，凌叔华是引人注目的一位。20年代到30年代，是凌叔华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1928年1月新月书店初版）、《女人》（1930年4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和《小哥儿俩》（1935年10月良友图书公司初版）。凌叔华的小说以写妇女和儿童生活为主，她擅长心理刻画，善于以清淡秀逸、细腻含蓄的笔致描绘大家闺秀和中产人家知识女性枯寂和忧郁的灵魂。鲁迅称赞她“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并把她的《绣枕》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徐志摩则认为她的小说有“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雅，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阿英也说凌叔华写了“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凌叔华的小说确实别具一格，可惜抗战爆发以后，她很少再发表作品。

抗战胜利前夕，凌叔华的丈夫陈西滢从美赴英，主持“中英文化协会”，不久又出任国民党政府首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凌叔华1947年前往伦敦与丈夫团聚，自此定居伦敦，迄今已整整40年了。在此期间，凌叔华完成了抗战期间在英国著名女作家吴尔芙鼓励下开始动笔的英文自传体散文集《古歌集》（又名《古韵》），于1953年由伦敦荷盖斯出版社出版，被英国文学界权威人士誉为当年的最佳作品，后又被译成法、德、俄多种文字，从而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凌叔华1956年起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执教四年，在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了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3月初版）和《凌叔华选集》（1960年5月初版）。作为一个杰出的国画家，凌叔华还先后在巴黎和牛津举行个人画展，轰动英法美术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她还两度回国观光，写下了《敦煌礼赞》等散文，表现了对伟大祖国的深切眷恋之情。近年来，凌叔华虽然年事已高，深居简出，仍偶有新作问世，还热情地为拙编《回忆郁达夫》（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撰写了言简情挚的《回忆郁达夫一些小事情》。

这两年来，凌叔华的作品开始受到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注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版了《花之寺》、《女人》和《小哥儿俩》的合集，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选集《花之寺》，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散文选集》。但是，凌叔华在海外发表的作品，除了《凌叔华散文选集》中收录了少数几篇外，由于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读到。为了反映凌叔华去国40年的工作和意见，也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凌叔华的创作，笔者经多方搜集，编选了“凌叔华海外作品小辑”。

收入小辑的这些作品都是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反映抗战生活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是凌叔华在海外发表的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20世纪的中国艺术》评介马来亚大学博物馆主任苏立文的同名英文著作，写得生动活泼，并对历史悠久的中国绘画艺术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爱山庐梦影〉自序》、《新加坡版〈凌叔华选集〉后记》和《台湾版〈凌叔华小说集〉序》三篇序跋虽然篇幅不长，但作者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阐述自己的创作主张，是研究凌叔华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

(原载 1987 年 10 月南京师范大学
《文教资料》第 173 期)

“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作为一位政治家，储安平在 1957 年的不幸遭遇现在已大白于天下，但他早年的文学生涯还鲜为人知。1928 年秋，储安平考入光华大学政治系。也许是自幼喜爱文学，也许是为当时正在光华执教的徐志摩的个人魅力所吸引，他在求学期间和毕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钟情文学，比他晚一届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穆时英在《光华文人志》中说“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他在《语丝》、《真美善》、《新月》和《文艺月刊》发表作品，接着又出版短篇小说集《说谎者》和随笔集《给弟弟们的信》，还先后主编《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和《文学时代》月刊，在当时文坛上十分活跃。直到 1936 年初负笈英伦之后，储安平才逐渐疏远文学，踏上了书生议政的不归路。

储安平被看作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14 年前，梁实秋与叶公超在台湾主编《新月散文选》（雕龙出版社），就选入储安平在《新月》上发表的《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等三篇作品，徐志摩和梁实秋这两位公认的“新月派”散文大家也各入选四篇，可见编者对储安平的散文颇为推重。《小病》（载 1930 年《真美善》6 卷 6 期）、《幸福》（载 1936 年开明书店初版《给弟弟们的信》）和《记田汉先生》（载 1935 年《中央日报·文学周刊》38 期）是新发现的储安平散文佚作，大致显示了储安平早期散文的个性特色，前两篇是抒情和说理的有机结合，后一篇则是幅生动的人物素描，从中可以窥见储安平当时的人生追求和审美情趣。梁实秋认为“‘新月’的散文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50 年前有一伙人所写的散文就是这个样子”（《新月散文选》序），储安平“这个样子”的散文在 60 多年后的今天不也仍然值得一读？

（原载 1994 年 6 月 4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爱书家的心声

叶灵凤的三大卷《读书随笔》（1988年1月北京三联书店初版）是我案头的必备书，这不仅因为书是编者柳苏先生所赠，是我喜欢的毛边本，也因为每次翻阅，总有一种新鲜感和亲切感。我从中知道了中外古今许许多多关于书的奇闻趣事，同时也不断发现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资料和新线索，书中常为人称道的清隽的文笔，优雅的风致，倒觉得反在其次了。

譬如第三集中有篇千余字的《纸鱼繁昌记》，说的是作者所珍爱的《纸鱼繁昌记》、《猎书家的假日》、《英国的禁书》、《书与斗争》、《藏书快语》、《藏书之道》、《书志学讲义》等日本欧美谈书的书如何在1938年广州陷落日寇之手时不幸散失，而《纸鱼繁昌记》后来终于失而复得的故事，颇有戏剧性。我注意到文中有“来到香港后，忘不掉这几册书，我曾将他们写在《忘忧草》里”这句话。根据《纸鱼繁昌记》内容推断，此文应作于抗战胜利之后，那么，《忘忧草》就应作于抗战期间。但翻遍三卷《读书随笔》，不见《忘忧草》的踪影，想必是叶灵凤的一篇佚文了，何处寻觅呢？

今年2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有幸在一位当年与叶灵凤也相识的香港老藏书家那里得见《忘忧草》真容，原来这是一本散文集，全书即以这篇《忘忧草》为书名，1940年11月香港西南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小32开本，正文共129页。以前人们只知道叶灵凤50年代以后在香港出版了《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晚晴杂记》等散文集，对这本《忘忧草》却一无所闻，它的发现填补了叶灵凤创作史上的一个空白，何况它还很可能是当时南下作家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其意义更不待言。

《忘忧草》无疑是这本散文集中最为感人的一篇，难怪作者要以这个富有诗意的题目作为书名。作者对那七种稀见的“谈论书物版本聚散变迁的关于书的书”的追忆介绍各自独立成章，远比后来的《纸鱼繁昌记》详尽真切，娓娓道来，多么引人入胜，而对它们在侵略战火中所遭受的厄运又是何等愤慨，大义凛然地谴责了人类文明的毁灭者。作为一篇精采的书话，《忘忧草》记载了叶灵凤难以忘怀的失书之痛，倾吐了一位“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对书的一片痴情，而今的爱书人读后除了大长见识，更可领悟到点什么吧？

（原载1993年12月4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说不完的张爱玲

二贺《皇冠》及其他

大名鼎鼎的台湾《皇冠》文学月刊创刊至今已有 40 年的历史了。台湾的文学刊物往往短命，《皇冠》可说是一个异数，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有论者称《皇冠》是纯文学刊物经营成功的一个范例，其实《皇冠》走的是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中间路线，所谓“雅俗共赏”是也，近年则更向通俗文学倾斜。《皇冠》主办者善于审时度势，既先后囊括了琼瑶、三毛、柏杨、黄春明、龙应台、席慕蓉、张晓风、廖辉英、施寄青、林清玄、张曼娟等一大批畅销书作家为其台柱，又不断革新内容以适应潮流，甚至推动潮流，再加编排活泼，装帧华美，从而深深吸引了广大青年和女性读者，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还出版了东南亚版和美国版。

不消说，张爱玲虽远在美国，以其文名自然也是《皇冠》罗致的主要对象。据笔者所见，自 1975 年 10 月在《皇冠》重刊“少作”《天才梦》开始，张爱玲几乎每年都为《皇冠》撰稿，诸如白话译本《海上花列传》、评论《甲戌本、庚辰本的年份——二评〈红楼梦〉》、短篇小说《色，戒》和《关于〈续集〉》等重要作品都是在《皇冠》掲載后才再出单行本或编辑的。对惜墨如金的张爱玲来说，这已是十分难得的了。

更有趣的是，张爱玲还是个十足的“《皇冠》迷”，每期《皇冠》必从头看到尾，可谓爱不释手，这是张爱玲自己在随笔《信》中所透露的。1984 年 1 月《皇冠》创刊 30 周年之际，刊物推出纪念专号，梁实秋等文坛大家纷纷撰文祝贺，张爱玲也写了这篇短小精悍的《信》凑个热闹。《信》发表后一直未引起注意，也从未收集，最近才为笔者发现。

今年《皇冠》“堂堂进入第四十年”，少不了又要请“名家说皇冠”。深居简出，几乎世人隔绝，同时却是《皇冠》忠实读者的张爱玲再度欣然命笔，写下了颇具幽默感的《笑纹》。此文刊登于《皇冠》（台湾版）3 月号，是张爱玲的最新作品，使人觉得这位誉满海内外文坛的 72 岁的女作家毕竟宝刀不老。

张爱玲二贺《皇冠》，委实不容易。张爱玲历来对写这类应景文章不感兴趣，她说过这就像给人写纪念册，很难下笔。在张爱玲以往的作品中，也只有 50 年代初上海《亦报》创刊周年纪念时写过一篇短小别致的《〈亦报〉的好文章》（顺便提一句，此文为迄今多种张爱玲文集所漏收），作为一份通俗小报，《亦报》的副刊恰恰也是“雅俗共赏”的。因此，她二贺《皇冠》，又如此情真意切，确实非同寻常。

张爱玲之所以对《皇冠》情有独钟，结下不解之缘，与她认为《皇冠》是“一个平易近人而又制作谨严的杂志”大有关系。张爱玲对通俗文学从不存有偏见，尽管她的作品早已登上纯文学的大雅之堂，其小说居然能做“镜子意象研究”，神话结构解读，乃至女性主义分析，挖掘出超前的现代小说素质，但她始终保持着对通俗文学的爱好。从 40 年代“喜欢张恨水”到 50 年代爱读《亦报》到 90 年代赞赏《皇冠》，虽然对象各各不同，其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张爱玲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这是她的众多创造中极有价值的一个创造，能成功的做到这一点的作家，从 30 年代至今又有几位？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如果深入研究下去，很可以做成一

篇博士论文的。当然，以张爱玲独特的艺术品味，她所首肯的只能是《皇冠》这样通俗文学中的精品。她预期“再过四十年，也还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皇冠》”，那么，笔者不禁要问，大陆何时才会有自己的“皇冠”呢？

（原载 1993 年 9 月 4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独特的“边缘性”魅力

三年前，当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来向我征询出版《张爱玲文集》的意见时，我大表赞同，以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成就，早就应该出版她的作品全集了。可是我没有想到书出版后竟如此走红，一版再版，甚至还出现了盗印本，尽管文集中未收《秧歌》和《赤地之恋》，留下了一个遗憾。近年来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以张爱玲为博士学位题目的更是大有人在，海内外许多电影导演也纷纷改编她的小说，已经拍成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已在角逐国际电影大奖，连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马悦然教授也不得不承认张爱玲是最有希望获奖的华文作家之一。看来，“张迷”已蔚然可观，“张热”正方兴未艾。

张爱玲的作品其实并不多，她不是一个以数量取胜的作家。小说集《传奇》之所以脍炙人口，当然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解析，但我以为至少有两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张爱玲对女性心理的深刻而精到的把握和对“战争”的真实而独特的生存体验。无论是《金锁记》还是《倾城之恋》，都充分体现了张爱玲与众不同的“边缘性”的话语方式，即不同于当时的“主流”作家和“主流”文学的独特的感受和表现世界的方式，独特的历史观、人生哲学和审美追求。尽管张爱玲曾被贬为海派通俗作家，但这位上海滩上卓立独行的才女，骨子里却渗透着浓厚的古典趣味，感受与表达上又具有深刻的“现代性”，她完全自觉与自由地出入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和“中”与“西”之间，并且达到了两者的平衡与沟通，许多现代和当代作家都无法达到乃至接近这一境界，因而也就十分难能可贵。我想，这恐怕就是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张爱玲中学时期的绘画《某同学之甜梦》

就我个人而言，我得承认更喜欢张爱玲的散文。一册《流言》，何其美妙精采，令人莞尔会心。透过文字的波俏华丽，我发现张爱玲散文的佳妙全在人情练达，所谓“人情练达皆文章”是也。此“练达”，不仅在形相景象之表面观察，更在深入物理世情，切中肯綮，因而她的散文能唯美而不流于感伤，浪漫而不忘世故，讽人亦以自嘲，充满张爱玲式的智慧和幽默，在现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在沉默多年之后，张爱玲终于在去年出版了她的新散文集《对照记——看老照相簿》，虽然只有薄薄的 125 页，却对照着她所保存的已经泛黄的老照片，从遥远悠长的童年一路写来，在看似零乱散漫的“乱纹”中可以清楚地触摸到作者的奇诡依旧，沧桑感依旧，难怪台湾文坛著名的一年一度的时报文学奖特别文学奖要授予张爱玲。我希望这本使人浮想联翩的《对照记》能在大陆重印，也期待张爱玲还有如她所说的更“值得一看的东西写出来”。

(原载 1995 年 3 月 15 日上海《青年报》)

一篇佚文

1987 年 1 月，笔者发现了张爱玲 1952 年离开上海去香港前以“梁京”的笔名在国内发表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小艾》，用张爱玲生前友好、香港著名作家林以亮的话说，《小艾》的重见天日，“一时造成台湾和香港的文学视听界另一次‘张爱玲震撼’，反应和回音到现在还袅袅不绝”。而在海峡这一边，《小艾》也已先后收入《小艾》（江苏文艺社）和《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社），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但是，奇怪的是，笔者发现《小艾》时一并挖掘出土的张爱玲的另一篇佚文，也是张爱玲在解放以后唯一用真名发表的文章《〈亦报〉的好文章》，却一直不为人所注意。迄今为止，所有的张爱玲的作品集，不论是台湾版、香港版还是大陆版，不论是全集、文集还是散文全编，均未收入此文。

《〈亦报〉的好文章》原载 1950 年 7 月 25 日上海《亦报》，是张爱玲为纪念《亦报》创刊一周年而作，虽是不到千字的应景文章，仍然保持了张爱玲散文的韵致，情真意切，耐人寻味。文中所说的“十山先生”即周作人，他那篇使张爱玲感到“真有一种入骨的悲哀”的文章指《妇女会的工作》，已经编入拙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只是张爱玲“祝它健康”的《亦报》不到三岁就告夭折，所幸其大部分工作人员后来并入《新民晚报》，但那时张爱玲已告别故国，不得而知了。张爱玲在洛杉矶悄然谢世，现在把这篇张爱玲佚文交晚报“文学角”重刊作为纪念，窃以为是很合适的。

(原载 1995 年 9 月 25 日上海《新民晚报》)

对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独到见解

最近十年来，张爱玲的作品在海峡两岸三地竞相出版，不胫而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台湾皇冠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张爱玲全集》（又有香港版，迄今已出 16 种）和大陆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文集》（四卷本，又增补卷一册），两者都经张爱玲本人亲自授权，可惜后者印刷颇多错讹，以至张爱玲生前见了样书之后大为不满。

当然，不管是《张爱玲全集》还是《张爱玲文集》，其实都大大不“全”，有《全集》已收而《文集》不便收的，如颇有争议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也有《文集》已收而《全集》反而失收的，如张爱玲早期散文《论卡通画之前途》、《牧羊者素描》和《心愿》等，更有《全集》和《文集》都未能收入的，这篇《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即是。此文原载 1978 年 3 月 15 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是篇不折不扣的张爱玲佚文。

张爱玲在 70 年代仍处于写作的旺盛期，为人称道的《红楼梦魇》和《海上花列传》国语版先后在此期间完成，还偶有新作在台湾影响广泛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副刊发表，给“张迷”带来新的惊喜。这些新作绝大部分已分别编入《全集》和《文集》，如已编入《全集》第 13 卷《续集》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就先刊于 1978 年 11 月 27 日《中国时报·人间》。奇怪的是，显然更为重要的《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却成了漏

网之鱼，是张爱玲自己后来忘记了或不满意不想收进集子，还是研究者未曾发现，抑或还有别的原因，现在已无从查考。无论如何，此文终于从茫茫报海中打捞出来，对正在纪念张爱玲的海内外广大“张迷”和“张学”界来说，毕竟是件幸事。

记得我们在 60 年代册封过几位当代语言大师，然而就文学语言的独创性、丰富性和深刻性而言，张爱玲才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张爱玲一直关心现代中文包括标点符号的规范化，对各地方言有浓厚的兴趣，对中英文互译也有精到的研究，这篇洋洋洒洒，长达 5000 多字的《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正显示了张爱玲在语言学和翻译学方面的真知灼见，同时还巧妙地引伸到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揶揄，虽然发表于 17 年之前，现在读来仍然令人耳目一新，兴味盎然。

（原载 1995 年 11 月 4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周黎庵的回忆

“出名要趁早呀！”张爱玲登上文坛虽然一帆风顺，不到 25 岁就已走红 40 年代的十里洋场，但当时赏识她的才华的几位资深编辑也不能不提，那就是主持《紫罗兰》的周瘦鹃、主持《万象》的柯灵和主持《古今》的周黎庵。前两位早已为人熟知，周黎庵对海内外“张迷”来说恐怕还比较陌生。其实早在 1943 年 11 月和 12 月，张爱玲就在周黎庵主编的《古今》34 期和 36 期上接连发表《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和《更衣记》两篇散文佳作。值得注意的是，周黎庵当时还写过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载 1943 年 12 月《古今》37 期），文章在介绍了李鸿章之曾外孙张子闲之后笔锋一转，谈到张爱玲的家世和与张爱玲见面的情形，颇具史料价值，现逐录如下：

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揄扬甚为，尝见平君之文于报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晚清政局粤人而张姓者，舍张樵野侍郎荫桓无他人，即《孽海花》中庄小燕（焕英）。侍郎为清季外交界中特出之人物，出身佐贰，敷历八座，虽严谴新疆，卒致祸戮，然其人才学，实出侪辈，盖绍通中西文化，侍郎之力居多。张女士返自天南，又夙攻西学，遂信侍郎继起有人，不知南辕北辙，相去竟不可以道里计也。

既而某小姐介张女士来谒，贻《古今》以数文，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 Romance 云。余大疑，南海侍郎于《孽海花》中初无恋爱事迹可稽，有之，其唯丰润。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即恍然，盖与子闲为同辈孙而异祖母之所出也。

女士求学于香港大学，战后方来沪，其母则与父仳离，近方浪迹南洋，不通音讯，女士与姑居于沪，仅恃鬻文自存云。

女士又言，其姑盖即丰润仅存之女，颇悉丰润合肥两家故事，思与能知天宝故事者一谈，亟盼余过其所居。而余尘事鞅掌，竟未一践夙诺，颇为怅事。何日得有清暇，与河间善化诸君同诣，一谈同光清流马尾债衅故事，岂不人生之一大快乎！

尽管当年关于张爱玲的回忆文字也已差不多被“张迷”们发掘殆尽，然而由于周黎庵此文标题看似与张爱玲毫无瓜葛，所以这段宝贵史料一直湮没

不彰。文中所说张爱玲青年时对自己的身世颇为茫然，十分有趣。时隔半个世纪，周黎庵又在《张爱玲“数典忘祖”》（收入 1994 年 2 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初版《闲话皇帝》）中旧事重提，张爱玲在上海的姑夫李开第读后却向笔者表示，此说大可怀疑，联想到张爱玲晚年在其向“张迷”的告别之作《对照记——看老照相簿》中对祖父张佩纶（丰润）、祖母李菊耦（即李鸿章三女）述说甚详，怀念甚切，并以天潢贵胄自傲，似不像周黎庵所回忆的那么懵然无知。但周黎庵言之凿凿，也许张爱玲正是在周黎庵提醒之后，才着意“寻根”的？是耶，非耶，只能让广大“张迷”自己判断了。

（原载 1996 年 4 月 26 日《济南日报·随笔》）

笔名小考

《巴尔底山》“基本队员”

读李思乐先生的《鲁迅与〈巴尔底山〉》（《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1月号），文中提到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1卷1号《编辑后记》中列出的该刊30名“基本队员”（即撰稿人），名列第一位的德谟可能即编者李一氓，另有17位因不明来历，有待进一步研究。

据我所知，德谟确为李一氓笔名，另外17位中的鬼邻也是李一氓笔名，这有李一氓本人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为证。此书1992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因印数仅1000册，故流传不广。现不妨把李一氓在此书第三章“上海地下工作”中的有关回忆照录如下：

1930年4月至5月，我又负责编了一个小刊物《巴尔底山》。50年之后，1980年4月，我写过一篇回忆录《记〈巴尔底山〉》（见《一氓题跋》）。我在这小刊物上也写了一些短文，其笔路和在《流沙》上的《游击》差不多，刊物取名也类似。因此也就不再另行重述了。因为是巴尔底山（即Partisan，游击队之谐音），所以把撰稿人冠以“队员”之名，有一个30个队员的名单，附在第一期末。（具体名单从略——笔者注）我的笔名，没有用先前用过的L、一氓，而是另用了“德谟”，即为我原名民治英译汉，德谟克拉西之前两字。还用了“鬼邻”，因为我那时住在静安寺路东头赫德路（今常德路公园）的某里某号，紧靠万国公墓（今静安公园），与洋鬼子为邻。但此一笔名后来并未在他处用过。

剩下的16位“基本队员”中，至少还有5位可以确定其真实身份，即：黄棘——鲁迅，洛扬——冯雪峰，伯年——柯伯年，黎平——吴黎平，东周——潘东周。黄棘是鲁迅的主要笔名之一，洛扬是冯雪峰的主要笔名之一，这早已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熟知，后三位则都是当时左翼文化界的活跃人物。有一个情况应加以说明，二三十年代办刊物，发布撰稿人名单时，为扩大声势，往往有一个作者同时刊登几个笔名的做法，所以《巴尔底山》“基本队员”中也出现了鲁迅和黄棘、雪峰和洛扬、德谟和鬼邻（李一氓）并列的现象，不足为奇。

至于还有NC、致平、志华、溶炉、学濂、嘉生、芮生、王泉、子民、HC、连柱等11位，恐怕真的要“留待考查”了，也许有的已永远无法查明。其中的NC，也是李一氓主编的左翼半月刊《流沙》的撰稿人，可是李一氓生前也“已不能记忆为谁”了。

（原载1995年3月《鲁迅研究月刊》第155期）

附 记

拙文发表后，承广州中山大学李伟江教授提示，NC应为后期创造社重要成员、左联首任党团书记冯乃超的笔名，即乃超两字的英文缩写（见1992年3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初版《冯乃超研究资料》载《冯乃超笔名、别名集录》）；嘉生是后期创造社另一重要成员彭康的笔名，芮生则是彭康之弟彭纳生（见1988年《高等教育研究》第3期载《彭康同志年谱》）。这样，《巴尔底山》“基本队员”尚未查明来历的只剩下八位了。

林率是陈麟瑞

读 12 月 8 日的《清园书话·〈早点前〉》，颇有感触。要不是王元化先生为文披露，奥尼尔独幕剧《早点前》动人的翻译、演出始末，即使是专门从事现代戏剧史和翻译史研究的，又有几人知道译者“范方”即是张可先生？元化先生此文再次证明了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弄清笔名的的重要性。

不过，元化先生推测《早点前》中译本序“很像出于李健吾本人的手笔”，却是不确的。该序署名“林率”，其实不是李健吾，而是时在暨南大学外语系执教的陈麟瑞（1905—1969）先生。陈麟瑞的名字，现在的读者早已很陌生，但若提到“石华父”，至少现代戏剧史研究者不会忘记他。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戏剧家在 40 年代沦陷时期先后以“石华父”笔名出版了改编剧《晚宴》、《孔雀屏》、《雁来红》和《海葬》等，在改编剧创作上迈出了一条新路，在当时上海剧坛上很有影响。前几年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还出过一本石华父剧本选，可惜印数太少，流传不广。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钱钟书脍炙人口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编印出版曾得到陈麟瑞的热情帮助。钱钟书在初版《写在人生边上》书前的《志谢》中写道：“陈麟瑞、李健吾两先生曾将全书审阅一遍，并且出版和印刷方面，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而“林率”则是陈麟瑞早期的笔名，目前所知最早于 1936 年 3 月在《东方杂志》第 33 卷 5 期上发表《产妇科的猫》一文时使用。但因“林率”远不及“石华父”为人所知，所以元化先生误以为是李健吾的笔名了。

陈麟瑞与李健吾一样，也是张可先生的老师。薄薄的一本《早点前》，由年轻的张可翻译，由李健吾校阅和修改，又由陈麟瑞作序，凝聚着师生两代三位翻译工作者的心血，也是 40 年代上海剧坛一段令人难忘的佳话。

（原载 1996 年 12 月 17 日《新民晚报·夜光杯》）

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种种

叶长海先生的《论剧无忘宋春舫》（1996年12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和王廉善先生的《褐木庐藏剧》（1997年2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都谈到了现代戏剧家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藏书，笔者对此也颇有兴趣，不妨也来说上几句。

宋春舫在《〈褐木庐藏剧目〉自序》中写得很清楚，他的褐木庐建于“青岛之滨”。宋春舫好友梁实秋对这所闻名中外的私人藏书楼有生动的描绘：

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褐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 buckram（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half calf, ooze calf, etc），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雅舍小品》三集《书房》）

与其他大藏书家一样，宋春舫也是爱书如命。他早年在北大执教时，就曾多次通过《北京大学日刊》征集他志在必得的书刊。如他在1918年11月25日的《日刊》上刊登《启事》：“现拟购买《新青年》二卷第一期《青年》一卷第二、三期能出特价”；同年12月3日又在《日刊》上刊登《启事》：“鄙人现拟购《近代欧洲文学史》周作人先生著”等等，都很有趣，也说明他的褐木庐藏书确系多年“辛苦搜求”，来之不易。

光阴荏苒，而今宋春舫墓木早拱，其哲嗣、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宋淇（林以亮）先生也已于去年12月3日在香港病逝，不知褐木庐旧址尚在否？听说宋春舫另一位友好闻一多的青岛旧居仍保存完好，但愿褐木庐也有可能修复，让后世的爱书人能到此凭吊这位世界级的大戏剧收藏家。

宋春舫是1938年去世的，褐木庐藏书后来的归属，据宋淇先生七年前致笔者函相告，其中“共约七千八百册左右”，已捐赠北京图书馆。但笔者八年前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旧书店发现大批粘贴有“褐木庐”藏书票的褐木庐藏书，不久上海图书馆也发现“褐木庐”旧藏，可见褐木庐藏书已有部分散出。幸好其中绝大部分为南北两大国家图书馆所得，当可惠泽于后起学子，宋春舫如果泉下有知，“如涛忧心”也可宽解了。

寒斋现藏有两种褐木庐藏剧，两书封里均粘贴有“褐木庐”藏书票。一种，是法国18世纪戏剧家克莱毕依（J.deCrevillon）的戏剧集，1912年巴黎出版，小32开精装，书脊烫金，书顶、书根和书口则涂以彩色纹饰，显得庄重典雅。此书褐木庐藏书编号为FP/7181。另一种为中文的《〈过渡〉演出特辑——农民戏剧实验报告之一》，1936年3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初版，大32开平装。被称为“农民戏剧”代表作的三幕话剧《过渡》出自熊佛西的手笔，1935年12月在河北定县东不落岗公演。《特辑》中收入熊佛西的《〈过渡〉的写作及其演出》、《中国戏剧的新途径》等文，剧照多幅和杨村彬、陈治策、田禽、张骏祥等人的评论文字。此书褐木庐藏书编号为4966，《褐

木庐藏剧目》1932 年就已编就，此书是宋春舫 1936 年搜集的，显然不在《藏剧目》所载之列。

临了，还要补充一句的是，早在宋春舫逝世 30 周年的 1968 年，香港藏书家黄俊东先生就写了《宋春舫热爱戏剧》以为纪念，此文对宋春舫的生平、戏剧创作和褐木庐藏书评介甚详，推许甚高。其时我们这儿正在大“革”文化的“命”，对宋春舫这样的“遗老遗少”（他是清末秀才，又是王国维的表弟）不“批倒批臭”已是十分客气的了。现在宋春舫文笔隽永的游记《蒙德卡罗》已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收入“书趣文丛”第三辑出版，明年是宋春舫逝世 60 周年，我们的戏剧文化界应该有所表示了吧？

（原载 1997 年 3 月 1 日《文汇读书周报》）

观赵清阁捐献字画有感

1991年末，我应著名女作家赵清阁先生之邀出席了她向上海博物馆捐献珍贵字画的小型仪式。赵先生成名于30年代，在编剧、小说、散文和旧体诗词诸多领域里均卓有建树，是把《红楼梦》改编成话剧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一位擅长花鸟的丹青高手。她这批历经战乱和“文革”劫火终于幸存的近、现代名家字画我是首次见到。除了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沈尹默等书画大家的精品外，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鼎堂（郭沫若）、老舍、田汉、赵景深等现代作家的书法作品。鼎堂1943年为赵清阁书写的一幅扇面，工整的蝇头小楷，风格与后来的完全不同。而老舍书写的一幅扇面，内容为《忆蜀中小景》五绝二首，极有可能还是老舍的佚诗。更为难得的是徐志摩夫人陆小曼在40年代末写的一幅扇面，用娟秀的正楷书录了徐志摩诗《这年头活着不易》（个别字句有出入），可谓别开生面，因为扇面上题写新诗是很少见的。陆小曼还在诗末加了一段颇有意思的跋：

余不爱新诗，可是我爱志摩写的，他的每句内都充满着活的灵魂，不知清阁以为然否。

显而易见，这批书法作品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对研究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交游和有关作家的艺术修养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我因此想到这类墨宝也是一种文坛史料，尽管它们不同于作家的手稿，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研究价值，也应引起文学史料研究者的重视。

我还想到向国家捐献稀见图书字画是化私为公的善举，其目的不只是为了妥善保藏，更是为了让更多的鉴赏者有机会鉴赏，更多的研究者有机会研究，如果从此“侯门一入深似海”，那就大大违背捐献者的本意了。听说上海博物馆有意把赵先生捐献的字画编印成册，以广流布，这是令人欣喜的好消息，我期待着此书早日问世。

（原载1992年5月23日济南《作家报》，
收入本书时有增补）

台港散文八大家

吴鲁芹

推荐台湾青年散文家庄裕安时，我曾提到庄裕安荣获 1994 年台湾吴鲁芹散文奖。据我所知，目前台湾以已故文坛大家的名字命名的散文奖仅两种，一是梁实秋散文奖，另一就是吴鲁芹散文奖，可见吴鲁芹在台湾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如果套用台湾另一位散文名家余光中右手写诗，写散文是“左手的缪思”的说法，吴鲁芹则是右手搞翻译，左手写散文，同样是左右开弓，争奇斗艳，各擅胜场。吴鲁芹的散文著作共七种，《鸡尾酒会及其他》、《师友·文章》、《瞎三话四集》、《余年集》、《暮云集》等都是在海内外脍炙人口的佳作华章，他的两种文学评介集《英美十六家》和《文人相重》其实也应当作散文来读。完全可以这样说，吴鲁芹的文字生涯是与散文共始终的。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齐邦媛女士曾经断言：“吴鲁芹的散文，无论就文字风格、立论见解和融合了中西文化的时代性而论，可以传世是无疑的。”对此，我深表赞同。

尽管可以明显看出梁实秋、王力等前辈大家的影响，吴鲁芹的散文毕竟博通蕴藉，晶莹和谐，自成一格。无论述愿怀旧，议论纪游，闲居读书，他的散文均散发着超越时尚的文化品味，于真挚敦厚中透出一代学人的智慧和幽默。特别是严肃与轻松经常在吴鲁芹笔下交替出现，相辅相成，使许多篇章达到了一种优雅的平衡，极为难得。维特根斯坦说得对：“幽默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读吴鲁芹结构缜密、笔调朗畅的幽默散文，在为他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莞尔之余，我就不由得想起这句话。

吴鲁芹生于 1918 年，上海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曾任台湾师范大学及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60 年代初赴美国讲学，后曾供职于美国新闻总署，1983 年在旧金山病逝，距今已 12 年。

（原载 1995 年 8 月西安《美文》第 36 期）

林以亮

五四的同龄人宋淇先生 1996 年 12 月 3 日在香港逝世。当我辗转得知扬之水女士带回的这个噩耗时，还以为是误传，直到先后读到董桥先生和黄维梁先生的悼文，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幸的现实。



吴鲁芹著《瞎三话四集》封面

大陆读者对宋淇这个名字会感到陌生，但是，如果说他就是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以亮，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他不仅“爱才如命”，在创作和生活上给过张爱玲很大的帮助，而且本身就学贯中西，对音乐和艺术也有精深的造诣，是在台港暨海外文化界享有盛誉的文艺评论家、电影艺术家、翻译学家和散文家。

我没有见过宋淇先生，只与他通过一次信，是就他父亲宋春舫“褐木庐”

藏书的下落和宋春舫戏剧研究的一些问题向他请教，得到他热情而又详细的解答。对他几乎穷毕生精力从事的英美文学翻译和翻译学研究，我不敢置一词，但我爱读他的散文。他生前结集出版了《前言与后语》（台湾仙人掌社版）、《昨日今日》（台湾皇冠社版）和《更上一层楼》（台湾九歌社版）三本散文集，他的学术文集《林以亮诗话》（台湾洪范书店版）、《红楼梦西游记》（台湾联经公司版）、《林以亮论翻译》（台湾志文社版）和《文学与翻译》（台湾皇冠社版）中的一些篇章，其实也可以当作散文来读。这些书我费时数载，总算全部搜齐，可惜《前言与后语》是个残本，此书出版于60年代，早已绝版了。它们都是用林以亮的笔名出版的。他40年代发表诗文和译作则用另一个笔名宋悌芬，钱钟书先生有七绝《答悌芬》曰：“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年来渐似欧阳九，不畏先生怯后生”，对他的文学才华极为赏识。

林以亮（也就是宋淇）的散文是他学识才情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怀人忆事在他只是偶一为之，但一经出手，便文情并茂，感人至深，如传诵一时的名文《私语张爱玲》和《毛姆和我的父亲》、《不定向东风——闻英美两大汉学家退隐有感》等等。我更喜欢他的序跋和读书札记。他为《四海集》（夏志清、林以亮、余光中、黄国彬合著）写的序《秀才人情》，以武侠小说的“武功”术语贯穿全篇，出人意外又辞理俱胜，已被公认为台港学者散文的佳作。他那些短小隽永的《文思录》、《再思录》和《三思录》（均收入《更上一层楼》），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熔知识、见解、机智和幽默于一炉，活泼生动而又甘醇可口，像用精致的银杯盛的陈年佳酿，令读者回味无穷。不妨选录一则《语文之难》如下：

外国人学中文之难，已尽人皆知。中国人学外文何尝容易；真正能达到能听、能说、能写外国语文的顶峰，举世滔滔又有几人？英法两国仅一海之隔，精通两国文字者固然不少，但通文墨者未必娴于语言。王尔德曾以法文撰写《莎乐美》舞台剧，上演后轰动一时，可是他旅法时讲的一口“蹩脚”法语，很少人听得懂，往往只能借助于笔谈。艾略特早年用法文写诗，为波德（Ernest Boyd）所讽，指摘他不会运用法文动词，以后就此藏拙。19世纪法国学者泰纳（Taine）著有《英国文学史》两厚册，当年堪称权威，可是他旅居英国时，早餐要了牛油烤面包（but-tered toast），吃到的竟是洋山芋（potato），也只好默默咽下，有如哑子吃黄莲。

这样一位讲究文体、讲究对人生与文学品味的优秀散文家，大陆的台港文学研究界长期视而不见，至今没有系统的介绍和评论，这个缺憾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弥补呢？

西西

西西是什么人？西西不写言情，不写打斗，不写财经；西西也不搞首发式，不举行招待会，不组织研讨会。因此，西西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很低，很低。

然而，西西是香港最有才华的女作家，而且可能是最好的作家。这不是我乱捧，是有事实为证的。西西写小说，写散文，写诗，写电影剧本，也写读书随笔，还在翻译方面显露身手，自60年代出版中篇小说《东城故事》至

前年推出长篇小说《哀悼乳房》，西西已有长短 19 部优秀作品问世。她的小说以意象繁美，变化瑰奇，充满对生命的深入感悟和层出不穷的象征张力而著称，曾多次在台港获奖，最近一次是荣获 1993 年第二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这是香港文学的最高奖，为某些人所梦寐以求的。

1991 年 2 月，西西在台湾洪范书店出版她的第三本读书随笔《剪贴册》。此书原是西西 70 年代初为香港一家报刊写的专栏文字，结集时才发现剪报有“将近一半不见了”，只得以残缺不全的面貌与读者见面。尽管如此，此书不到一年之内重印了三次，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后来有位香港读者把他保存的那部分剪报寄给西西，西西稍加整理后又在次年的台湾《联合文学》连载了好多期，堪称一段文坛佳话。



西西著《哀悼乳房》封面

《剪贴册》的奇妙之处在于一文一图，图文并茂，内涵深永。西西以新颖明快的笔调抒写她的阅读、思考、观察和感受，对人生和自然敏感好奇，于知识则诚意信仰，充分表现出一个穿越在中外古今之间的知识灵魂的人文关怀和探讨文艺的生动过程，而遣词造句的个性闪耀，也在在显示了作者不愧为一个文体家。西西在一次关于阅读和创作的答问中说过，书本是有声音的，它们平时“并不发声，但当你翻开来，里面就会有一种声音，在寻找应和。即使受时间空间的分隔，只要是有心人，也能够听到那种呼唤，也叫你循着声音去追寻。一个声音引出另一个声音，是来回的应合，是询问，是挑战，也可能只是自言自语”。你读《剪贴册》，是否听到了这种声音？

临末，应该补充一句的是，西西生于上海，并在上海度过童年，上海的出版界能否对西西极富创意的佳作，如《剪贴册》表示一点热情呢？我期待着。

（原载 1994 年 3 月 5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董桥

（一）

每次到香港，都要去拜访董桥先生。早在柳苏先生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桥》的名文发表之前，我就读到了董桥的散文，大有一见钟情、相识恨晚之感，我的藏书瘾也就再次发作，没过几年，竟然如愿以偿，把这位海外散文作家的作品集搜罗齐全，自以为国内尚无第二人而沾沾自喜。

今年 10 月 22 日中午，在香港中环希尔顿酒店最高层的“鹰巢”，我与董先生畅谈了两个小时，在座的还有香港书评家黄俊东先生。这是我与董先生第三次见面，我们谈藏书和藏书票，谈书法和美术，谈我去台湾参加林语堂百岁诞辰研讨会的观感，谈他正在苦心寻觅的明清木器和竹具，海阔天空，无拘无束。董先生问我：“你是搞现代文学的，你认为现代作家中哪位最伟大？”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现成的答案当然有，但我想这不是董先生想要知道的。其实，董先生早有自己的想法，他表示：就散文创作而言，在现代作家中周作人和梁实秋写得最好，周作人的文字没有人生阅历的人恐怕不易读

懂，不易读出其中的深味。

既然谈到了散文，我就顺便告诉董先生，上海一家报纸的副刊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我读董桥》的文章，作者对他的散文颇为推崇，但在介绍他的生平却张冠李戴，闹了笑话。该文称董桥的“文字散见于《明报》、《快报》、《东方日报》、《星岛日报》，是香港妇孺皆知的专栏作家”，又说董桥“还是一位历史小说家，有《寂寞红》、《成吉思汗》等作品”，还说董桥著称于时的散文集中有《有条有理》等等。我已发现这些说法都是不确的，但为了慎重起见，还得当面向董先生求证。



董桥著《另外一种心情》封面

黄先生是董先生多年的好友和助手，对董先生的文字生涯一清二楚，他证实董先生从不为《快报》、《东方日报》和《星岛日报》撰稿，也不为别的香港报刊写“专栏”，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散文大都是在主编《明报月刊》时期撰写的“编者的话”，他根本不是香港的“专栏作家”。至于创作历史小说《寂寞红》、《成吉思汗》和散文集《有条有理》，更属子虚乌有。我说经我初步查考，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很可能是该文作者误引一部同样很有名的读书大辞典所致，因为该书所列的“董桥”辞条就是这样写的。而这部辞典的失误也是事出有因。在更早出版的《香港作家传略》（广西人民出版社版）中，紧接着“董桥”辞条之后的是另一位香港作家“董千里”的辞条，董千里恰恰是为《快报》、《东方日报》和《星岛日报》撰稿的“专栏作家”，同时也是出版了《寂寞红》和《成吉思汗》的历史小说家，散文集《有条有理》也出自董千里手笔。所以，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是这部读书大辞典撰写“董桥”辞条的作者粗枝大叶，竟把董桥和董千里误为一人了，辞典的编写者实在不应掉以轻心啊！董先生听完我这一番分析，不禁笑了，连声说：“我不敢掠董先生之美。”原来董千里比董桥年长，在香港文坛真的是妇孺皆知。

董先生和黄先生嘱我写篇短文澄清事实，以免再以讹传讹。因此，尽管柳苏先生已作过统计，仍然有必要在此重复一遍：迄今为止，董桥在台湾和香港总共出版了六本散文集，按时间先后分别是《双城随笔（这个那个集）》、《另外一种心情》、《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和胡须丛外》、《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和《辩证法的黄昏》。北京三联书店的《乡愁的理念》、《这一代的事》和广东花城出版社的《跟中国的梦赛跑——董桥散文选》就是从上述六本书中遴选而成的。除此之外，董桥没有写过别的书。此外，除了武侠小说《薰香记》和他自称为是“不像小说又像小说”的《如意·吉祥》两篇，董桥没有写过别的小说。

董桥的散文充满书卷气息，又十分讲究文字的锤炼和意境的捕捉，个人风格特别鲜明。对如何写散文，董桥六年前答记者问时就说过：“散文，我认为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还是内容，要有 information，有 message 给人，而且是相当清楚的讯息。”这是很值得当今众多散文作者深思的。董桥现在是惜墨如金了，我从他从未结集的近年散文中选了三篇交周报重刊，相信大陆广大读者欣赏了之后，也会与我一样继续赞同柳苏先生的话：“你一定要看董桥！”

(原载 1994 年 12 月 3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二)

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仅 162 页，装帧设计也朴实无华，这就是香港散文家董桥的新著《英华沉浮录》(1996 年 3 月香港明窗出版社初版)。自 1988 年在台湾出版散文集《辩证法的黄昏》至今，董桥已有整整 8 年没有出新书了，海内外喜爱董桥散文的读者，所在多有。《英华沉浮录》的问世，当可使期待已久的读者大饱眼福矣。

所谓“英华浮沉录”，原来是董桥有感于当前“中文好的人毕竟不多了，学会英文其实也难”而在报上开设的一个专栏，专门剖析港式中文的利弊。对此，作者有生动的说明：“宋朝有一部大书叫《文苑英华》，辑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诗文。‘英华’指草木之美者，也可以形容美好的人或物，包括辞章。本栏旨在记录中文在香港受英文影响的利弊，栏名以英华二字当然也就有英文华文的意思了。李善注《文选·扬雄〈长杨赋〉》有‘英华沉浮，洋溢八区’之说，我既给‘英华’添了新意，索性连‘沉浮’也借来一用，点出香港洋化中文有利有弊、可沉可浮的实情。也许有人会说：‘你也配？’那我只好谦虚答道：哪里哪里，我这不过是‘记录’而已。”

虽然限于专栏的篇幅，只能点到为止，见好就收，无法尽情发挥，《英华沉浮录》仍然那么有声有色，那么精致圆熟，那么学、识、情兼备。作者对香港中英文互译和使用的许多细微差别独有会心，进而见微知著，对中西文化交会和冲撞这个重要问题卓见迭出。好，不必笔者多饶舌，还是请读者自己欣赏选文，随着作者的妙笔到那些有趣的“记录”中去沉浮体会一番吧。

(原载 1996 年 5 月 4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黄碧端

台湾女性作家中有许多枝散文健笔，争奇斗艳，各呈异彩，令人刮目相看，黄碧端是其中极为出色的一位。去年台湾朱衣出版社评选“当代台湾十二大散文名家”，黄碧端就和林文月、张晓风、简媅一起榜上有名。后三位女散文家已有专集在大陆出版，唯独黄碧端还不为人知，这个空白实在应该赶快填补。

黄碧端生于 1945 年，福建惠安人，台湾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等职，著有散文集《有风乍起》、《没有了英雄》、《书乡长短调》等。她长期在台湾影响最大的《联合报》副刊撰写“两湾随笔”和“黄碧端专栏”，广获好评，台湾评论界称她的散文“清新，明亮，有抽离眼前、垂示后世的象征辐射力”，评价不可谓不高。如予不信，试读《蜉蝣过客》、《时光的声音》、《爱憎童蒙》、《寂寞》诸篇，或赞美造物之“精密绚丽的设计”，或感叹时光之飞速流逝，或探究使世人困惑的“孩子的真相”，或肯定艺术家“把生命典给寂寞”的伟大意义，均能发前人所未发，既使人出乎意外，又无不在情理之中，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是一个学养精湛的女性学者对大自然的挚爱、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怀，读这样知性与感性相统一的优美散文，是会使人赏心悦目之余，进一步引起深深思索的。

黄碧端在品评台湾旅美作家庄信正的散文集《异乡人语》时，认为这是“介于‘学者的杂文’和‘文人的杂文’之间的文章——因为是文人的，所以引证广博之余，又多能跳出排比归纳的窠臼；因为也是学者，所以虽间有伤时感触之语，大抵仍是立说著论的余绪。”我想对黄碧端本人的散文，也可作如是观，当然，还应增添一句，那就是更具女性的细腻和敏感，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原载 1996 年 2 月西安《美文》第 42 期）

岑逸飞

有友人自香港来，说起香港的专栏作家如过江之鲫，不少人只能各领风骚二三年，岑逸飞却不同，他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文名一直很大。对此，我深以为然。记得岑逸飞不久前到过上海，奇怪的是新闻媒体对他别具一格的专栏小品未作具体推介，实在很可惜。

岑逸飞是高产作家，结集的专栏文字据我所知，就有《人生路》、《书中乐》、《闲情逸趣集》、《命运之激流》、《八方群英》等多种，这还不包括他的另外几本颇为走红的政论文集。不仅如此，他的专栏小品能长期保持相当的艺术水准，清新洒脱，含英咀华。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硕士，曾师从国学大师唐君毅，所以他的文字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不时闪露出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哲理思考。岑逸飞在《书中乐》序中说过：“读书之乐乐无穷，惟此乐也，无从细说，正如庄子非鱼而能知鱼之乐，只有庄子本人最为清楚此乐为何。若我是鱼，读者中有多少人会是庄子呢？”我想，在品赏了岑逸飞的小品之后，读者中的“庄子”是不会少的。

（原载 1994 年 11 月 5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潘铭燊

潘铭燊的大名，国内文学界一定很陌生，倒是政治界恐怕略有所闻，因为正好在两年前，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了潘氏的专著《廉政论》，据说很值得为政者借鉴。然而，在港台和海外文坛，潘氏却绝对是个人物。且不说他是以谨严著称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现执教于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部，难得的是，他集版本目录学家、红学家（他是香港《红楼梦》研究会会长）、修辞学家、藏书家和散文家于一身，尽管还未“知天命”，中英文编著已达 20 余种。香港《星岛日报·星辰》著名的“三思篇”专栏也由他和香港学者散文的两位高手梁锡华和黄维梁共同执笔，被戏称为香港散文“三剑客”。

套用一個时髦的名词，散文创作是潘铭燊的“最爱”，而《人生边上补白》（1992 年 7 月香港枫桥出版社初版）更是他最新的得意之作。读书人一看便知，潘氏此书是从钱钟书先生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转化而来。潘氏心仪钱钟书，写散文有意步武钱钟书的风格。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序中说过：“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潘氏由此触发灵感，独辟蹊径，对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诸篇再各各来一番“补白”，写下了这部学养丰足、笔路清畅、别具一格的《人生边上补白》。

潘氏于中西文学造诣甚深，对人情世态又善于观察，因此虽有前辈佳作在前，他的“补白”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同样妙语如珠，颇多睿智隽永之笔。此书除了《魔鬼夜访潘铭燊先生》、《重读〈伊索寓言〉》、《谈教训》等篇不吝笔墨、较多辅陈外，其余均为不满千字的短篇，然而“烹小鲜如治大国”，从中可以读到敏锐的机锋，精细的刻画，辛辣的讽刺，深厚的同情，以及自然贴切的幽默，一切一切，诚如香港大学陈耀南教授在此书序中所言“络绎奔会，取精用宏的古今胜语，和作者本身深造自得、信手拈来的慧识新解，浑成自然地融合成晶莹的珠玉”。哲思兼具文采，理趣交织情趣，这正是这部《人生边上补白》引人入胜，发人深思之处。

记得柳苏先生曾劝人一定要看董桥，我想就精致的学者散文而言，这位潘铭燊也是非看不可的。如果只知道香港有梁凤仪，而不知道香港还有潘铭燊，那就太可悲了。至于潘氏认为“人生这部大书还可再补白、三补白、四补白……”，完全正确，但这决非浮躁浅薄之士所能为，读者诸君，你说对吗？

（原载 1994 年 1 月 1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潘铭燊著《车喧斋随笔》封面

庄裕安

庄裕安是谁？大陆读者听说过其人其文的恐怕寥寥无几。三年前，我对庄裕安也一无所知。一个偶然的机，我读到了台湾《历史月刊》纪念莫扎特逝世 200 周年特辑，其中一篇《草地上的精灵——莫扎特音乐数来宝》深深吸引了我。我是莫扎特的“发烧友”，本来对品评莫扎特的文章就很留意，却没想到该文把这位旷世奇才的如天籁般优美的音乐解说得如此精妙生动，不禁心旷神怡。该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在大陆还鲜为人知的庄裕安。从此以后，我成了“庄裕安迷”。



庄裕安著《会唱歌的螺旋桨》封面

其实，庄裕安在台湾文坛是一颗熠熠生光的新星。他是台北县人，生于 1959 年，毕业于中国医药学院医学系，目前边行医边写作，用大陆流行的话说，只是一位“业余作者”。但他的散文成就已极为可观，短短四年间出版了《音乐狂欢节》、《寄居在莫扎特的壁炉》、《嚼士乐》、《天方乐谭》、《跟春天接吻的一些方法》、《一只叫浮士德的鱼》、《我和我倒立的村子》、《巴尔扎克在家吗》等多本风格独特、引人入胜的散文集。去年更是“双喜临门”，一是入选“当代台湾十二大散文名家”，与大陆读者已经熟悉的余光中、张晓风等位平起平坐，二是以新著《会唱歌的螺旋桨》荣获台湾“吴鲁芹散文奖”，愈发令人刮目相看。

庄裕安的散文引经据典，穿越在古今中外之间，又熔音乐、哲学、艺术、医学和文学于一炉，加上幽默俏皮，奇想联翩，总给人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惊喜，原来散文竟可以这样写！台湾评论界把庄裕安称之为“新人类”的代表

作家，这话固然不错，但是，尽管他的散文从抒情到哲理都带有资讯时代价值多元的种种征象，都不时闪现“后现代”意蕴，总的说来，古典的涵咏，真性情的喷涌，仍是庄裕安耐人寻味的两大特色，我之所以偏爱庄裕安，原因也正在于此。

香港著名作家小思曾经说过，学者的散文往往会在有意无意间表现自己的灵巧和机智，庄裕安的散文当然也不例外。试想，如果你一点也不知道维特根斯坦，你能读懂他这篇仅千余字的《维根斯坦的消夜》吗？所以，亲爱的读者，你读庄裕安，就得接受这种智慧的考验，你愿不愿意？

（原载 1995 年 6 月西安《美文》第 34 期）

跋

最近，承几家出版社的厚爱，我有机会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湾文学的文章结集成书。侧重考证和研究的一本是《文人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属于书话书评类的则编为《捞针集——陈子善书话》，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属于回忆纪念性文字和一些值得留存的书稿序跋、学术小品汇集成这本《生命的记忆》。三本书各不相同又互有关联，读者如果有足够的耐心把它们都读完，就可明了。

本书之所以取名“生命的记忆”，是出于以下两层考虑：

首先，本书所忆所述的大都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作家、学人和艺术家。其中许多位已离开了我们，但这些有才华、有创造力的过去的生命已长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风范永存；

其次，作为作者的我，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史料挖掘、考证和整理的长途上努力前行，度过了从青年到中年的大好时光，虽不敢说已“学有专长”，但“意有专情”（钱穆先生语）却是可以坦言的。现在回头来看，我学术生命中的不少时刻是应该珍视和记取的。

其实，人的一生中值得留恋的美好记忆并不会很多，知堂老人年轻时有一首有名的诗《过去的生命》，其中有这样两句：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现在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在我身上已经永远走过去了的学术生命，又何止是三个月，三年，而是整整20年！其间有迷误，有痛苦，也有执著，有欢欣。我庆幸自己经常得到许多识与不识的前辈的指点和支持，使我对生命的意义认识得更清楚一些，对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把握得更自觉一些。这也就是我感到有必要撰文忆述这些前辈，乐于为这些前辈编书的原因。

然而，除了书中已经写到的诸位之外，还有不少经常面聆教诲的文坛前辈，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像已经谢世的许杰先生，健在的施蛰存先生、柯灵先生、王元化先生、钱谷融先生和为本书赐序的黄裳先生，等等。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他们的人格感召力，时时激励着我。但也许是太接近，太熟悉了，反倒不容易写。譬如92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他在闲聊中不经意地表达的许多见解，足以警世度人。我曾陪同美国李欧梵教授、台湾郑明娸教授和英年早逝的林耀德兄采访施先生，后者的访问记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凡此种种，都是很可追忆的。而我只在80年代中期写了一则短文描画施先生的一个侧面，很不惬意。这些遗憾只能俟之来日弥补了。

按照时下的习惯分法，这本书大概可以归入学术随笔之列。散文随笔无疑应以文情并茂取胜，以此标准衡量，书中许多篇什可能都不及格。我一直念念不忘在文中尽可能地披露一点新的史料，提供一些新的信息，而全然不顾文章长短合适与否。我认为为文大可不必受文体的束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三不像”、“四不像”又有何妨？除了要拿学位而不得不写有严格规范的有时甚至是虚张声势的学位论文之外，写其他文章只要尽性尽兴就行，不知与我有同嗜者以为然否？

黄裳先生在本书序中说我“年力正富”，来日方长，这当然是前辈的期

许。但我自己已深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愿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像巴金老人所说的，继续“像一个狂信者那样投身到生命的海洋里去”，抓紧时间去做人文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事情。

陈子善

1997年10月2日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时秋光明媚，景色宜人，身在客中，
更感生命之可贵也。

